

西澧閒話

香齋題



西遊閑話

卷一

目 錄

中山先生大殯給我的感想·····	一
民衆的戲劇·····	八
哀思·····	一五
小戲院的試驗·····	二一
中國報紙的外聞·····	二八
獨身主義蕭士比亞兄妹·····	三二
開舖子主義·····	三四
非利士第恩·····	四十
清宮·····	四五
觀音與國劇·····	四七

報娘恩·····	四九
一天星斗·····	五十
文藝出版物·····	五二
吳稚暉先生的著作·····	五四
妙論·····	五六
洋錢與藝術·····	五九
粉刷毛廁·····	七十
黎明即起·····	七三
東西文化及其衝突·····	七五
拆了火爐搭涼篷·····	七八
勸進表與偉人的傳記·····	八十
慶賀——小劇院——成功·····	八六

報娘恩·····	四九
一天星斗·····	五十
文藝出版物·····	五二
吳稚暉先生的著作·····	五四
妙論·····	五六
洋錢與藝術·····	五九
粉刷毛廁·····	七十
黎明即起·····	七三
東西文化及其衝突·····	七五
拆了火爐搭涼篷·····	七八
勸進表與偉人的傳記·····	八十
慶賀——小劇院——成功·····	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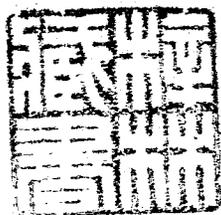
理由	一三四
參戰	一三八
走馬燈	一四〇
爭點	一四二
利害	一四七
「有奶便是娘」與「無奶不是娘」	一四九
劉叔和	一五五
南京	一六六
中國式的外國醫院	一六九
民氣	一七二
捏住鼻子說話	一七四
共產	一七七

流會.....	一八二
粉飾.....	一八四
文章與飯碗.....	一八六
創作的動機與態度.....	一九〇
版權論.....	一九五
吃飯與火併.....	二〇〇
撈油水.....	二〇四
放假.....	二〇六
剽竊與抄襲.....	二〇九
著書與教書.....	二一八
「首都革命」與言論自由.....	二二三
表功.....	二二七

「管閒事」.....	二三二
法郎士先生的真相.....	二三七
再談法郎士.....	二四七
吳稚暉先生.....	二五八
羅曼羅蘭.....	二六七
線裝書與白話文.....	二七五
再論線裝書.....	二八四
苦力問題.....	二九三
空谷蘭電影.....	三〇四
中國的精神文明.....	三一—
文化的交流.....	三一—
小畑的小戲.....	三二四

飛機炸彈聲中的感想·····	三二八
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上)·····	三三三
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下)·····	三四〇
貧民與節育問題·····	三四九
節育問題·····	三五六
盡信不如無醫·····	三六三
西醫問題討論·····	三七一
談世界文學史·····	三八三

西
澄
閑
話



中山先生大殯給我的感想

今天孫中山先生移靈到西山去，喪儀似乎比上一次有紀律，有秩序得多。可是送葬人的行伍雖然整齊些，他們的態度却大不及上一次的嚴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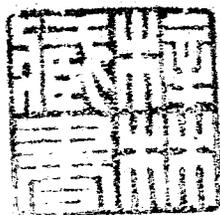
我們站在路旁，只見一隊一隊的青年過去，口中喊着：

「打倒帝國主義，嘻嘻！」

打倒封建軍閥，嘻嘻！」

中山主義萬歲，嘻嘻！」

這「嘻嘻」兩字，是我加上去的，可是讀者假如留意我上文用的是「見」字，不是「聽」字，大約不會說我是誣贗他們罷？因為那些高聲呼號的青年們，實在十個中八個是在笑着。他們也許覺得在人前



中山先生大殯給我的感想

今天孫中山先生移靈到西山去，喪儀似乎比上一次有紀律，有秩序得多。可是送葬人的行伍雖然整齊些，他們的態度却大不及上一次的嚴重了。

我們站在路旁，只見一隊一隊的青年過去，口中喊着：

「打倒帝國主義，嘻嘻！」

打倒封建軍閥，嘻嘻！」

中山主義萬歲，嘻嘻！」

這「嘻嘻」兩字，是我加上去的，可是讀者假如留意我上文用的是「見」字，不是「聽」字，大約不會說我是誣贗他們罷？因為那些高聲呼號的青年們，實在十個中八個是在笑着。他們也許覺得在人前

的信仰，世界才會有進步。我並不反對人家提倡某種宗教，我却不贊成把任何一種的宗教信仰灌輸入孩提的頭裏去，我並不反對人家提倡某種政治學說，我却不贊成把任何一種的政治學識去教智識未開的幼童。我以爲一個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個盲從的信仰者有價值的多。

蕭伯納說：「世界上只有一條金科玉律，這條律說，世界上沒有金科玉律。」

就是金科玉律，經了年月，換了地點，也免不了修改，何況本來就沒有什麼金科玉律呢？

他們的呼號，使我想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同時也聯想到英國有兩位大文豪也不約而同的希望我們恢復攷試制度，一位還希望恢復彈劾制度。

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間我同章行嚴先生見過幾位英國政治思想家，

裏面有一位是小說家威爾思 H. G. Wells 一位是戲劇家蕭伯納 G. B. Shaw

坐在他鄉間園中談到中國的時候，威爾思這樣的說：

「民主政治並不是萬能的聖藥。現在各國都在模仿英國，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中國雖然在許多方面是向來非民主的，例如沒有代議制度，在別種方面，却很合民主的精神，例如科舉制度。在科舉制度底下，誰都能爬到國中最高的位置。你們爲什麼不恢復那制度呢？自然恢復的時候，應當適合現狀，譬如不攷四書五經，攷新的學問……」

他又說：他自己正想寫一本書，叫「人的選擇」。什麼人最配幹什麼事，什麼事需要什麼人，一定有一種選擇方法。選工業專家有工業專家的選法，選學校教師有學校教師的選法。他說這本書在小說之外，當最先出版。可是四年來他又寫了好幾本書，這一本還沒有出現。

稱贊彈劾制度的也是威爾思，可是我的日記上沒有記下來，現在想不起他怎樣說的了。

蕭伯納說的更有味了：

「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一爲人民的利益，由人民主持的人民的政府」這一句話，從林肯首倡以來，成了口頭禪了。但是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他們連戲都不會得寫。假使有人說戲劇應當是「爲人民的愉快，由人民編著的人民的戲劇，」我就要說他們是瞎說。人民是不會寫戲的。他們要戲，他們就得請教我。政府也是一樣的。英美歷代相傳的見解是誰都能治國。中國歷代相傳的見解可不同了。治人的一向須經過一個智識的試驗。試驗的方法也許很糟，意思却並不錯。困難的地方就在怎樣想出一個着實可靠的試驗方法來。」

威爾思與蕭伯納，雖然以小說家戲劇家出名，他們在政治思想上很有些供獻。他們像一般近今的政治思想家，都對於民主政治，非常的懷疑，可是想不出什麼具體的替代方法來。威爾思說過：「只要有十分鐘的工夫，我們便可以把民主主義打得體無完膚，可是其餘的主義，不消五分鐘便可以打得落花流水了。」這句話很可以表示一般近今政治思想家的態度。考試制度和彈劾制度也許是一種補救的方法，至少他們以為在中國是值得試驗一下的。不過在他們是「姑妄言之」，在我們也是「姑妄聽之」，偶然想到，翻開日記本，譯述於此。我並不說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試權和彈劾權，經過他們不約而同的贊成，增進了多少價值。只是，我希望崇拜孫先生而「仍須努力」的人，努力下些研究的工夫，使他的主義成一種更完美而能應實用的學說，不要僅僅在宣傳方面努力。要不然，孫中山先生的主義雖在口頭，在紙上

「永遠不死」，在實行方面能夠說得定「永遠不死」嗎？「行之匪艱知之維艱」，孫先生的這句話，是應當時刻記在心上的。

民衆的戲劇

Iolanthe. By Gilbert and Sullivan P. U. M. C.

凡是關心藝術，眼光明瞭的人，誰都相信中國的舊戲是應當改良的，新戲是應當提倡的。我們也贊同這樣的意思。可是一般提倡新劇的人，我們以爲大都走進了「此巷不通」的死胡同。他們只知道新劇是要提倡的，他們却不問怎樣的新劇是可以提倡的。他們不問一齣戲是不是完全西歐的特產，裏面的風俗思想能不能得到中國觀衆的了解；他們更不問一齣戲是不是改頭換面的舊戲，只有舊戲的短處；沒有舊戲的長處；他們只要看見「新戲」的招牌，便覺得義不容辭的應當往觀了。他們也未嘗不覺得坐在家裏舒服得多了，同朋友閒談有味得多了，但是爲了提倡新戲，不得不做多少的「犧牲」。所以他們坐在劇場裏，

恭恭敬敬，肅然穆然，掙扎着不讓那與時俱增的呵欠，佔據勝勢；他們面上的神色，無異乎臨刑，他們的前後左右也大都如此。

自然舊戲場中他們是不肯涉足的。可是假使他們高興進去站一小時，（自然是說名角登場的時候，其餘的時候，劇場不過中國的一種交際場，又當別論）他們一定會很奇怪的看見一般的觀眾，目瞪口呆，搖頭擺尾，手舞足蹈的置身劇中，忘記了一切憂悶勞苦。忘記了他們自己。

戲劇是民衆的藝術，尤其是娛樂民衆的藝術。你們要民衆捨棄了消憂忘愁的舊劇，來隨了你們去「犧牲」，上法場，能不能有成功的希望？你們走的是不是死路？你們怎樣會得到民衆的贊助？

也許一般熱心新劇的先生們，太太們，小姐們看到這裏，又要勃然變色，痛罵我們爲頑固，爲「好古」，爲提倡舊劇，爲排斥新劇。

可是我們不能承認受罪，犧牲，是惟一提倡新劇的路徑。我們相信新劇是應當提倡的，但是又相信必須能給人愉快的新劇方值得提倡。我們不信舊戲是可以永久的，但是我們又相信牠有不可掩蔽的動人的魔力，很值得戲劇家的研究。總之，我們相信活的戲劇，好像活的樹，不能隨隨便便的改植在水土極不相似的地點，我們相信我們要栽樹，先須研究那地方的土質，氣候，濕度，我們要創造戲劇，先須研究人民的思想，習慣，嗜好，

爲什麼舊劇的魔力那樣的大？因爲舊戲不僅是純粹的戲劇，牠是有絲竹歌唱的，牠是有合節奏的舉動，合條理的舞蹈的，牠是有鮮明奪目的衣飾的。所以中國的舊戲在戲劇的藝術以外，包含聲的藝術，色的藝術，動的藝術，雖然沒有一件不簡單，沒有一件不粗陋。現在的新戲，只有「文明戲」還能夠比較引動觀衆，而這種「文明戲」，不

還是沒有音樂，沒有顏色，沒有合節奏的動作的舊戲，牠在戲劇藝術方面的幼稚可笑，不亞於舊劇，却又不像舊戲，沒有別種藝術來補救，怎樣能不相形見拙呢？

所以戲劇的將來至少有兩條路。一種是純粹的對話劇，自然這須是有趣味，有藝術，有意思的對話劇，不是冒牌的改頭換面的舊戲。可是我們恐怕二三十年內，這種戲劇只會博得少數智識階級的賞鑒，所以很難成良好的職業的組織。至於民衆的戲劇，應當另走一條路——一種收舊戲之長而棄舊戲之短的創造。如果新中國的藝術家，音樂家，戲曲家及詩人肯細心的去研究中國已有的劇曲，再合力製作自己的新品，把單調的音樂改爲繁複有變化的，把簡單的顏色化爲優美相輝映的，把散漫的結構收成嚴密有精采的，把粗俗的字句修成文秀有風韻的，把男女分演改爲合演的，那麼舊戲自然而然的淘汰消滅了。

這種有做，有說，有歌，有舞，有聲，有色的戲劇，就在歐美也非常的流行。所謂 Opera, comic, light opera, operetta, musical comedy, revue 都無非是這一類的東西，牠們號召觀衆的能力，比對話劇大得多。可是因爲樂隊，舞隊，衣飾種種的費用和技術上的需要，也比對話劇大幾倍，所以在東方的西洋人不敢草率的排演，我們也就沒有瞻仰的機會。上星期三四北京的美術院和美國大學女友會居然在協和講堂排演 Gilbert and Sullivan 的 Iolanthe，我們佩服他們的勇氣，感謝他們給我們一個參考的機會。我們極失望的便是觀衆裏的中國人寥寥無幾。人家把美妙的東西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還閉了眼不瞧一瞧，未免太對人不起。也許中國人的不去，不是不願去，還是爲了不知道這回事。那麼我們希望將來再有重演的時候。

去年美術院曾經排演過三四次對話劇，幾乎沒一次不給人很大的

失望，今年的這齣滑稽音樂劇比對話戲又麻煩的多了，所以我們去看時並不抱多大的希望；然而結果却給我們很大的滿意。這兩天的西報上有一班荒唐的西人恭維這齣戲的表演，無微不至，簡直說牠勝過了所有的歐洲職業藝員的表演，我們雖然覺得這種話幼稚可笑，可是很承認在數人的劇團，這樣的成績是不易得到的。所以我們對於這戲的導演者 Miss Alnah James 不勝的欽佩。

我們唯一不滿意的地方，便是似乎劇中的一部分演員沒有了解作者的精神。Gilbert 的作品在戲劇裏面正好像圖畫裏面的滑稽畫，他的精神在離開平正通達的直線去走那離奇古怪的曲線，所以表演的時候，最忌寫實的表情，不厭過火的舉動。演大法官的 Porter 教授便深得作者的本意，演 Phyllis 的 Grant 女士和 Earl of Tollerer 的 Mott walker 君也很相近了，其餘的演員，雖然有別種的擅長，在這一點很有些欠缺。

此外的小疵微瑕，我們不用，也不願一一的指摘。但是有一處似乎有討論的價值。Iolanthe受了仙后的命令，不准再和她的凡人丈夫相見，大法官也以爲她已經死了。所以他們第一次遇到時，Iolanthe以紗幕面，我想，第二次Iolanthe給她的兒子求情時，紗還是幕在面上的，直到大法官立意娶其子的情人，才把紗去掉，露出本來面目，所以說，‘Behoed! It may not be—I am thy wife.’所以大法官一見她立刻認識了。那天的表演，第一次遇面沒有幕紗，想來是演員倉猝忘記了她的紗。第二次她明明帶着紗，却沒有幕面，想故意如此，我想是錯了。

哀思

孫中山先生的靈柩從協和醫院移往中央公園的時候，我也雜在鵠立道旁的數萬人中瞻望。我聽了那沉雄的軍樂，看了那在微風中飄蕩着的白幡，和在幡下走着的無組織，無秩序，三三兩兩，男男女女，臂上繫着黑紗，胸前戴着一枝白紙花的千千萬萬的人們——大多數是少年人們——我已經覺得心中一陣酸痛，眼淚便湧到眼眶子裏了。

我想到我只見過孫先生兩面，也是在民衆對他表示他們的景仰的時候，不過那兩次是歡迎，這一次却是哀悼了。

在民國沒有成立以前，孫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個神話傳說裏的人物。就是民國已經成立，那時的神話傳說還並不減它們的勢力。我還記得有一個冬烘先生在民國元年找稚暉先生求事——並且要在孫

先生的臨時政府裏求一事——他說，他早就知道孫先生是不凡的人物。有一年孫先生喬裝了一個施藥郎中，牽了一隻黑狗到常熟，被人識穿了。知縣派了五百名大兵去捉拿他。他們把孫先生團團圍住了，孫先生不慌不忙，吹了一口氣，腳下便生了一朵白雲，騰空而起，一直飛到上海跑馬廳，才落下來。這是他親眼看見的。

那時我初進中學校，聽了這種話，還不懂得笑，只覺着生氣。可是我所知道的孫先生其實也模模糊糊的，只不過靠着些報紙上的照像和不大可靠的記載。此外吳先生那時有幾句話，在我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使我覺到孫先生的偉大的人格。他說，革命黨得了志，他們的面目全變了。始終保持着本來面目，沒有染着一些官僚習氣的，只有寥寥的幾個人，尤其是孫中山先生。他又常說，孫先生的度量真大，有許多曾經在患難時背棄他的，現在來了，他仍舊一視同仁的看待他。

們。

我第一次親眼看見孫先生，是在南京臨時政府取消，孫先生下野的時候。我還記得一個下午特別到滬甯車站去，到時車站裏面已經人山人海，擁擠不堪，那時弱小無力的我再也沒有方法可以進門。我只好立在車站外的道旁人中等待着。在聽見了歡迎聲和軍樂聲的多少時以後，我便見幾輛汽車慢慢的從車站出來；爲首的一輛中，坐着一個穿着很整齊的西服的人，他的溫文端正的面容，光光的頭髮，八字鬚子，一望而知是孫中山先生。他舉起了高頂的絲帽，面上微微露着溫藹可親的笑容，可是不幾秒鐘便過去了。

我第二次看見孫先生便是在第一次的後幾天。上海新舞臺特別演一晚戲，歡迎孫先生。那天樓上送人。樓下還是賣座，我那晚跟了吳先生，也坐在一個側面的包廂裏。我永遠不會忘記孫先生走進他的中間

包廂的時候，樓上樓下的人都站了起來，戲台後的演員，有的化裝已完，有的還沒有化裝，有的化裝方一半，也都出來立在舞臺上；他們首先舉起帽子，呼萬歲，樓上樓下的人都應和着，把我的眼淚都止抑不止的叫出來了。

我還記得那天演的是「波蘭亡國恨」。可是我的眼光大約在戲台上的時候。還沒有在中座包廂的時候多罷。大約因為覺察着我如此，所以吳先生忽然在我肩上拍了一拍，立起身來向孫先生的包廂走去，我見了也就跟着。他走到那包廂的後面便立住了。我起先以為他同孫先生說話去呢，此時知道是讓我就近處看看他。我就立在那裏，一直到孫先生起身出去。中座包廂中只坐着兩個人，中山先生和他的公子哲生先生。他一言不發的坐在那裏，眼光直注在戲台上。他的秀美的面容，優爛的態度，完全表現出一個書生政治家來。政治家像孫先生

這樣的有氣魄而無架子的，我到歐洲以後還偶然見過，在中國可以說沒有。

孫先生身後站立的人漸漸的多了，他走的時候，已經立滿的是人。他見了相熟的人，或是握一握手，或是笑一笑，出去了。他的聲音我還是沒有聽見過。

孫先生靈柩到我面前的時候，我正回想着民國元年的記憶。四周的人一擠，把我擠醒了。我正見八九個孫先生的老朋友，老黨員，抬着靈柩向前走着，我的眼淚真要奪眶而出了。

我在人叢中擠了出來，歸途想到我所見的都是下台時的孫先生。民國元年那一次，正是他第一次下政治舞台，這一次，末一次——非但下政治的舞台，並且是下人生的舞台了——世界不是一個舞台麼？相隔十餘年，每次下台，都有千千萬萬的人歡迎着或是哀悼着，孫先生之

外還有什麼人有這種魔力？孫先生在國人心中的勢力是怎樣來的呢？
我想，與其說因他的功業，還不如說因他的偉大的人格罷？

小戲院的試驗

記得民國前幾年已經在上海看見過新劇。也許那時候的審判力不同罷，還不知是否隔了多少年的回憶總免不了帶着感情的成分，總之我覺得那時的新劇也並不比現在的文明戲差多少。至於民國元二年的春柳社的試驗似乎比現在我們所看見的高明得多了。現在的新劇，從種種方面看來，還沒有脫離——恐怕還沒有到，襤褸的時期。這也不足為奇怪，因為戲劇，與他種藝術比較起來，需要的條件實在繁複而困難得多。

畫師畫完了他的畫，不論是傑作，是塗鴉，便可以與世人相見了。如果他的畫是脫盡舊派窠臼的傑作，所以一般的人都笑他，罵他，攻擊他，唾棄他，至多不過使他不能依賴了他的藝術生活罷了。他的

作品仍舊靜候識者的賞鑒。如有好奇者，也隨時可以去賞鑒。小說家寫了一部小說，便多了付印的手續。可是印成之後，世人或因為不了解而不去理他睬他，至多也不過使他不能依賴他的藝術生活罷了。散處二十餘省的萬千人中，只要有寥寥數千人買他，讀他的書，他已經不算失敗。就使一個人都沒有，他的作品也仍舊靜候識者的賞鑒。如有好奇者，也隨時可以買了來賞鑒。

戲劇可大不相同了。劇曲家編成的劇本不過是工作的一部分，路程的第一段。僅僅讀了劇本來批評一劇的優劣，未免好像僅僅到廚房裏去看看菜蔬和作料便議論筵席的可口與否，同樣的靠不住。（當然劇本也可以批評，尤之菜蔬作料也可以議論，不過不能當作戲劇和筵席看罷了。）劇本完成之後，第一要有適宜可用的舞臺，第二須有能了解作者的意思而想出方法使這意思實現於舞台上的排演者，第三須

有訓練有素，善能表情的演員，第四，差不多最重要的，須有夠程度，有智識的觀衆。戲劇的成功，必須有劇本，舞台，排演者，演員，及觀衆的合作，五件缺一樣都不成。如果所缺的是第五項，用不着說。自然是完全失敗了。失敗之後，如有好奇者再要賞鑒一下，也就不能了。

我們只要想一想，我們看見的新劇達到了那一個條件，便自然明白我們配不配看到優美的新劇了。只有民國元二年的春柳社對於排演和表演曾經下過研究的功夫，可是既沒有良好的劇本，尤其沒有給以相當的鼓勵和同情的觀衆，所以不久便烟火消滅，社員死的死，改業的改業，不改業的如歐陽予倩君不得不依賴舊戲餬口。平常所見的文壇戲，不過是一種變相的，退步的舊戲。此外只有各學校游藝會所演的戲，雖然維持新戲的名目，可是這種戲不是爲了募捐，便專爲自己

的娛樂，並不打算作一種莊嚴的藝術的試驗，觀者也不能用正式藝術的標準去批評他們。只有劇本方面，近年來稍稍有些供獻，如西林，洪深，歐陽予倩，蒲伯英諸君的作品，可是簡直沒有比較滿意的實現於舞台的方法。

我們已經說過了，我們不信純粹的新劇；在二三十年內能夠得到一般觀衆的同情。可是不能因此便不談新劇，因為我們同時相信有極小部分的人對於新劇是極懷好感而很願意幫助牠的進行的。新劇是可以談的，不過提倡者應當認定他的目標，竭力的設法去滿足這少數人的希望和企求，切不可同時去求平常觀衆的好感，以至徬徨中途，什麼都不成功。我們相信目下最好的一條路，便是採用小戲院的制度。

小戲院的歷史雖然不過四十年，在歐美的成績已經很可觀。這是一種少數智識階級的結合，在戲劇營業化的時期維持了牠的尊嚴。因

爲戲院小，所以用不着大注的基金和常年費；因爲戲院小，所以只須得有限的觀衆，觀衆既然有了看到他們愛看的劇本的機會，革新的，別開生面的劇曲家，排演家也有了讓他們的藝術實現於舞台上的愉快。所以對於戲劇有熱情的人，不論他是劇曲家也罷，排演者也罷，表演者也罷，還是僅僅的觀劇者也罷，小戲院是他們的最方便，最合用的試驗室。俄國最著名的莫斯科藝術院，原先是一個小戲院。德國最著名的排演者 Reinhardt 的種種藝術的試驗，也舉行於小戲院。所以我們現在如有一班劇曲家，排演家等等聯合起來，組織一種小戲院的運動，實在可以代中國的戲劇開闢一條新路，非但愛好藝術者有了賞鑒歐美名作和國內作家的作品的機會，並且可以襄助種種的藝術的試驗。

小戲院的運動居然到了北京了——可惜是歐美人的北京，不是我

們的北京。二月二十四日北京英美人的小戲院團體在六國飯店舉行成立式。那天演的有兩齣獨幕劇，蕭伯納的the Man of Destiny和Barrie的The Twelve Pound Look（十二磅錢的神氣，太平洋四卷六號有沈性仁女士的譯本）這兩齣戲都非常難演，最容易費力不討好。用他們來開場，至少可以見這劇團的目的很高，氣魄不小，他們的成績却沒有目的的高明。第一齣尤其令人失望，大約是尤其困難的原故罷。這劇的主人翁是少年沒有很發達的拿破崙；然而我們覺得劇中的拿破崙好像一個商店的經理。那個深明世故，嫻於辭令的意大利酒店主人也極不滿意。飾女子的Miss Sere brianikoff名字好像是俄國人，然而她的一口純粹的英國話，已經很可佩服，而且頗能表示適當的神情。飾中尉的Robinson也很好。十二磅錢的神氣比較第一齣較為滿意，因為裏面的主角是極有才能的。Mrs. Hutobins。可是除了她之外，其餘的演

員也平常得很。並且我們覺得他們沒有能表演出 *Parrie* 的意思來。 *Mrs. Hutchins* 太會表現情感了，飾海理爵士的却太不會表現情感了，結果與作者的原意相反，把他的微妙俏皮的諷刺忽略過去了。還有一件可注意而有趣的事。第一齣的人物都是法國人，而演者的聲音笑貌，舉止行動一點沒說英國氣，第二齣的主人海理爵士是十二分英國氣的英國富紳，而飾他的倒很帶幾分法國的氣息。

可是我們希望這小戲院積極的進行，不久便有更大的成功。同時我們不免也要自己問一句，不知到什麼時候，北京才有我們自己組織的小戲院了？

中國報紙的外聞

國內各報上佔篇幅極多而最少得讀者注意的，大約要算是國外新聞了。所以現代評論的時事短評裏有了外事，就有人建議縮減或廢止。這在一般青年方高唱打到帝國主義，而且把種種黑暗腐敗的事實都歸罪於列強的侵略政策的時候，未免叫人感着可嘆而又可笑。同時我們也實在難怪一般人對於平常報紙的外聞不感興趣，因為中國報簡直不給讀者以感覺興趣的機會。我們自信對於國外的形勢尙有部分之瞭解，然而每讀各報的外事記載，常常摸不到諸事的頭緒，不得不求助於西報。

我們可以說，中國報的外聞裏，沒有一天沒有笑話成認誤。隨便舉幾例罷。

一天我們讀到意大利的大文豪某某死了，我們自慚鄙陋，實在沒有聽見過這樣的一位大文豪的名字，同名的音樂家到有一個。後來看了西報，知道所謂大文豪某某者果然是 *Great composer Puccini* 原來把譜樂者弄成了文豪了。

一天某報標題「德上院外相之演說」而演說者的名字，又是英外相 Lord Curzon 我們便覺得奇怪，英國外相怎樣到德國的上院去演說呢？原來英外相在英上院演說，不過這電報是由柏林發出的罷了。

一天我們讀到美國上院選舉議長，我們又覺得奇怪。美國上院的議長是副總統的當然任務，副總統概由民選，為什麼上院又選舉議長呢？原來選舉的不是議長，……是 *Floor leader*

又一天一個半中文半西文的某報說美國的現銀增加了，可是看他的英文，增加的不是什麼現金現銀，却是國家的財富 *National Wealth*

德國的 Luther 博士組閣的時候，許多報載「羅素博士」組閣，以致一般不認識洋字的先生奇怪怎樣的前幾年來中國的英國學者羅素會跑到德國去組閣。編報者不知道德國人把 Luther 讀成路德是可以原諒的，硬把 Luther 與 Russell 聯了「家」，似乎太沒有常識了。

這不過隨便舉的幾個例。讀者各稍留心，隨時隨地可以發見許多同樣的笑話。一個人讀了這種新聞，自然無從弄清楚國外的形勢，又怎樣能感覺到何種興味呢？

我們並不希望在短時期內，中國報紙的外聞能夠有歐美各報那樣的清楚詳盡。英美的大報紙非但編輯外事者是富有經驗，深明世界大事的專家，並且世界各大城都有長駐久居與名流學者相接近的特派訪員。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做到的，並且如果在今日做到，未免與各報紙的其餘部分太不相稱了，我們非但不敢希望這一層，我們並且不敢

希望各報館能有一位對於世界的的事情有些充分的常識的外事編輯，因為我們知道目下各報之中，能夠出二三十元雇一位認識洋字的先生幫一幫忙，選譯一兩段點綴點綴場面，已經是鳳毛麟角，非常難得，其餘的報館不過把通信社的來稿依樣抄錄一遍罷了。可是世界的大通信社似乎用不着同樣的節儉，儘可以請一兩位有些世界常識的看一看他們的稿件。他們供給的是新聞，無論傳實也罷，宣傳也罷，新聞與古文的性質不同，不待大家看不懂才算得好也。

獨身主義蕭士比亞兄妹

某女士在「婦女週刊」的某文中，有這樣兩句話：「還有那些可以結婚，而抱此獨身主義者。例如蕭士比亞兄妹二人……」

蕭士比亞的傳記雖然沒有近代一般大詩的詳盡，然而經了無數攷據家的研究，我們知道的還不算少。他自己非但十八歲便結了婚，並且結婚不滿六月就生了一個女兒；在他二十二歲到倫敦去以前，還有一對雙生子女。妹妹他是有一個的，但是她也嫁了一個姓Drayton的人，並且替他生了三個兒子。蕭士比亞同他的太太本來不大相得，某女士這樣的解除了他們的婚約，他也許很感激某女士的善舉，可是我們不知道他的妹妹，是否不滿意於Drayton先生，也許她不見得肯領某女士的盛情罷？

近日出版物中的啞謎很多，有許多悶葫蘆簡直沒法子打破。這一個謎我可自信猜着了。蘭姆姊弟所著的莎氏樂府本事是一本最流行的英文教科書，中國人得到的蕭士比亞的智識，可以說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從那裏來的。蘭姆姊弟實實在在沒有結婚。某女士大約怎樣的把他們姊弟二人記成了蕭士比亞兄妹了。其實把轉述故事者的歷史弄到原作者的身上，還不算大謬。在今日的中國，有些作家，也許竟會把翻譯這樂府本事成吟邊燕語的林琴南先生的軼事，如代如夫人徵詩之類，放在蕭士比亞的肩上呢。

我們再想一想，抱一個主義不一定實行那個主義；蕭士比亞兄妹也許抱獨身主義，不過我們不知道罷了。

開鋪子主義

徐志摩先生罵英國人，說「他們根本就不懂得主義」他實在是氣極了！所以未免冤屈了英國人，因為講起主義來，誰也沒有英國人那樣的多。蕭伯納，在他的名劇 *The man of Destiny* 裏曾經說過：

「英國人什麼事督幹，沒有一件事太壞了，亦沒有一件事太好了，英國人會得不去幹；可是你永遠不會聽見英國人承認做錯了事。他無論幹什麼事都有主義的。他和你戰爭是爲了愛國主義；他搶劫你的財物是爲了貿易主義；他征服你束縛你是爲了帝國主義；他欺負你是爲了男子漢主義；他擁護他的國王是爲了忠君主義，割去了他的國王的首級又是爲了共和主義。」

這段話實在說得一點都不錯。諸位如若不信，請舉一件近事做個

例。英國人參加華盛頓和會，都倡裁減海軍是爲了和平主義。新近的要在新加坡設立軍港又是爲了！不，諸位如猜武力主義，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說新加坡建設軍港，爲的是保護英國在東方的權利，抵抗日本及美國，那是小學校的學生也想得到的，英國人那裏會這樣的淺陋？英國海軍大臣 Brideman 氏新近鄭重的宣言，新加坡建設軍港，完全不帶侵略的意味，因爲英國最重視日美兩國的友誼，斷乎不肯稍抱侵略的態度，傷害二國的好感。所以新加坡軍港的建設，原來是爲了英日美友愛主義！這實在是我們平常人所意料不到的。這種表示友愛的方法與馮玉祥派兵把守溥儀和曹錕的大門，不准任何人出入，作爲對於溥儀和曹錕尊敬的表示，同樣的滑稽。

英國人的主義雖然百出不窮，裏面却有一個是百川的源泉！大廈的基礎。上而蕭伯納的一段話，雖然是蕭氏的話，却又是蕭氏放在拿

破崙口中的話，蕭伯納是十分懂得英國人的，拿破崙也是十分懂得英國人的，他自己有一句話就一矢中的，說的非常的透澈。他說「英國人是一個開舖子的民族」。英國人實在是一個開舖子的民族，他們的根本的主義便是開舖子主義。

明白了這個開舖子的主義，我們就不難知道包爾溫先生爲什麼辭退了羅素與狄生做賠款委員。這並不是因爲「羅素與狄更生是信國際和平的，包首相是信帝國主義的」；也不因爲「羅素與狄更生是信人權，人道，與自由的，包首相與他的同事是不信的」。如若信了國際和平，人權，人道，與自由可以促進英國的實利，羅素與狄更生也不至於被黜。實在的原因是因爲開舖子的人是爲自己的利益的，羅素與狄更生却願慮到別人的利益；開舖子的人要的是忠於自己的，他們兩位先生偏喜歡幫別人的忙，開舖子的人是講實際的事務的，他們兩

位先生却偏於理想的問題。委員會裏有了他們兩位先生，非但不能便利事務的進行，還要增加許多搗亂的麻煩。

我們只要看一看英國政府對於賠款的議案，便可以明白他們的用意。賠款的用途，分爲三項。第一，提倡中國的實業教育。第二，在揚子江流域築一鐵道，大約自南京到四川，或西藏。第三，補助傳教事業。這是何等的光明正大？中國人現在的缺點，就是實業不發達，所以提倡實業教育，造就專門實業人才是目前唯一的急務。而果這班人將來不得不實用英國的方法，聘請英國的技師，購買英國的機器，推廣英國的商務，英國人也樂得幫我們的忙。造路又是一件重要的事，尤其是東西的幹線。如果說揚子江流域幾乎算是英國的勢力範圍，西藏幾乎是在英人的掌握，造了路可以擴張英國在中國中部的勢力，英國人也覺得是相當的報酬。傳教事業尤其是刻不容緩的大事。中國人的

腐敗無用，就是因為不信上帝，不奉基督教。如果說基督教是英國人侵略弱的利器，推廣商業的要素，英國人也可以笑着回答「你們得到了一個信仰，就亡掉了國家，也是值得的」。

羅素與狄更生不過是些會得白天做夢的理想家，那裏會得想到這樣的道理。人家說爲了中國人的利益不過是口頭禪，他們却土頭土腦的信以爲真，人家說提倡教育不過是官樣文章，他們却瘋瘋癲癲的高談什麼思想解放，意志自由。以前的內閣中人，如麥克唐諾爾德一班工黨的首領，究竟是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下等人，所以也帶三分傻氣，會得請羅素與狄更生那樣的大傻子當賠款委員。現在執政的又是受過高等教育，禪受衣鉢的中上流社會的純粹的英國人，怎麼能不急急補救的方法呢？

我們記得在英國的時候，也寫過文章，勸英國人退還我們的賠

款。●我們以為自己是十分懂得英國人的心理的，所以動之以利害，常常把美國來做例，說怎樣美國退還了賠款，得到多大的利益。現在英國正要把賠款退還我們了，可是我們方知道，我們以前認識英國人還沒有十分的透澈，看他們的開舖子主張還沒有十分的清確。現在我們真知道了可是知道了又怎麼樣呢？

「非利士第恩」

(Philtines)

北京Y大學的學生新近排了一齣英國近代名劇家王得爾 (Oscar Wilde) 的戲，叫「少奶奶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 廣告也登了多天，票也賣去了不少了，忽然宣告輟演，據說是因為時局的不安靜。這齣演的廣告和時局不安靜的理由，不先不後，恰巧發現於時局比較安定的時候，自然引起了一班好事人的驚怪。後來一位知道內幕的朋友告訴我們，所謂時局的不安靜，不出吾人所料，完全是表面的託辭，真正的原因，還是學校當局禁止排演王爾德的戲。

我們聽說，禁止的原因大約不外乎下列的二種：(一)這劇本根本就要不得；(二)凡是王爾德的東西都要不得。

究竟藝術的作品是否應當用禮教的眼光去估度，是一個久經爭論

不決的問題，我們今天沒有時間來討論，並且我們沒有忘記Y大學是教會辦的，這個問題，也就似乎用不着討論。我們要問的却是，這本『少奶奶的扇子』是否離經（聖經）叛道（耶道，不是邪道，手民先生注意者！）提倡異端？是否宗旨不正？語涉淫穢？總而言之，是否與普通承認的禮教有不合的地方？可是，從這個觀察點說來，『少奶奶的扇子』非但可以在禁止之列，並且大可以當得起提倡禮教的教會社會的嘉獎，因為這齣戲，幾乎可以說是一本勸善的冊子，警戒少年婦女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麼禁止排演這本戲的原因當然完全是爲了他的作者不幸而是王爾德了。王爾德曾經犯了不名譽的刑事犯，坐了兩年監，是不可隱諱的事實（其實假使王爾德在中國做了中國的詩人，他非但可以不坐班房，還大可博一個風流才子的美名！）我們也不欲代爲辯護，我們也

不要因為他在獄中寫了悔恨痛苦之辭，便代求寬恕。我們覺得不能了解的，是否一個人做錯了一件事，我們便應當把他所有的事都一筆抹殺？是否一個人的事業和作品應當用他兩個人的私德做審判的標準？

也許Y大學的當局以為「不以人廢言」不過是異教中國人（Heathen Chinese）的說。那麼，爲了幫助他們貫徹他們的主張起見，我恭恭敬敬的向他們進一個條陳。我們聽說，Y大學的學生在教室中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不算外，近年來還年年都排演他的戲據說居然受了一部分教員的鼓勵和贊助。這個端是千萬開不得的，應當趕快禁止的。莎士比亞不是相傳爲了做賊，偷了人家的鹿，犯了案才逃到倫敦去的麼？雖然有一班人不信鄉間一個盜鹿的村夫會得寫出那樣偉大的作品來，可是很不幸的他們找的替代人恰巧又是一位受賄入獄的大法官裴根。Y大

學當局居然讓年輕的學生誦讀排演這樣不道德人的作品，實在未免太放任了，太粗心了。

正寫到這裏，又碰到了那位知道內幕的朋友。他說我未免錯怪了Y大學的當局了Y大學的當局，經學生的請求居然肯把這本戲讀了一遍，讀了之後，也居然覺得用不着特別的反對，可是Y大學的經費是仰給於教會的，教會裏面的人都不喜歡王爾德。他們自然不屑去細究王爾德是怎樣的人，更加不肯自污潔白之心，去讀他的作品，但是他們知道他是犯了罪坐過監的，那就夠了。學校的當局不敢拂這班人的意旨，只好禁止這劇本的排演。我們聽了這番話，只好向大學的當局道歉。

至於一個高等學術的機關，是否應當服從一般冥頑不靈，眼窄心狹的中流階級——便是半世紀前亞諾爾特 Mathew Arnold 所竭力攻擊的

「非利士第恩」Philistine——的支配：這種機關在這種人支配之下，學術前途有怎樣的影響：都是些不易回答的問題。讀過Dighton Sinclair的Goose-Step的人，大家知道美國的大學幾乎完全在「非利士第恩」的掌握之中，我們也何必爲了小小一件事，區區一個學校，來發什麼無謂的感嘆。不過亞諾爾特沒有料到，他提倡光明過了五十年，非但英國美國的「非利士第恩」依然是「非利士第恩」他所深惡痛絕的人居然侵入他所重視爲光明的出發地，執掌了學府的權衡，醜毒了自由思想的源泉。也許再過五十年，所有的教育機關，都入了「非利士第恩」的掌握，沒有人再提起亞諾爾特的話，提起時也沒有人能夠了解他的話的意義，到也罷了。

清宮

清宮裏新近又失了多少東西，可是除了竊取的人，沒有人知道究竟失掉了多少東西。這在外面的人聽了是很奇怪的。但是這實在一點都不奇怪。誰能知道沒有檢查過的屋子裏有什麼東西呢？那麼外面的人又要問了，爲什麼不趕快的檢查呢？這也是因爲不知道檢查的方法的緣故。照現在的一一掛號檢查，不得不慢，檢查委員會並沒有偷懶。

可是外面的人如果又問，檢查是不是必定得用這個方法？爲什麼不把寶貴的東西先檢點過了收藏起來，才去檢查粗笨的東西？就是照現在這樣的一間一間屋子的檢查，爲什麼不把重要的，儲藏寶物的屋子先查了再到其餘的屋子？這些問題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了。我也代表

吳先生進去過幾次，但是幾乎每次都是檢查些破爛傢具，騰贖房屋。我覺得那樣東西實在不值得花費時間去檢查，所以也就懶怠去了。

我久就覺得，重要的房屋不先檢查過，失了東西也無從知道。查過後只登記掛號，不把寶物特別保存，所多的好處，也不過如有失竊，委員會知道失掉些什麼東西就完了。

「觀音」與國劇

旅京的西人星期一星期二兩晚在真光劇場演奏一齣歌劇，名叫「觀音」。從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劇中的情節是東方的。雖然編劇的，譜樂的，演唱的都是西人，故事，佈景，服裝却都是中國的，至少是模倣中國的。就是音樂也帶些東方的色彩。這個試驗總算是失敗了，不看完走掉的人很多，看完後笑罵的人更多。看慣西洋歌劇的人，自然嫌它不成東西，看慣中國戲的人，也嫌它不成東西。我們也覺得它裏面的毛病很多，例如這般故事沒有戲劇的可能性，不宜編為歌劇；音樂並沒有調和中西，只是在西樂之中夾雜些中樂的音節，祇叫人覺着它的單調；服裝既然不是純粹的中國裝，又並不好看；行動舉止強學中國戲，都沒有學像。可是，這種毛病都是在能力的不足，不是在根

本的不可能。如果有一個中國的大音樂家，和劇曲家出來，一定可以創造一種與歐洲似同不似的樂劇，代替現在民衆所愛看的舊戲。四五月前，我們曾經表示過這樣的希望。現在居然有人嘗試了，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只要方向不錯，嘗試總有成功的時候，至少他們嘗試的勇氣定可以佩服的，這個第一次嘗試，又讓西人搶去了，不知再要等到何年何月，才會看見我們所希望的中國人自己的嘗試呢！

「報娘恩」

聽見人說，五一運動那一天，有一個少年坐在洋車上連連的用手杖打車夫說「快跑，快跑，我要趕到勞工運動大會去演說呢！」這個笑話叫我想起吳老先生說的一個笑話來。南方有一種香會名字叫「報娘恩」。有一個鄉下少年罵他的母親道：「你這個老不死的老太婆，還不趕快給我燒飯，我吃了飯要去燒報娘恩香呢？」這個鄉下少年同那位新青年倒是很好的一對。可是，也不僅少年如此吧！

「二天星斗」

人們大都不喜歡聽人指摘的。我們說人家幾句便是批評，人家說我們幾句便是謾罵；我們罵人家，人家生了氣，便是沒有「幽默」，人家罵我們，我們生了氣，便是「義憤」；這是極普通的現象，到處可以看到。各國的社會黨一天到晚主張言論自由，但是只要有人說一句社會黨不行，他們就往往高呼狂叫，不准他再發一言。中國人自然也不會是例外。

上星期張奚若先生做了一篇「國立八校合併問題」的文章，裏面指摘國內學校的缺點，甚至說國內大學學生的程度還趕不上德法兩國的中學。這話自然說得太過分了。但是我們究竟用不着爲了文中的枝節，就誤解他全篇的大旨。八校合併問題，京中教育界人士反對贊成

都有，但是因爲有種種的顧慮，大家不肯明白表示態度。張先生初從海外回國，對於什麼問題都大膽的，直率的，毫無顧忌的說他要說的話。他說話有時過火，也正是他革新精神的表示。我們不能看見他批評政府說得痛快，便拍手佩服他的勇氣，一朝批評學界有了幾句過激的話，便鬧出「一天星斗」來。

美國人是非常高傲好勝的，然而他們有一位很著名的批評家 H. L. Mencken 說第二等的美國人等於第五等的英國人 (Prejudices 1st. Series)，美國人也沒有說什麼。張先生說了中國大學生不及德法中學生，也不過如此，就是不服氣，也儘可與他爭辯，何必同他個人去爲難呢？我們既然和政府當局爭言論自由，難道就任令輿論的專制無形中對於這點自由加一層束縛嗎？

文藝出版物

三月十四號的 *The Nation and the Athenaeum* 報有一個春季書目增刊。這裏面的書名，還不是英國春季這一季所出的書，僅僅是該報認為這一季的有趣味的書。我數了一數，總共有五百八十五種：傳記一百零六種，小說一零三種，詩歌二十五種，戲曲十三種，藝術二十六種，批評散文三十六種，政治經濟四十二種，歷史十九種，宗教三十二種，科學二十一種，心理九種等等。

中國的出版物無從稽攷。可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星海裏有一篇「最近文藝出版物編目」，這裏面的書目大約包含從新文學運動起，「截至一九二三年末日為止」五六年中的作品。我數一數五六年中的創作，有小說（長篇，短篇，合集都在內）十三種，詩歌十六種，戲

曲一種，其他九種，加繙譯八十八種，文學史等其他著述三十二種（連新式標點的小說都在內）也不過一百五十九種。

我們現在且不談質，且不管一方是經過一番選擇，被認為有趣味的書籍，一方裏面有許多天天被人罵爲「不值一文光緒通寶」的廢紙。我們只以量來說。英國一季所出的書，經了一番選擇還有五百八十五種，僅僅文藝一部分都有三百餘種；我們五六年所出的「文藝出版物」只有一百五十九種。

然而中國人還總是這樣的自豪；「西洋人崇尚的是物質文明，中國人崇尚的是精神文明」！大約精神文明完全是文明在腦經裏，用不着看書的。

吳稚暉先生的著作

有人寫信問吳稚暉先生已出版的著作，有多少部。我所知道的只有四種了

(一) 上下古今談 文明書局出版

(二) 天演學圖解 Dennis Hird: A Picture Book of Evolution 的譯本。
文明書局出版

(三) 荒古原人史 也是譯本，原本一時記不清。文明書局出版這兩種已絕版。吳先生譯第(二)種時。很費了些心血，不知爲何書局不再印了。又吳先生譯過一本北極南極，存文明書局，文明書局被焚，這稿也灰燼了。

(四) 睡窟客座談話 泰東圖書局出版

吳老先生的書，這一部銷行最廣，馮軍幾乎人手一冊。泰東書室銷了至少四五萬，賺了不少錢，但是著者自己只得了十部書。這在吳老先生固然是不介介於錙銖，然而書買利用賢者的心理，以圖私利，也實在可惡。

吳先生的著作最有趣的自然是散見於各報各雜誌的雜文，其次便是他的書函。我總覺得奇怪，現在什麼人都出文存，文錄，文集，演講集，沒有人不連孜孜爲利的書賈都沒有！想到把吳先生的文字收集起來。我的話也許提醒了什麼人，可是，我希望他存些良心，不要學泰東書局的主人才好。

妙論

英國上議院上星期通過了庚子賠款案的二讀。討論的中間，有一位愛克司忒的主教 (Bishop of Exeter) 說的話很有趣。他說美國對中國非常的慷慨，結果却很不幸。美國人辦的中國學校裏所用的歷史課本，特別注重美國的離英獨立，所以造成了中國的革命。主教是很尊嚴，很有威儀的高僧，我們自然不敢罵他荒唐，可是他如果以為幾個學校裏的幾本教科書裏的幾章就造成了一個革命，他的頭腦也好像只配講講經吧。何況美國退還賠款已經是一九〇八年的事。

有趣的文章和談話多着呢，不一定要到英國才找得到。全國私立大學上財教兩部的呈文裏，有這樣的一句話：「按列強當日要求庚子賠款四億五千萬原為懲罰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每人一元之意」。慧心獨

具，令人欽佩萬分。不過很不幸的原來提議用的是金磅。美國主張以四千萬磅爲最高限度，結果還是定了六千五百萬磅；後來條約裏協定的是銀兩，也並不是銀元。何況賠款雖然不一定是賠償實在的損失，但是名義上各國總是說他們受了多少損失才定賠款的數目的啊。

業

業

業

業

業

說中國的革命是幾本美國歷史教科書造成的，已經煞是有趣了，可是我還好像聽見過一個「名士」說中國的革命是兩部小說造成的，一部是茶花女，一部是迦茵小傳。這兩部書在中國政治上的勢力，究竟如何，我們雖然不知道，牠們十餘年前在文壇上的勢力，實在毫無疑問。爲什麼許多譁譯的小說裏，這兩本獨享大名，倒是一個很好「博士論文」的題目。迦茵小傳我只讀過原文，我覺得情節的結構，人物的描寫，一無可取，比茶花女還低幾格，簡直想不懂什麼這本書特

別遶中國人的賞識。這本書的作者 Sir H. Rider Haggard 本月十四日死於
英倫。他是一八五六年生的，著有小說三十多種，他用斐州等做背的
小說，如 "She" "King Solomon's Mine" 等都比迦茵小傳好得多。

洋錢與藝術

批空門遺恨 The White Sisters 和

巴黎繁華夢 A Woman of Paris 兩種電影片

一個人有的洋錢多，不能就算是藝術家，雖然偶然有些藝術家很有些洋錢。一個人把金子造成了一個像，鈔票粘成了一幅畫，並不能因為它們是金子造的，鈔票粘的緣故，就算是藝術品，雖然至少金子可以造成有極大藝術上價值的東西。謝天謝地，這種話居然還有人相信，就是最極端的唯物主義學者。例如新在中國的德國大學教授雪德勒博士恐怕也未必會反對。

但是，也就危險得很了。你不看見美國電公司影出品的廣告嗎？它們第一句話離不了「這是多少塊洋錢的出品」，它們的末一句話，

還是離不了「多少塊洋錢的出品」。十萬！二十萬！五十萬！百萬！是不是說，洋錢花的愈多，影片的价值愈大？洋錢等于藝術，至少在電影界，美國的電影界是承認的了。

這種洋錢藝術家之中，Griffith先生實在配坐第一把交椅。他花的洋錢固然比別人多，他花的工夫也實在比許多洋錢藝術家還多些。你在他的影片裏非但可以看到千軍萬馬的奔騰，連天的砲火，城堡宮殿的莊嚴及毀滅，並且可以看到些悲歡動人的故事。

我相信宇宙的大觀，自然的美景，滄海桑田的變易，非但可以利用於電影片中，並且實在是電影藝術中的一個極要的材料，因為只有電影可以表現出這種偉大的觀瞻來。但是Griffith先生雖然在這種地方花了不少塊洋錢，他的影片的動人的地方，却不在這裏而在鼓動非分的感情。一個昏迷不醒的弱女子睡在流冰上面慢慢的流到瀑布的邊

上，一個無辜可愛的美女子縛在斷頭機的底下，慢慢的，候鋼刀的下墮，慢慢的，正到末一秒鐘，來了那一定會來的救星。觀眾連忙拍手，摸手巾，擦眼淚。朋友們，非去看不可！看了一次值得再去看二次，三次！

這叫做賣弄 *Sensation*，不叫做藝術。

Griffith 先生的新片子「空門遺恨」到了北京了。自然北京人空巷的去看了。我一年很少幾次走進電影院的，也居然去看了一回，裏面的故事很簡單：一個女子聽見她的情人被敵兵所殺，看破世情，削髮入空門，誰知道她的情人並沒有死，只被敵兵所擄，等他逃脫歸來，已經寺門如海了。他勸她還俗，她却因為已事上帝，雖然愛念未消，回俗結婚已經是不可能的事。這樣的故事未嘗不娓娓動人。（自然我們沒有宗教信仰的，對於女主人固執的主張不能覺到充分得同情，但是

這又是一件事，不是今天所要討論的。）這樣故事的影片也值得一看。但是這樣便未免太簡單了，太沒有花洋錢的機會了。一個片子不能說「多少洋錢的出品」，怎樣會成功呢？所以 Griffith 先生在前面插上些大隊人馬的跑馬打獵，園林的美景，偷遺囑，趕弱妹出門的姊妹，在後面加上火山的爆裂，大水的暴漲，情人的慘死。好看固然是好看了，洋錢固然是花了，但是這故事的本身，並不因此增加了多少價值。要是沒有前面的偷遺囑，趕出門，女主人的悲劇的結果不會有半分的不同。要是沒有後面的火山爆裂，大水為災，這故事固然沒有了解決，但是以暴死來解決一個問題，等於不解決。演員的表情，除了女主人外，也平庸得很。洋錢固然等於藝術，我們總覺得看見洋錢的時候多，

同時北京也看到了賈波林導演的巴黎繁華夢。看了這個片子，我們知道美國電影界裏，居然也有人離開了洋錢研究藝術的。賈波林在

他自己的表演裏已經露出他新穎特出的頭腦，這一個影片更可以證明他實在是別開生面的藝術家。雖然他花的洋錢趕不上 Griffith 先生的十分之一，他的作品在藝術上的價值，少說些，總得勝過 Griffith 先生的作品十倍罷！

看影片最容易覺察的地方，便是說明的省略。我們常想，理想的影片，可以無須說明。這也許一時做不到。至少，我們可以說，影片敘事的好壞，可以從說明多少看得出。說明多的，不是因為沒有情節，不得不插許多無聊的談話，便是編排不得法，沒有許多說明不能使看衆了解片中的情節。這種影片的導演者多是些沒腦筋的笨伯（如要最明顯的例，可以看中國自己出產的影片）。影片裏的說明，却除了必要的解釋，便是非常俏皮中肯的談話，沒有一個字的多餘。

從他說明的經濟，我們可以聯想到編排的經濟。中國舊戲裏有一

種無聊的說唱動體叫「過場」，電影裏有許多東西也可以叫作「過場」。凡是與故事的了解和與故事的演進沒有關係的穿插，都是些過場。排演手段拙劣的人，不得不用許多無聊的過場去連貫他的故事。根本不懂藝術的人，便只知道過場，不知道怎樣的表演的一件故事。（如要最顯著的例，還是看中國自己出產的影片。這種影片各爲八大本，十大本，其實把無謂的過場去掉，簡直找不出兩本三本的故事來）。價片的好處就在導演者手段的經濟，他只選那最精采，與故事演進有密切關係的事實映演，把一切過場刪削得乾乾淨淨。

什麼叫經濟的手段？這是說用最少的力量得最大的效果，藝術裏面經濟是要緊的，不僅僅短篇小說用得着經濟的手段，（雖然有些不懂藝術是什麼的先生，看了胡先生的一篇文章，便以爲除了短篇小說便不用說經濟了）。第一要懂得 *the art of omission* 便是知道怎樣刪

除一切無關緊要的東西。

賈波林先生不但運用極經濟的刪削的手段，他還常常用暗示的方法。他要寫巴黎拉丁區的放浪，也用一裸體圍布的女子慢慢的在大衆面前在她所圍着的長布。但是不讓我們自己看她的霧體，他只叫我們看代去布者的興采和觀衆的注意。這是極妙的暗示的方法。

我們又在他的影片裏時時看到藝術的節制。賈波林的影片雖然免不了美國人的通性 *Sentimentalism*，但是他竭力想免去電影片的通性。 *sensationalism* 他動人的地方，不在肉麻過火的表情，而在像實的，有節制的描寫。片中老年的母親看見了她獨子的死屍，並不像通常電影片的呼天搶地，淚下如珠，但只是呆木木的不識不知的立着，我們看了她，自然覺得十分真切的同情和悲哀。後來憤悲過甚，懷了手鎗去殺那害她兒子尋死的女子，沒有找到她回來，正看見這女子方伏屍嘔

泣，她非但沒有殺她之念，反而一面哭一面伸一手去拉她，這是何等深刻動人的描寫！

電影裏的舉止動作，往往只能在電影裏看得到，日常生活裏是一定不會有的。這種特別的舉動，在賈片裏真是極少。賈片人物的舉動竭力的企求逼真，結果比平常影片好得多。不但這樣。平常影片裏的人物，也只有在電影裏才找得到。賈片裏的愛子情深的老母，通達世故，冷，慰圓滑的老蕩子實在是在電影界特開生面的創造，可是又何等逼真！賈波林脫俗獨到的地方，已經說了好多，但是他用心細密的地方，更加不應當忘記了。他片中所用背景的材料非常的簡單，並且大都非常的樸素，可是我們可以看見，他在這裏面不知用了多少心思，不知絞了多少腦汁。背景裏沒有一件東西不會經過一番鄭重的選揀，調和，配合，所以沒有一幅不是極美麗的圖案。人物的舉動位置也一毫不苟，

所以沒有一幅不叫人覺到背景和人物動作的融合。因此我們在這影片裏時常得到與看名家書品相同的快感。

可是，賈波林先生花的洋錢太少了：他沒有給我們火山的爆裂，洪水的暴漲。他的方法太自然了：他沒有給我們昏睡流冰上或縛在斷頭機下的美女子。朋友們，還是多帶兩條手帕去看「空門遺恨」和「賴婚」吧。



我的朋友曹勝之先生從濟南來信，說我在「洋錢與藝術」裏說「空門遺恨」是 Griffitha 導演的是錯了。他說——

空門遺恨這部影戲不是桂樞士導演的。戲內主角鳩須 Gish 一向隨桂樞士演戲，這是對的；但自她姊妹合演二孤女後，便脫離了桂樞士的公司。鳩須歇息了幾個月便應了別公司的請求——一個特別

爲她組織的公司——隨同該公司往意大利攝成這部空門遺恨。……除非你真正的知道這部戲是桂樞士導演的；這便無話可說；不然我却要替桂樞士叫屈了。

勝之是對於電戲特別有研究的，他的話大約不會錯，至少我並不知道桂樞士是不是這本戲的導演人，我也因爲鳩須一向隨桂樞士演戲，所以就認爲桂樞士。不過是不是桂樞士與我說的話沒有關係，我不過桂樞士做那舖張派的代表吧了。勝之是極崇拜桂樞士的「自然不會與我同意。

勝之又指出另一個錯誤。

你說「我們常想，理想的影片，可以無須說明，這也許一時做不到。」這却錯了。Charles Bar's 'The Old Swimming Hole' 却完全無半字的說明，並且連 Subtitle 一個字沒有。當時果然也有許多人贊許

他獨創的好。本來我們看影戲要拿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時間去看字，未免冤了。但沒有說明的影片是絕對可能的。

這話我聽了很高興。我是不大看電影的，所以說的是門外漢的話，不意門外漢的理想居然已經早實現了。可惜我們沒有機會見到。

粉刷毛廁

以前學校鬧風潮，學生幾乎沒有對的，現在學校鬧風潮，學生幾乎沒有錯的。這可以說是今昔言論界的一種信條。在我這種喜歡懷疑的人看來，這兩種觀念都無非是迷信。女師大的風潮，究竟學生是對的還是錯的，反對校長的是少數還是多數，我們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無從知道。我們只覺得這次鬧得太不像樣了。同系學生同時登兩個相反的啓事已經發現了。學生把守校門。誤認了一個緩緩駛行的汽車爲校長回校而羣起包圍它的笑話，也到處流傳了。校長不能在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飯店招集教員會議的奇聞，也見於報章了，學校的醜態既然畢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丟盡。到了這種時期，實在旁觀的人也不能再讓它醞釀下去，好像一個臭毛廁，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在這

時候勸學生們不爲過甚，或是勸楊校長辭職引退，都無非粉刷毛廁，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我們以爲教育當局應當切實的調查這次風潮的內容，如果過在校長，自應立即更換，如果過在學生，也少不得加以相當的懲罰，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將來要整頓也沒有了辦法，

閒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我們在報紙上看見女師大七教員的宣言。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這個宣言語氣措辭，我們看來，未免過於偏袒一方，不大平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幾句就知道

了。

「至於品行一端，平素尤絕無懲戒記過之迹，以此與開除並論，而又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職俱爲自治會員，倘非長

才，衆人何由公舉？不滿於校長者，倘非公意，則開除之後，全校何至譁然？所罰果當其罪，則本系之兩主任何至事前並不與聞，繼則相率引退？可知公論尙在人心，曲直早經顯見，偏私謬戾之舉，究非室言曲說所能掩飾也；」

這是很可惜的。我們自然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但是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傳佈得厲害了。

黎明即起

政府特派往歐美調查——調查什麼，我忘記了——的專使徐樹錚先生在倫敦的時候，一個著名的報館 Manchester Guardian 派了一個訪員去見他。徐先生說起以前的政府會議總在清早，自民國以來，至早須十一時開議才開始，言下不勝其感慨。他以為一個人應當「日出而起，日入而息」，守着古聖先王的遺訓。Manchester Guardian 報因此社論裏同他開玩笑，說徐將軍關於中國政府無能的病源，發見了一個新奇的解釋。假使能夠在黎明的時候把那些相爭不下的軍閥召集到一處，他們也許會達到些有益國家的協議。不過我們恐怕就是這一個藥方也不能醫治中央政府的麻痺」。

我們雖然也很尊敬黎明即起的人，但是總有些疑心早起是不是一

定就是美德。有人做事喜歡在清晨日出的時候，有人喜歡在夜深入靜的時候——至少百分之五十的文人是如此的，我想雖然我并不因此希望去充統計學專家——有人在上午，有人在下午。一個人如果每天能做多少鐘點的工作，管他起來的時候是上午，還是下午！如果他鎮天的閒宕，或是酒食徵逐，或是無事忙，就是每日鷄鳴即起也有什麼好處呢？中國的講品德的總是喜歡在這種表面的形式着眼。所以才有如某某專使通晚抽大烟，第二天早晨去問了他老頭子的安才去睡，老頭子還稱讚他「黎明即起」的美德那樣笑話來。

東西文化及其衝突

梁漱溟先生在北大哲學系師生聯歡會的演說辭裏，有幾句也像徐樹錚先生的話，可以代表中國一般「道學先生」的心理，同時也與徐先生犯一樣的毛病。梁先生說：「替社會做事，享受總要薄一點才對。我從未走進真光電影場，從未看過海霸王的戲，總覺得到那些地方是甚可恥。」（見五月二十二日北京大學日刊）

人類不僅僅是理智的動物，他們在體格方面就求康強強壯，在社會方面就求同情，在感情方面就求種種的美。種種方面有充分的發達的人，才可以算完人。有一個方面不發達，猶之身體有一部分不健全，其餘的方面也少不了受它的影響，因之不能充分的發達。

董仲舒「十年不窺園」，泰谷爾却勸人多親近自然，不用讀書。

如果真不用讀書，那麼生長於自然之間的很多，何以牧童田夫不都成詩人？同時我們覺得如果董先生有時到園中去走走，他的開發學問的智力也許只有增進吧。自然固然是啓發美感的大寶藏，詩歌，小說，圖畫，彫刻，音樂，戲劇，那一種不可以啓發，訓練，節制人類的情感？所以看戲聽音樂非但沒有甚麼「可恥」，簡直是人人當有的娛樂。

以前中國人總反對遊戲，休息，總以為工作須終日不休才好。現在的人對於這問題的觀念漸漸的改了，他們知道休息之後，工作敏捷勤快得多，雖然還有人在教育會提議廢止星期日。梁先生的這種觀念，也正是如此。

自然，我們對於每星期必看幾次電影，梅蘭芳每唱戲必到的人，也沒有什麼同情。過度總是不大可取的。一個人對於飲食沒有節制尙

且成「老婆」，讀書而不顧其他的尙且成「書獃子」，何況別的呢？舊式的中國人，克已太甚，對於一切娛樂都同樣的排斥。結果音樂戲劇成了與賭博，逛簪子一樣不名譽「可恥」的事。人既情然少了娛樂，賭博，逛簪子也就成了與音樂，戲劇一樣平淡無奇的事了。所以我覺得梁先生這種意見與言論是有害而無益的。

一個朋友看了這一段閑話之後，說羅慎齋在湖南嶽麓書院當山長的時候，下命令把書院裏的數株桃樹斫了，因為恐怕桃花引動了書生們的邪思。這話聽來好像荒唐，其實是與梁先生是思想一貫的。

拆了火爐搭涼篷

新近有幾個朋友從南邊來，說南方的天氣比北方涼得多，他們都很詫異，其實這是很平常的事。北京差不多是可說沒有春天的，冬天一過，接著就是夏天。在這冬夏之交，性急的人和性慢的碰到一塊，就會一個帶著草帽，一個披了皮大衣在中央公園一同散步，這恐怕是除了北京在任何地方再也看不到的一種現象。所以久住北京的人說，北京的天氣，是「拆了火爐搭涼篷，拆了涼篷裝火爐」的天氣，這話一點都不錯。記得在英國報紙上看見一段趣話，說一家煤舖，把他招牌寫在門口的兩扇窗戶上，寫的式樣是：

Coal Order

Office

等到把窗門一開，那招牌就變爲：

goal order

off ice

北京的天氣可以說是被他一句話道破了。

勸進表與偉人的傳記

羅志希先生在本刊第二十期的通信，已經有了好幾個反響。第一個反響，便是吳老先生又做了一篇極有趣的文章，說他怎樣的「觸悟着一個『作文』的秘訣」（見猛進第十期）

山西太原寄來一個印件，題曰「傷心人之零簡」，是節錄某君致北京友人的信。末一段道：

「現代評論載羅家倫君自柏林寄書，擬請稚暉作小說。有西澄君者，亦擬請稚暉作書一本，敘說三十年來革命舊事。僕想此事，本稚暉前年對我們講過自動欲爲之者；即所謂必作之三種書：（一）英文 走 徑 書（二）科學 發明 趣 史（三）即此書是也。未知稚暉何日方能着筆，我們當絮聒催逼之。他老了也。」

吳先生既然自己說過這句話，那麼我們多少年來的希望也許還有實現的一天呢。

同時有兩位朱先生，一個從南京來書，一個從上海來書。因為通信擁擠的原故，他們兩位的信來了幾個星期還沒有登出來。我現在節錄於此吧。

南京的朱企霞先生提議請吳先生作一部中山先生傳。他說：

「……我和我的朋友常常說到，能有一個好手出來替中山先生作一部詳細的傳確是好不過的事。而且也很需要。但一說出「好手」，我們又覺得惘然，因為國內似乎並沒有能擔當這種工作的
人

昨天……讀着「吳稚暉與王爾德」，不禁心頭大喜。我當時就一口咬定：吳先生是替山先生作傳的一個「好手」。

替中山先生作傳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爲；長於文學的，不見得同時對於中山先生底生平曉得很清楚，而立傳却一方面是要注重事實的，這樣，結果只能成一部尋常的小說；而很清楚中山先生的生平的，不見得同時又長於文學，而革命家的事蹟又多少總帶點枯燥性的，這樣，結果恐怕不免弄的面孔板板地，令人讀了頭痛。可是，吳老先生既具文學的天才……又是中山先生的朋友……由此說來，吳先生之應該替中山先生作傳，是誰也不能駁回的了；並且，吳先生自己也是不能閃賴的了。誠然，吳先生有點不高興向文學方面賣氣力，但這種工作都不僅是對文學作貢獻，並且是對吾國底革命史作貢獻。所以，我以爲，你們如果不是好十二分的熱誠去向吳老先生上「勸進表」，你們就不能算是好人」。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消息報告給朱先生和讀者；吳先生雖然沒有答應作孫中山先生傳，他寫了一篇「中山先生革命的兩大基礎」，用年譜的方式敘述興中會與同盟會的起源和歷史，可以算是中山先生最初四十年的年譜。這篇文章，從下一期起，將陸續在本刊發表。我們希望朱先生還能勉強算我們是「好人」吧！

上海的朱湘先生却勸「文學上的志士」代吳先生做傳記。

「吳先生的經驗，西澹先生說的不錯，是很豐富的；他有小說上的天才一層，大凡看過他的「上下古今談」的人也都會承認的。但他不願作一個狄斯雷理 Disraeli，也不便于勉強。從前鮑斯威 Boswell蒼蠅般緊釘住英國的「中山」博士Dr. Johnson結果成功了一本傳記，在文學上留下了一件不朽的功績。這種方法如今很可移用到吳先生的身上來。但望有一個志士，發一個決心，從

今起，便緊跟於吳先生的身邊，每日作下劄記來，等到吳先生的精靈下去——因為他是亂黨，「洪水猛獸」，自認是達爾文的從猿猴傳下來的「獸」——陪伴我國的中山先生的時候，便將天天聚起的劄記加以整理，使成書形，那般不僅小說可有，連吳先生的傳記也有了。說不定吳先生會像約翰生那般，想治死那個替他作傳的人；但是一個不能加入「敢死隊」的人，怎有資格給一個敢死隊的革命黨人作傳？」

吳先生與英國約翰生相似之點不僅僅在大家用得着一個鮑士威。他的飲食起居，行動吐屬，種種地方都叫我們想起約翰生，雖然他們倆的意見是極端的相反的。這一層也不是現在才想到，我們久就這樣的說。蔡子民先生前四五年到倫敦的時候，我同志摩陪他去遊大英美術院，在那裏看到約翰生畫像。志摩說了些約翰生的文字風采，我說

「他是英國的吳先生」。後來出院時，蔡先生在門口買了許多畫片，看見約翰生像，笑道：「英國的吳先生，不可不多買牠兩張」。

做鮑士威不是容易的事情。他至少須得是一個勤快的閒人。不閒便不能蒼蠅般的去釘住約翰生，不勤快便不能把每天的談話事實記錄下來。勤快的人大都不閒，閒的人大都不勤快，所以世間找不到幾個鮑士威來。

慶賀——小劇院——成功

上星期北京西入的小戲院團體在六國飯店又做了一個新穎的試驗。一個中國的故事，由中國的演員，用中國的排演方法，佈景服裝，表演出來。它與純粹的中國戲不同之點，不過言語是英文，也沒有樂器和歌唱。這個試驗似乎很受觀衆的歡迎。劇本質樸簡潔，頗有天真之趣，表演也正是如此，所以到並不覺得怎樣的不自然。我們慶賀這劇本的作者凌淑華女士，導演者 *Miss A. James* 和張仲述先生，表演者燕京大學的女生們，尤其是飾牛大媳婦的張羣英女士，爲了這個小小新試驗的成功。

善本展覽會

還有一個值得紀念的新試驗，新近也在北京舉行，這便是中華圖書館協會所組織的善本展覽會。像我們一般有愛書癖而買不起古本的人，也有了一個機會，看到多少宋元以來的印本。可是陳列的書本，大都係北京圖書館和北京大學收藏的東西，所珍寶可愛的印本也有限得很。到過倫敦大英博物院的人一定會感到那裏陳列的中國善本，尤其如古代的五彩板之類，已經比善本展覽會所陳列的多而且有趣味。這大約是中國的藏書家沒有或不肯盡量合作的緣故罷。

五卅慘案

上海慘殺事件的真相，雖然經包辦世界新聞的英日通訊社的粉飾和曲解，究竟還是暴露於全世界了。各國智識階級勞動者所組織的國際工人後援會於本月六日從柏林來電（見本月十日晨報），聲明「與中國國民持一致反抗之態度」，並且「願在言論以外，從行爲上實行吾人對中國之援助。」他們的話，說得非常的激昂——「中國人民之敵，亦即吾人之敵；中國人民之戰爭，亦即吾人之戰爭；中國人民之勝利，亦即吾人之勝利」。

這個會「代表五百萬之各種知識界勞動者」，他們的中央委員會委員，法國是 Henri Barbusse 英國是 Bernard Shaw 美國是 Upton Sinclair 德國是 Clara Zetkin 瑞士是 Prof. Forel 都是各國極有名的著述家。這些

人幾年前組織了一個國際智識階級反抗戰爭，主持和平及人道的結合，叫光明社 Clarte。現在的這個「國際工人後援會」也許就是由光明社變得來的。

我們久就知道，世界各國——連英日在內——的勞動者，不論精神的還是腕力的，一定會對吾人表示深切的同情，世界各國的主持人道與正誼者，一定會不滿意於英日兵警的慘殺，只要他們明瞭事實的真相。羅素常說，他極願意代中國人說話，只要有人供給他說話的材料。覺到同樣困難的西人實在有不少人。他們明明知道中國受了委屈，但是所有的材料都是從一方面來的，他們不能據理力爭，最多只好在那一方面的報告中挑幾個破綻罷了，他們那些富於同情的知識階級尚且如此，其餘的人更不用說了。

所以我們目前的工作，國內的運動固然重要，國外的宣傳也萬不

可緩；對於抱侵略主義用侵略手段的英國人，日本人固然應當竭力反抗，對於主持和平，自由，正誼，人道的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日本人也應當竭力的聯絡。後一種的工作現在也有人在做了。好幾個團體——如北京大學，北京留英回國的教授，北京各校學生等——都有報告真相的電報到國外去。

這不過是第一步，事實的真相不是一兩個電報所能說得盡的，消息的供給是應當源源不絕的有繼續的。我們因此很後悔四年前同羅素先生等所討論的互相交換新聞的組織沒有成功。可是，我們希望現在有人起來組織這樣的結合，把所有的材料都供給到各國去。

※

※

※

※

※

上海現在已經差不多達到總罷工的程度了。他處人民目前的大急務，自然就是設法援助及接濟上海罷工的工人。同情的罷工和罷市是

沒有實用的，雖然我們極贊成全國能夠在同一日罷工，罷市，罷課一天。這樣的表示，如果全國能夠實行，很可以給全世界以一個極深切的印象，叫他們知道我們全國人民是怎樣的沉痛和決心。

至於募款的手續，自然應當讓各人「各盡所能，量力輸助」。有時爲方便起見，各機關不得不採取劃一的徵收辦法，那麼也只好定一個至少的限度。此外還是讓有力量的多捐些，沒有力量的少捐些，悉憑各人的自由。因爲劃一徵收的辦法，表面上看來好像公平，實際上實在不然。拿教員來說吧。往往同校的教員可以分——汽車，馬車，包車，自行車，雇車，徒步——六種階級。這雖是笑話，也可以表示同樣職業人的經濟狀況和負擔大不相同。一個人是獨身，另一個子女成羣；一個人要養父母妻子寡婦孤兒，另一個非但不用養家，並且常得家庭的接濟；一個人只有一種進款，另一個人兼了好幾個差使；所

以同樣的幾分之幾，在一個人不過少請兩次客，在另一個人連稀飯米都買不起了。中國人遇到這樣事，表面終覺得不好意思開口，暗中便消極的不合作，所以我們雖然希望捐助愈多愈好，却並不贊成高限度的劃一徵收辦法，

※

※

※

※

※

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和學生上星期一到執政府請願，又從執政府到段其瑞先生的私宅。離段宅還有幾百碼，兩個轉灣的時候，迎面來了一隊兵，攔止去路，一個個槍上裝起刺刀來。這是何等事，用得看這樣的態度來對待？自然引起請願者的悲忿。他們宣言不進前是可以的，兵却不能不撤退。在這相持不下的時候，請願者有流淚的，有演說而痛哭失聲的，沒有一個不憤形於色。眼睛漲得紅紅的。可是兵士還是堅硬的不肯退。這種無理的蠻橫更加增加請願者的悲忿，他們便

整隊的往前進行。兵士們一面抗拒，面齧子彈，口中喊着「打，打！」但是在前面的還是進行，假使兵官那時沒有下令叫兵士倒退，北京不免又有流血的慘劇了。

在當時悲忿填胸，覺得進行是天經地義，生死不成問題。過後想想，這樣的打死了，可真不值得呢。那班兵士，我們雖然稱他們爲同胞，其實蠢如鹿豕，什麼都不懂得。同胞他們去較量什麼？可是當時再想不到。這就是羣衆的心理。

在國外的時候，事事處於旁觀的地位，所以自己覺得是理智的動物，不易受感情支配的。現在知道自負的理智也不過這樣。

當初我們立在執政府門前的時候，看看出出進進的執事人們，不禁得到一種奇異的印象。中國人本是一個醜陋的民族，可是像那些其

貌不揚的人們，一時也不容易找出這許多來。難道物以類聚，不那樣便不會進那個門了呢？還是進了那個門便連相貌都變了呢？

兼

兼

兼

兼

兼

北京有兩個報是幫了英國和日本說話的，一個是順天時報，一個是東方時報。大家知道順天時報是怎樣的，因為它口口聲聲幫助着英國和日本。東方時報就不然了，它的英文部幫着英國人罵中國人，中文部又幫着中國罵英國人，只才是面面俱到，會做生意的報紙。可是，要是強迫我們看牠們裏的一種，我們還是覺得看順天時報舒服些。

乾着急

「噫！真急死人，真氣死人」。梁任公先生這樣的太息痛恨，因為他的主張——趕快組織會審委員會——雖然「英當局聞已露可以勉從之意」，雖然中國的「當局也頗贊成此說」，可是因為「學界反對」，政府終於不敢提出。

「噫！真急死人，真氣死人。」我們這樣的太息痛恨，因為滬案鬧了半個月，許多人還沒有了解它根本的問題，就連素以學通東西敏捷出名的梁任公先生也沒有懂得。

梁先生同他的朋友只看見「殺人抵命」那一點。所以他們看來，不組織會審機關便無從調查事實，不調查事實便無從確定罪名，罪名不確定，便達不到殺人償命的目的。法律家的眼光原是如此的。並不

是他們錯了，只是他們看見了目前的土壤便看不見遠處的山丘，他們看見了兩三個斑點便忘記了全豹。五月三十日的慘殺可以說是租界吏役人們個人的暴行，可是事前的禁止游行，濫捕學生。是個人的行爲麼？後幾天的「戒嚴令」，是個人的行爲麼？中國外交當局雖然提出抗議，租界軍警還是天天慘殺，天天查封學校，天天施行種種高壓強暴的手段，也是個人的行爲麼？英領事爲什麼不禁止租界吏役？英公使爲什麼不令英領事禁止租界吏役？這是可以會審委員會的機關，法律的手續解決的問題麼？

滬案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北京大學教職員同人在他們所宣布的關於滬案性質的辨正一篇文章裏已經說得明明白白。我們知道與梁任公先生同意的很有些人，他那篇文字可以代表一部分法律家的主張。因爲他的一篇文章而讓大家有一個討論和澈底了解這問題的根本點的機

會，梁先生也不爲無功了。

梁先生的意見我們是不贊成的，可是我們相信他的動機也出於愛國之心，只是他上了一班拘謹的法律家的當罷了。他錯了，我們應當指正，可是我們只須用言論折服他。聽說有人去禁止他再做文章，並且命令他即日離京，那未免做得太過分了。

業

業

業

業

業

某君接到他上海的一個朋友某西人來信，說起上海方面的運動，幾乎只有宣傳，沒有組織。他又說，這次的罷工，西人生活方面並沒有感覺到什麼不方便。大約「沒有組織」實在是中國人的大毛病。中國人民無論有事沒事總是一盤散沙似的，團結不起來。現在固然沒有領袖的人才，說到這裏，我們不免又傷悼中山先生的逝去，假使中山先生尚在，中國還不至於這樣的沒辦法吧——可是中國人本來就不會

服從首領。「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如何是好？

就以北京來說，對付偌大的滬案，我們總希望，總以為，所有的團體可以聯絡起來了，可是非但不如此，反而發生了百十個小團體。這些小團體都在——至少其中大部分都在——努力的幫忙，我們並不疑惑。可是因為他們是小團體，究竟力量有限，所做的事亦不免大同小異。

怎樣的募集大款，援助上海工人？怎樣的分配這款項，使罷工的工人每天都領到相當的接濟？怎樣的組織罷工？怎樣的實行經濟絕交？怎樣的使全國要求歸於一致？怎樣的進力作戰？這都需要大規模，有計畫的組織，不是東一個會，西一個社，今天一張傳單，明天一張宣言所能了事的啊！

業

業

業

業

業

至於宣傳的功夫，實在做得很可以了。北京城裏大約沒有人不知道這回事了吧？可是，平常的市民對於這事究竟作怎樣的觀念？我疑心普通的傳單實在說得太深了，他們一定不能了解。如果所有的傳單都寫得像「傷心歌」，「上海的亂子是怎樣鬧起來的」那樣的簡單明瞭，他們那方的反響還可以大得多。

不要說平常的市民了，就是一班讀過「詩書」的「士大夫」也還是糊裏糊塗的。有一天爲滬案開一個大會的會場上，有段執政的代表某將軍還這樣高聲的說：「什麼打倒帝國！難道民國殺了人就不用抵命了嗎？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第一章就是「殺人者死。」帝國與民國都不准殺人的。什麼打倒帝國！」

所以民衆運動的口號應當是很簡單的幾個字，不要太多了，要人都懂，人人都聽了它感到一種衝動，人人都能喊。就是一個口號也

不是容易發明的。

※

※

※

※

※

募捐應當集中辦理，更是刻不容緩的事。以前的辦法未免太散漫沒有條理了。大規模的款項只有各機關去籌畫。至於街上的募捐只好作爲小補。近來街上的募捐既沒有一定的日期，又沒有一定辦法，徒使人民感受不便。實際上並不能捐到多少錢。在外有事的人，一天至少要捐五六次，起初許多人捐的是銀元小洋，漸漸的只出銅子，到後來不勝其繁，連銅子部不情願出了。這樣的募捐是不得法的，何況因爲沒有組織，免不了下流人有假冒之事。一萬隊中有一兩隊這樣的人，以後梅不好辦了。

多數與少數

我向來就不信多數人的意思總是對的。我可以說多數人的意思是常常錯的。可是，少數人的意思並不因此就沒有錯的了。我們主張什麼人都應當有言論的自由，不論多數少數都應當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可是，我們固然反對多數因為是多數就壓制少數，我們也不承認少數因為少數就有鄙夷多數的權利。

中國人向來是不容異己的論調的，所以在全國鼎沸的時候，有人居然肯冒衆怒出來說幾句冷話，只要牠是有誠意的，我個人十分佩服他的勇氣，不管他說的對不對。可是他的勇氣不一定就使他對了。把這次的國民運動與拳匪來打比，實在未免過於不偏不類，在中國的外國人，因為他們始終「什麼都學不到，什麼都忘不了」，自然這樣的

想。中國人自己如若不看見這二十餘年的進步和分別來，只可以證明他們自己的不進步。至於人家已經打了頭陣，自己跟在後面說便宜話，還要以「袁許」自負，——希望我做文章，所以用激將法——我們聽了着實有些替他肉麻。

我是不贊成高唱宣戰的。中國的大兵，叫他們殘殺同胞雖然力量有餘，叫他們打外國人就非但沒有充分的訓練，並且沒有至少限度的設備。如果許多熱心的軍民人等自己投効去作戰，那麼，以血肉之軀去和機關槍，毒氣砲相搏，就完全犧牲完了也得不到什麼。

可是，我們不能因為力量不及他人的什麼都逆來順受。我們雖然打不過人家，我們不妨據理力爭，不妨用他種方法與他們奮鬥。我們固然不宜宣戰，但是要求英國撤回公使，派兵到租界去保護人民並不是宣戰。英國的政府也一定不會因此就與中國宣戰，因為他們是以

民意爲何背的，中國政府這樣的態度正可以告訴英國國民衆這次的運動不是暴動，而是全國的義憤。英國握政權的固然是帝國主義者，普泛民衆，尤其是勞工階級可不全是帝國主義者。

總之，中國許多人自從庚子以來，一聽見外國人就頭痛，一看見外國人就膽戰。這與拳匪的一味強蠻通是一樣的不得當。如果一個孔武有力的大漢打你一個耳光，你雖然不能與他決鬥，你儘可理真氣壯的與他評一評理，不能因爲恐怕他再打你一頓便縮縮頸跑了，你如縮頸的跑了，或是對他作一個揖，說他打得不大得當，他非但不見得看得起你，還許要尊你一聲「死豬」呢。

業

業

業

業

業

有人說，中國人永遠看不見自己的尊容。自己的軍閥每年殺人遍野，大家一聲也不響，一旦外國人殺了幾十個中國人，便全國一致的

憤慨起來。這話是很對的。可是，我們不能因爲一向沒有糾正軍閥，現在就不抵抗外人。我們希望大家竭力的抵抗外人，因爲如果殺了你幾十個人不抵抗，將來也許殺你幾百幾千幾萬人。我們同時希望以後國民對於內亂也要有同樣覺悟，也要有同種的憤慨，也要有同樣的抵抗才好。

維持

中國人實在可憐。最可憐的要算現在的政府了。一方面看見衆怒雖犯，不敢得罪全國的民衆，一方面也不敢大大的得罪外國人，所以既不剛，又不柔，既沒有政策，又沒有步驟。在許多國裏，這樣的政府在這樣的時候早就存身不住了。歐洲歷史裏就有許多例子。然而中國人還是維持它。

英國人却厭它了。天津的京津泰晤士報。上星期六的社論就有恐嚇政府的宣言：「有關係國恐怕免不了要與能發號施令的某方面接洽；請求張作霖將軍到北京來，保護各使館免得受人攻擊，並且襄助解決目前的問題。」這能發號施令的某方面目下正在天津，天津的英國人說這樣的話，不至於完全沒有把握。那麼如果這問題真這樣的解決時，

中國的人民又怎樣呢？

乾脆

前兩星期的風氣是沿街募捐，這兩星期的風氣是游藝會助捐。游藝會因爲大都是學界的人組織的，所以捐來捐去，總是有數的一種人出錢。你說你已經捐了多次了，他們說是看戲，說你你不愛看這種戲，他們又說這是援助上海工人。不要說一個人不會有這許多時候許這多精力去參與這許多游藝會，如果真去參觀那麼至少十次裏有九次叫你懊喪而回。中國本來所有的游藝會，目的就大都在捐錢，不在娛樂觀衆，只要捐錢的目的達了，隨便做些什麼玩意兒就很對得起人了，何況捐錢的目的是援助工人。所以什麼都不用預備，什麼都可以隨意充數，什麼都可以隨意變更。你如說聲不滿意，他們說「大家是盡義務啊？」我們覺得這樣的游藝會募力款還不如乾脆的捐錢，否則應當把

它當一件事幹，讓到會者得到一點愉快。

智識階級

「中國國家弄到這般田地，完全是智識階級的責任」，這是丁君先生感慨的話。我不信任何一部分少數的人能把一個國家弄到怎樣的田地，尤其是中國的智識階級。實在我就有些不清楚誰是中國的智識階級。無論什麼論政，論學的書籍雜誌出版，牠們的讀者幾乎全都是教員和學生；無論什麼報章雜誌裏的投稿者，也幾乎全都是教員和學生；無論什麼地方遇見了人，同他們談話，他們的見解和智識幾乎全都趕不上一般的學生。現在丁先生把學生們一筆鉤到智識階級的外面去，那麼誰是智識階級呢？僅僅幾個教書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把國家強弱存亡的責任都放到他們的身上去，不太冤枉？國家的責任，不是幾個人可以負得起來的，「智識階級如果有愛

國的誠心，有愛國的能力，「芸芸衆生如果還是醉生夢死，外國人還是可以欺負你，還是要欺負你。如果這一次沒有學生的奔走呼號，沒有上海的罷工罷市，那麼任你智識階級儘力的愛國，這個血案早就消滅於無形了。（也許外交家正要如此。）

國事是國民大家的事，只有國民大多數能把牠弄好弄壞。中國的國民實在是一程度不夠。「拉洋車的與坐洋車的都一樣的難感化，小鋪子裏的掌櫃與大財主也一樣的慳吝。這一次滬案的宣傳也可以算得普遍了；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這回事了。然而全國總罷市半天的那一天，北京是怎樣的景象？沒有一個鋪子關上門？沒有一個店子下了半旗沒有一個洋車不在街上拉。然而只要警察下一個命令，家家今天就可以掛上五色旗，明天就可以掛上龍旗，今天就可以五點鐘開市，明天就可以五點鐘閉門。

僅僅罵他們冷血是沒的用的，也是冤枉的，因為他們實在是程度不夠。許許多多的思想感情不是一天兩天能夠打進腦裏面去的。只看端節遊行那一天，教育界之外，只有工廠的工人多，許多工廠的工人裏面尤其是印刷業的工人多。這不是他們的血比商界農界的人熱。工廠的工人多少人在一塊兒，對他們容易做宣傳的工夫，他們自己有了討論研究的機會，印刷業的工人智識更加高一點，與宣傳的接觸又多一點，他們了解的力量大，自然血也熱些。

北京如此，內地的各大城想來也不免如此，小城小鎮更加不用說了。國民的程度這樣幼稚，有人還要主張同外國人火拼，讓他們殺到我們末了一個人才止，真是太不觀察事實的幻想，我恐怕手執順民旗，跑在道旁的民衆是不會沒有的。

中國的沒出息，還是一般國民的責任。不要讓中國沒出息到底，

那是智識階級——連學生在內——的責任。宣戰我是不贊成的。可是外國人把刀子放在我們的頸子上，我們不動一動，或是哀聲求饒，我也是不贊成的。我們現在應當在宣戰一途之外想在種種方面來抵抗英國人。如能不讓步而避免戰事，終要設法的避免戰事。可是如果英國人與我們宣戰，或是逼我們到不得不作戰的一步，那麼我們也只好作戰。我們明明知道作戰是犧牲，作戰是不會贏的，但是我們替這幾年来的老大古國究竟爭了一點面子。如果我們只看了物質方面，把一切氣節，人格，名譽都丟掉了，什麼人都同北京的市民一樣見識，這樣的民族還要他幹麼？

戰爭是苦事，他也不是什麼有趣味的事。戰爭的恐怖，戰爭是地獄。我們就去作戰，也要存了一個不得不入地獄的心。一般「文學家」們已在那裏贊美戰爭，歌頌流血，我們讀了不覺心痛。我不希望我們

多有這樣的英雄。我希望我們多有些憎惡戰爭而臨事不得不挺身去幹
憎惡的事的平常人。

行路難

在中國行路真難。不用說什麼「畏途巖巖不可攀」的蜀道；不用說什麼與牛馬同室，受牛搜馬勃的燻蒸，蚊蚋蠅蟻的吞噬的西北陝甘路；不用說什麼伏莽遍地，鎮天的提心吊膽，動輒被架去的湖廣等路；就是在交通最便利的津浦路上旅行，也就夠受的了。

假使你是紅極了的闊人，尤其你是帶兵的，那你可不用愁，因為鐵路上有的是專車。假使你有的是錢，你也不用着急，特別快車的頭等也比得上歐美各國的舒服了。假使你是普通的小百姓，你沒有錢坐特別快車，你連普通快車的二等都坐不起，那你就得兩天一晚像罐頭魚似的擠在車廂裏，動也不得動，氣也不得喘。要是你搶到了一方尺大的坐位，那便是你有福氣，要不然你就得整天整晚的站着，你還得

謝天謝地，因為你搶了一個立腳的地位。你說這是苦極了，可是誰叫你做普通的小百姓的呀？鐵路上的車本是不少，可是運兵要緊呢，還是裝你們這些小百姓要緊呢？鐵路上的辦事人還同我說，那些軍官們，如果要到南京叫一個妓女，就得掛一輛專車，如果要去賣一雙鞋子襪子，就得掛一輛專車。這自然也是應該的，他們每年都得為你們互相打一次仗，連這一點小小的權利都不得享嗎？

聽說自從「鎮威上將軍」管住了津浦等路，旅客們已經沾了光了。以前兵士們上了車，可以命令已經坐在車中的客商人等把艙位讓出來，如有半個不字，立即拳腳交加。現在可不同了。從天津到上海，車站上都帖着鎮威上將軍煌煌的告示，或是「奉鎮威上將軍命」的告示，軍士們另有車廂，不得與旅客混坐，並且有了某種官職才得坐二等，某種才得坐頭等。你們雖然要奇怪為什麼從北京到上海的職

路，都得受鎮威上將軍的管束，你們終究是托了他的福才得幾分的安靜。雖然他老先生——說錯了，大約應當說他老將軍罷？——並不與你們客氣，他的這種施設，並不爲你們打算，因爲那告示明明的說：「若不恢復原狀，不惟影響商運，尤慮妨礙行軍」他老將軍的德澤，究竟遍及你們了。

不過鎮威上將軍的德政還不止這一點。一路的車站，都有他的大兵把門，旅客下車，不論天雨赤日，如經叫住，都得把行李一件件的在露天解開受查。至於京津路上，上將軍的威嚴尤其可怕。一班趾高氣揚，如虎如狼的下級官們都往來前後，檢查行李。我們此次從天津到北京，一連受查三次；先一個軍官令開箱，過了幾分鐘，又一個軍官來了，同他說「已經看過了」，他就厲聲的說「叫你開，就得開」，不一會，第三個兵官又來了。經了這番經驗，到車站受稅關檢

查時，只覺得警察們真是和藹可親。

坐車固然很苦，下了車也不就舒服。中國的旅館真不是人住的地方。嘈雜的聲音，非但鎖天不靜，簡直通晚不休。猜拳聲，弦歌聲，談笑聲，怒罵聲，尤其是麻雀拍拍聲，通宵達旦，叫你不能一時合眼。你如果因為習慣了或倦極而偶而睡着，那麼臭虫蚊蚋四面來攻，因為臭虫固然是中國旅館的特產，蚊蚋也因為中國旅館喜歡用那些合不上的「外國式蚊帳」而沒法驅逐，住旅館的人也只好起來坐以待明了。

在歐洲旅行，過一個國境。就得換一種錢幣，歐洲人還以為苦，許多人如文豪威爾思等尙且提倡廢除國幣，統一錢幣。可是我們貴國，在一國之內，就有種種的困難。北京的鈔票，南京上海不用，已經是奇了，北京中國銀行的票，上海中國銀行不要，天津交通銀行的

票，上海交通銀行不用，豈不是咄咄怪事？不但銀票如是，銀幣也不
逃此例，上海用的廣東造的小洋，不論年分，到了南京，只有民國八
年以前的小洋才通用，到了濟南以北，廣東的小洋就用不通了。交通
最便利的京滬路尚且這樣，其餘的地方，又不知怎樣呢。這是我們中
國獨有的國粹，可是值得不值得保存，我就不敢說了。

象的故事

前波蘭總統，著名的大音樂家 Paderewski 在倫敦的新聞記者俱樂部演說，講了一個故事。據說這個故事近來在歐洲是極流行的。有人請一個英國人，一個法國人，一個德國人，和一個波蘭人都去著一篇關於象的論文。英國人預備好了打獵的行裝，到印度去了，一年之後，回來寫了一本有許多插畫相片的書，叫「大象，怎樣的去打牠」。法國人到巴黎的萬牲園去看裏面養的象，結交了看象的人做朋友，請他吃了幾次飯，六星期之內就寫成了一篇「象的戀愛」。德國人把所有說到象的書籍文件都讀完了，寫了一部三厚冊的鉅著，名字叫「象學入門」。俄國人回到樓頂上的小屋子裏，喝了無數瓶的 vodka 酒，無數壺的茶，寫了一本小書，叫「象——有沒有這種動物？」波蘭人

回去就寫，六星期後出一本叫「象與波蘭問題」的小冊子。

這一段短短的故事把英法德波蘭的民族性形容得淋漓盡致，惟妙惟肖，無怪乎盛傳一時了。要是裏面又加了一個中國人，我想他一定在五分鐘以內就寫好了一首白話詩！「龐大無比的象呀，我羨慕你那執厚的皮」。要是兩句的白話詩算不得一篇論文，那麼他回去翻翻舊雜誌，副刊合訂本之類，東鈔一段，西湊一頁，大約用不着兩天，一篇論文必定可以寫好了吧。這自然是說在平時的話，若在現時，他當然寫一篇「英日帝國主義之侵略者——象」，還用得懷疑嗎？

「烏龜坐電車」及其他

走出上海車站，最先看到的便是壁上貼着些「烏龜坐電車」，一類的警告。烏龜是上海人最刻薄的罵人名字，壁上這許多的烏龜圖樣和字眼大可以證明上海愛國志士的沒有辦法和失望。果然，一輛電車來了，裏面坐的立的不少的是人，短衣的有，長衫的也不少，雖然比五卅要稀少些。

不要粗粗的看過了這末一句話。這少數的不坐電車的人雖然不能影響電車的營業，却大可以給自己許多的不便，因為不坐了電車就得坐黃包車，黃包車夫就可以比平時多要價一倍，兇十倍。要是你是一位心裏有志氣，袋子不掙氣的朋友，你就得徒步的走。可是我們何必單單指出黃包車夫來說呢？大家不買洋貨了，國貨大有振興改良的機會

了吧？誰知國貨還是照樣的國貨，只是比先前的價格高一倍。中國商人有了這樣的特長，商業怎樣的會不發達呢？

你如走進了公共租界，便會見巡捕們背上都挂着鎗，你如走過一條橋，便會看見把守的水兵和鐵絲網，你如經過新世界，華童公學等地方的門首，便會看見裏面架起的砲和住着的兵。可是除此以外，在中國人方面，簡直沒有什麼可以表示這是劫後的上海。人民依舊熙熙攘攘，商店依舊的忙碌，大世界依舊的人山人海。

上海依舊是上海。可是這一次上海在我心坎上刻了一個很深的印象，在我的想像裏發生了一個恐怖的夢魘。上海完全是外國人的上海，不久中國就會不知不覺的變成外國人的中國。看啊，南京路上的汽車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你如像我一樣在那裏立一會，數一數來往的汽車，你就會發見每十輛汽車至有七八輛裏坐的是黃頭髮，

帶眼睛的人，你如再像我一樣的到靜安寺路和霞飛路及那裏的附近去走走，你就會看見十年來添許許多多美麗的花園和舒服的別墅，裏面住的又都是黃頭髮，藍眼睛的人。中國人住的是好像蜂窠似的小弄裏的小屋子，住得起三樓三底，四樓四底的已經是資本家，中等人家自然只有一樓一底，工人們一家住一間半間屋已經不容易了。我沒有調查什麼統計表，我也沒有參考什麼戶口書，我不知道上海有多少洋人，佔全體人口幾分之幾。我想，上海的洋人同中國人相較，總不過一與九十九之比吧？可是這百分之一的洋人有的是汽車，別墅，種種的奢華品，比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都舒服了十倍。

總而言之，他們西洋人是貴族，中國人他們的奴隸；他們西洋人是享樂者，中國人是供給他們的生產者。我想到希臘古代的情形，主僕們苦樂的相去大約也不過這樣吧？我又想起現在的斐洲，西洋人所

希望於土人的也不過這樣吧？我不禁的想再五十年，再一百年以後，中國也許就是擴大的上海，每一城裏有一條南京路，每一城裏有一條霞飛路，那裏住的是西洋享樂者，擠在別小街上的是四萬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工作的牛馬。

我又想起了威爾思的小說八十萬年後的地球。那時工人與貴族完全變成兩種不同的生物，貴族們成了沒腦經的傀儡，工人們成了不見天日的怪物。上海已經有這樣的傾向。聽見兩位在海關辦事的朋友說，外國人的薪水比中國人多幾倍，但是一切麻煩的工作還都是中國人做，外國人整天在外坐了汽車逛。又聽見一位在美國學實業的朋友說，他在一個美國人設立的某種調查所辦事，裏面有三位美國人，六位中國人，在中國人裏他的薪水算最大，可是還不及那兩位沒有受過中等教育的美國人的一半，至於種種調查和報告，還得他來做。

中國人也真沒有出息。他們代外國人辦事，能力實在不讓外國人，也許有時超過外國人，可是代中國人辦事，什麼也不行了。開北辦的自來水廠，就取蘇州河的黃泥水。開北的電氣廠，更是笑話了，自己沒有發電機，只向租界工部局去買電，再轉賣給用戶，在中間抽一些利息，所以工部局停止大工廠的電力，開北電氣廠的紙老虎也就戳破了。怪不得上海有名的商人都靠洋人吃飯，怪不得所謂上海資本家，十個中八個出身是康白度。

我在上海的時候，工部局正在發表它那「誠言」。沒有一片牆上，沒有一個電線幹上沒有「看誠言」三個大字。可是它那「誠言」的本身却不容易找到。有一會我偶然看見，記下它中間的一句話「中英通商，有利無弊」。誠哉斯言，英人來了，中國人做細崽做康白度的發了些小財，其餘的也沾了洋大人之餘光，住了一間半間蜂巢樣的

小房子，還有什麼不好呢？

官氣與洋氣

北京是官氣重，上海洋氣重。北京人見了「束髮小生」也稱他爲老爺，上海人頭童齒豁還喜歡充老爺。北京女子的服裝無論怎樣的變化總是中國的，上海——我在霞飛路和虹口一帶看見許多來來往往的女學生，從後面看來，除了上面漆黑的髮，和裙下粗大的腿，簡直看不出是中國人來，而且她們說的是滿口的英語（我至今還不敢肯定她們是不是中國人。）

上海洋氣雖重，洋人的好處却沒有學到。上海是中國的大商埠，生意應當會做了吧？可是，中國內地的商人夥友雖然非常的恭謙，外國的店夥也非常的善於應酬，你到上海商店去買東西，比向朋友借債還不舒服。他們三三五五的在一塊兒談笑，買客只好恭立靜候，如果擾

亂他們的清興，他們的眼光和聲調比北京總郵政局的人員還可怕十倍。這種毛病，就是中華書局等大商店還不能免，只有先施永安等公司在這一點漸漸的有些洋氣了。

模範縣與毛廁

聽說無錫是中國的模範縣。那位比柏克赫斯特女士前十任或前二十任的被崇拜者杜威教授好像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說無錫和南通是中國最發達的實業區。有人說，南通的實業是燧屋裏的花，經不起風吹露涼的；假使土皇帝沒有了國家的公款去辦他私人的實業，或是不幸而自己歸了道山，南通的實業也就很有些危險了。無錫的實業是一種自然的發展，那是無錫人最得意的事。

無錫果然是中國絕無僅有的實業區。從火車站上望去，可以看見疏疏密密的三四十個大大小小的烟突，而且嬈嬈的在出烟。下了火車便可以坐洋車到中國洋式的旅館和飯店，或是直到有名的惠山。無錫也實在夠得上當中國的模範縣的名稱。雖然沒有自來水，却有一口極

深的洋井。城中居然有一座三層樓的圖書館，而且居然每天有二十個人去看書。圖書館的旁邊就是公園，裏面有亭，有台，有樓，有閣，有曲徑，有石橋，雖然沒有中央公園的蒼翠的松柏，却多了許多豐潤的綠草；裏面也有池，池邊楊柳依依，池中蓮葉田田，池畔也有茶座。每當夕陽西下樹，許許多多男女遊客，到此間吸茗納涼，近可以看見紅白荷花，遠可以望見池對岸老婆子們臨流洗馬桶，霍霍之聲，壓水而來。這種較遠的風景，我們驟然看了有些奇怪，可是這不過因為我們沒有看慣吧了，並且很可以證明這實在是市民的公園，用不着買票才能進門。非但公園不賣門票，就城外私人立的梅園也完全公開。梅園居高臨下，可以眺望太湖和五里湖二湖之勝，園中梅樹極盛，正二月間，遊人衆多，不亞鄧蔚。據說梅園的修蓋和車道的鋪造，都是本地實業家姓熊的兄弟兩個人出的錢。

無錫的足稱爲模範縣，可以算是證明了吧？它還有一個特點，大約到過這模範縣的人，沒有不覺到的。除了新修的馬路，無論城裏城外，所有的街道都狹窄非常，而且幾乎每條街總有許多——毛廁。英國城市裏最可注意的店舖是酒舖，法國城市裏最可注目的店舖是咖啡館，上海到處都是醫生的招牌，無錫到處都看得見毛廁。你在無錫街道上行走，你沒有法能夠避開毛廁的燻蒸：幾家人家中的間是一個毛廁，幾家店舖的中間又是一個毛廁，往往吃食店與毛廁，比鄰而居。生長北方的讀者，也許要覺得奇怪，爲什麼市政廳不加干涉呢？爲什麼市民不起反抗呢？他們不知道南方的毛廁，不是北方的「公益廁所」，但是與英國的酒舖，法國的咖啡館一樣生利的店舖。無錫是中國的實業區，毛廁也是一種有利可圖的實業。平常的市民雖然厭惡臭氣，可是怎樣能與實業家及紳士抗呢？蕭伯納在他的 *Widowers Houses* 裏笑罵

一班貧民窟的房主，以不可住人的房屋出租，去換自己的安樂奢華，假使他知道了有一班安富尊榮的紳士的進款是以全城的臭氣和疾病換來的，不知道他要說什麼話了？中國人的重視物質，世界上的民族實在沒有匹偶。然而中國人總是自負的說我們有的是精神文明！

說到精神文明，無錫也實在是中國的模範縣，因為中國獨一無二的國學專修館就設立在那裏。據說裏面的學生有許多是遠道負笈而來的，裏面的功課，算學都沒有，不用說夷狄的語言和科學了。這個專修館是無錫最有名的學校，它的校長又兼某中學的校長，所以國學醇厚之風，被及四民。什麼新思想，新文學，無錫是不要的；什麼現代評論，語絲等等，無錫是買不到的，無錫人看的是——大約古聖先生的嘉言儀行吧？至少上海的屁股報是非常風行的，屁股報裏的陰事，逸史，艷辭，淫語，不是中國國學者私下最愛的東西嗎？所以「國學為

體，科學爲用」的這一句話，無錫人實在做到了。無錫真不愧爲中國的模範縣！

理由

章行嚴先生在他的「新辦國立編譯館呈文」裏面，說及現在出版書籍的稀少，至深浩歎，可是他歸咎於白話文體的盛行，却實在可笑。聽他的話，好像只要大家廢止白話，高文典冊便可以叱嗟而來似的。可是試問在新青年提倡白話的前十年裏有過什麼偉大的作品？自從白話文盛行以來，又有過什麼說得上的文言的作品？這二十年裏，有過什麼文言著作可以比得上吳稚暉先生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都是些白話的作品？白話文言與出品多少實在是風牛馬不相及，斷不能並爲一談。行嚴先生說「書不必深，有用爲宜」，可是文字却必須「字斟句酌」，排比四六，我却覺得意思不妨深些，文字不妨淺

些，這是我們思想根本不同的地方。

至於著述的稀少，實在另有原因，與白話文沒有絲毫的關係。學者們至少必須有了充分研究學術的時間和機會，方才說得到成績。外國大學裏有 Fellowship 等等的制度，專門供給一般自己無資產而懷才好學的人以潛心研究的機會；一種專門著述作成，又有種種發表的便利和獎勵；就是大學教授等，也授課的時間極少而研究的時間極多。中國是怎麼樣的呢？有志專門研究學術者沒有潛心學問的機會固然不必說了。一般學校的教員大多鐘點極多。空閒至多，而且數目極微的薪金還不能按月支領，往往二三月不得一金，積欠延至年餘。教員們妻怨子號，負債累累，忠厚的終日爲柴米蹙眉，聰明的東兼差，西兼課，皇皇然到處奔波。在這樣狀況之下，溫習故業已經不能，怎樣會望他們闡發新知，獲什麼心得呢？

因為政治的腐敗，教育狀況的不安寧，學校漸漸失了講學的風氣，變成了政治運動的集合所。一般野心的政客，利用青年學生們的熱心，達到他們特殊的目的。一般好活動的教員，也鼓動種種的風潮，為他們出頭進身的梯階。普通的學生們就以為幫助他們運動的是他們的朋友，而認定那樣以學問為前提的人為仇敵。教育狀況，一天比一天壞，風潮也一比一天多。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又有誰能夠專心於學業呢？

假使居然有人，不懼貧困的壓迫，不受環境的影響，埋頭典籍，或藏身試驗室，在學界有了一種供獻，那麼書買們把他三五年，或一二十年嘔心瀝血的結晶當作貴物，與他量材論價，三元一千字，五元一千字，或叫他自己出資付印。如果書買答應他抽版稅，自然大幸，可是專門科學的著述，有誰買呢？這是國家和學術團體的事，可是中

國國家向來就沒有想到提倡學術，學術團體呢，雖然還有一兩個，却都忙着開會和歡迎洋學者，洋什麼去了。

參戰

張敬海先生有一天晚上在王府井大街走路，忽聽得前面一聲聲的吶喊。他走上前去，看見一個車夫在路旁啜泣，說有一個喝醉了的美國兵坐了車，非但不給他錢，還打了他一頓。再走幾步，看見一黃衣的巡警躺在爛泥裏，掙扎着不得起身。停望前面黑黝黝一片人，還在叫着嚷着，走近去一看，原來是三四十個人跟在兩個美國兵的後面叫喊着「打！打！」這兩個美國兵不慌不忙的慢慢的走着，有時還立停了轉身看看後面的中國人。後面的中國人口中喊着「打！打！打！」，可是總是隔遠着六七丈的距離，美國兵走他們也跟着走，美國兵立停他們也跟着立停。他們的人數愈聚愈多了，一會兒就有了百餘人，也有幾個警察，可是還只是遠遠的跟着喊「打！打！打！」美國兵走到了東交民巷

的一個口上了，他們回返身來，笑着嚷道：「來呀！來呀！」說了奇怪，這賊打的百餘人不到兩分鐘便居然沒有影蹤了！

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吓！

走馬燈

爲了滬案幾十萬工人罷了工，爲了滬案全國的學生罷了課，這重大的滬案已經解決了嗎？爲了沙面慘殺案那一向反抗中央的廣東政府居然肯與北京政府合作，這沙面的案件已經解決了嗎？從一部分的報紙和學生愛國運動的目標看來，這似乎不成問題了。

蘇俄無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國人，監禁在黑暗的牢獄裏，我們似乎應當竭力的反抗了？張宗昌在山東，李景林在直隸壓逼愛國運動，不遺餘力，至於鎗斃了不少人，我們似乎更應當竭力的反抗了？從一部分的報紙和愛國運動的目標看來，這似乎還不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現在一部份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風潮佔去了。現在大部份愛國運動的青年時間，也幾乎全讓女師風潮佔去了。現在有多少輛汽

車在外面跑，爲的女師風潮。現在有數千他校學生下半年的學業正搖搖在天平裏，也爲的是女師風潮。女師風潮實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實在有了不得的大意義。

爲什麼呢？爲了壓逼女師的是章士釗，章士釗是英日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打倒章士釗就是打倒英日帝國主義的勢力啊。可是英日帝國主義者也實在是瞎了眼，怎樣會選中了章士釗做他們的走狗？你看他有了英國日本兩個大帝國做靠山，還險些弄不過二三十個「毛丫頭」。要是沒有那「面圓如鼈，齒獠如犬，攢眉凸眼，隆頸扁腮」的那齣在「千槍萬馬之中」，大唱其京調，大施其攻城奪壘的手段，章士釗怎樣的去向他的主人交賬？

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爭點

大多數的人總把看不懂的文章當作好文章。這不僅中國人這樣，外國的平常人也是如此。一個蘇格蘭的老媽子聽人讀了本國大詩人 Burns 的傑作 *Collier's Saturday Night* 她覺得一點不稀罕，因為 Burns 寫的是農民平常的經驗，用的是農民常用的言語。可是，中國不僅平常人這樣想，舊式的文人大都脫不了這種的腦筋。他們看見了一個簡單的意思用佶屈聱牙的古字陳言寫了出來，便搖頭的讚歎，他們看見了一個繁複深切的意思用簡單明瞭的話說了出來，便搖頭的嘆息。然而文章是看得懂的比看不懂的好，幾乎可以算是天經地義，文章究竟是傳達意思的啊。

自然，文章的看得懂看不懂，不僅僅在字句，大半還在字句所包

涵的意思。一個完全沒有科學智識的人，當然看不懂高深的科學專著，無論它敘述得如何明白。要不然，誰不能像某先生那樣的說：「愛斯坦的相對論有什麼難懂？我個個字都識，除了那些符號兒？」可是，就是高深的科學，在一個赫胥黎的手中，一個達爾文，一個羅素的手中，大多數人覺得容易了解了許多。所以一樣的一個意思，一樣有力的傳達出來，一篇文章容易懂，一篇難懂，我們就可以武斷的說容易懂的是較好的文章。一樣的一個情感，一樣有風韻的表現出來，一篇作品容易懂一篇難懂，我們也可以說容易懂的是較好的作品。只有非那樣的文字不能傳達那意思的奧妙，力量，情調，和風韻，才可以用那樣不容易了解的文字。

白話文與文言文的爭點，這就是一個。一樣的一個意思，一樣的敘述，白話可以得最多數的了解，文言少數人，佶屈聱牙，排比四六

的古文只有幾個人。

可是，白話不都是一樣的，猶之文言不都是一樣的。白話雖然很「流行」，却不一定都「惡濫」，文言雖然很不流行，却實在是「惡濫」的多。這不是說俏皮話，這是不可磨滅的事實。不過，一方面不寫白話的人，就是寫文言的人也大都承認一般文言無非是「老生常調」，無非是「濫調」，一方面却不僅寫文言的人，就是許多寫白話文的人還不會知道好的白話文也是從「字斟句酌」出來的。他們以為夾七夾八的白話寫在紙上就是白話文，那無異乎把所有的雜亂無章的東西，只要有「之乎者也」就算作文言文。吳稚暉先生的「狗屁狗屁」自然成極好的白話文字，蘇東坡的「嘻笑怒罵」也何嘗不是絕妙的文言文章？可是你儘管紙上寫滿了「狗屁」，你不會成一個吳稚暉，你放量的嘻笑怒罵，人家也不就當你第二個蘇東坡。

業

業

業

業

業

瞿克穎先生在甲寅週刊裏說的

「甲寅之文字。自是民國十四年之文字。其所標舉。乃是文言。以對今日之白話。非古文也。豈獨不侔於古文。作者之筆墨蹊徑不同。靡不自成杼軸。蓋雖概目爲一體。良不似白話文既限於今日通行之一種。永永自傳於稿枯生硬之境。是知欲求文體之活潑。乃莫善於用文言。緣其組織之法。粲然萬殊。既適於時代之變遷。尤便於個性之驅遣。」

他簡直就不懂自己說的是什麼。文字是可以表現個性的，白話如此，文言也如此，誰都不限於什麼一種。可是，白話文重自我的表現，文言文却重模仿。一個中國人，寫的外國字無論怎樣好，他的文字的個性的表現力一定不會像一個中國人寫中國文字那樣的強。同樣一個今

入寫古人的文字，無論怎樣的好，終究不能像今人文字的「便於個性
的驅遣」。西施是絕世的美人，可是她學了別一個美人的態度就可厭
了。東施是醜婦，可是她如果不硬學西施，也不至於被嗤。「好爲捧
心之妝，適以自翹的醜」的究竟是白話呢，還是文言呢？

利害

中國人只有利害，沒有是非。因為自己沒有是非，便以為世界就沒有真是非。他們看見了一篇議論，不問話說的對不對，只問這話有什麼作用。他們聽到了幾句批評，不問指摘得確切不確切，只問後面有什麼動機。所以你指出一個人的翻譯的錯誤，那麼你不是爲了「三角戀愛」，便是爲了「搶做教務長」，你代被羣衆專制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麼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在這樣的社會裏，一個報不顧利害的專論是非，自然免不了誹謗叢生，謠詠遽起。

莊生說：「德厚信弘，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我們也有應當

自省的地方。

可是，高風亮節如吳稚暉先生尙且有章炳麟誣譏他報密清廷，其他不如吳先生的人，污辱之來，當然更不能免。何況造謠者的卑鄙醜態更遠過於章炳麟，因為章氏還敢負造謠之責，他們只能在黑暗中施些鬼蜮伎倆，頂多匿名的在報上放一兩枝冷箭。

吳先生說，「一個人的人格經不起幾個人的誹謗，也就可以收場了。」這句話是至理名言，我們敢不自勉。我們的言論，無論是是非，還是依了良心的主張，斷不因爲怕謠譏而畏首畏尾。至於我們的朋友，如果有人相信我們的主張是能受金錢權勢所移的，就可不必認我們爲朋友，如果有人面作不信而暗中糺糊影響，作莫須有的攻擊的，我們也不願有那樣的人做朋友。

「有奶便是娘」與「無奶不是娘」

「至於關於經濟方面，則現在情形與彭允彝時代並無差異，章士釗到任以來曾爲北京大學籌過若干經費，本校同人當各知悉；即使章士釗真能按月撥付，或併清債積欠，但既是彭允彝一樣的無恥政客，同人亦當爲公義而犧牲利益，維持最高學府之尊嚴，如若忽變態度，拋棄歷來所嘆贊提倡之「狂狷的精神」，而採取「有奶便是娘」主義，我們不能不爲北大同人羞之。」北大十七教授爲反對章士釗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見

八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學日刊」

二

彭允彝的時候，北大與教育部脫離關係，所有教育部的公文都一

律退還，可是教育部發的經費却都受下來了，這樣的既盡公義而又不犧牲利益的「有奶不是娘」主義，大約是北大同人的光榮吧？

三

「此次北大方面，以為財部對各校直接發款，已有成例，不虞經費不能照領到手。聞北大於此，曾先向財部探商，財部當有允可照發之意，北大然後始放胆脫離教部云。」（九月五日京報）

「當北大評教會會議討論脫離教部案時，教授中須有謂本校如牽入政潮，因反對章士釗而脫離教部，教部勢必不再照發本校經費，目前更有無款維持學校之困難，事前應擴充分審慎。反對派當謂北大不向教部領費而逕向財部取款，從前已有先例，最近分潤金款，亦由財部直接分配。本校脫離教部後如章士釗抗不發

款，不妨逕與財部接洽。就目前情勢觀之，財教兩部當局未必事事合作，財部當可答允發款，本校可以無慮，於是脫離之議遂決。」（九月七號京報）

四

上面的新聞如果是晨報所載，也許免不了是謠言，可是幸而是已經屢次被證明爲消息靈通，記載翔實的京報所載，大約是確實的了。這樣看來，假使先向財部探商的時候，財部沒有允可的意思，這個胆是不放的了。吧？那時候怎樣對得起「歷來所嘆贊提倡之『狂狷的精神』？那時候「有奶便是娘」呢，「無奶不是娘」呢？

五

章七劍「既是彭允彝一樣的無恥政客，同人亦當爲公義而犧牲利益，維持最高學府的尊嚴。」那麼財部總長大約是「有恥的政客」

了？其餘各部的總長都是「有恥的政客」了。要不然，大家都是「一樣的無恥政客」政府也不免是無恥的政府，那麼爲了一個「無恥的政客」便「當爲公義而犧牲利益」，爲了一個無恥的政府更應當怎樣呢？那麼因爲否認一個無權勢的「無恥政客」却去巴結奉承五六個有權勢的「一樣的無恥政客」又怎樣的可羞呢？

六

「至北大被停給之分內應得經費，教部方面，主歸其餘國立各校瓜分，各校亦自願如此。」（九月七日京報）

七

有許多同人是北大的教員，又是另一個或幾個國立各校的教員，有許多同人是北大的專任教授，又是另一個或幾個國立各校的專任教授。在北大「而採取『有奶是娘』主義」是可羞的，在他校大約還不

要緊吧？北大的經費雖然停發了，却仍舊「歸其餘國立各校瓜分」了，那麼在一校因「爲公義而犧牲」的，「利益」仍可在他校得到相當的賠償，可以算行善得善了。一般平素不兼的自然絕了奶，可是誰叫他們做那樣的傻瓜啊！

八

「卽於前日閣議時提出兩部會同嚴格執行停費之議案。閣議既決，北大方面不禁若失，一時亦別無善法斡旋，聞仍將在學生身上用工夫，日內或有舉動表現，亦未可知。」（九月七日

京報）

九

既然「當爲公義而犧牲利益」，又何必「不禁若失」呢？無論如何，我勸他們在「學生身上」少「用」些「工夫」吧。反對一個人的

方法極多，最初何必輕輕用學校做兵器？現在如再「在學生身上用工夫」，鬧起一個大風潮來，小言之，段政府如不倒，章士釗未必去，而學生一年半載的光陰又虛擲了，大言之，安和北大不爲女師大第二呢？

十

星期一北大許多學生開會反對考試，一個學生演說道：「他們利用我們去驅章，我們也交換條件，利用他們不考試」。（據某教授報告教務長的話）

劉叔和

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有幾個中國留學生從美國到倫敦，其中我最先認識的是徐志摩。有一天，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遇見志摩，他說，他同來的老劉認識我，他在飯廳裏看見我的時候，說道，「那不是小陳嗎？」我問老劉是誰，志摩告訴我他名光一，字叔和，南通州人，北大法科畢業，在美國研究經濟學，他們兩人同船去美，現在又同船到英國。我聽了還是茫然，想不起劉光一是誰來。

大約過了一兩天，我才同叔和相遇，他說起我們在上海南洋公學的附屬小學曾經同過半年學，那時他的名字叫光頤。我漸漸的想起一個常常穿白竹布大褂，腦後拖一根小辮子的瘦弱的人來。他這時還很瘦弱，不過那時他比我高半個頭，現在我比他高半個頭了。此外我能

夠想起的，只是他是老學生，比我高二級，我入校半年他便升學了。他自己說，他在小學的時候很懶怠，不大愛讀書，所以畢業的時候是末一名，並且幾乎不及格。

他在南洋公學畢業之後，就攻進北大法科。那時他求學的興趣已經很濃，畢業的時候，小學校攻末一名的居然一變而為第一人。此後他在北大研究了一年，就自己備了資斧到美國去了。

他在倫敦，就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經濟學，尤其注意經濟原理和經濟史。可是他在經濟學外，同時還研究許多東西。他又非常健談，無論什麼問題，從文藝科學以至極微細的事物，一經說到，叔和便有他的意見和結論，一開口便滔滔不絕。後來他同傅孟真和我都住在一條街上，往來極密。孟真也於學無所不窺，而又健談。我們三個人每次相遇，叔和同孟真必爭，叔和所是的孟真必定要說它非，孟真

所非的叔和必定要說它是，旁證博引，奇趣橫生。我素來啞啞不多言，然而也喜歡弄些野狐禪，遇到有趣的爭論，免不了常常加入他們的戰隊；爭端一開，往往歷兩三點鐘不休。

叔和家中還富有，可是他日用非常的節儉。他住一間小屋，不能坐家中讀書，每天清早挾書到學校圖書室，或附近的圖書館去攻讀。除了上課的時候，他整天總在圖書館，直到閉館才回家。那時我同孟真等也窮極，我住在屋頂一小屋中，更加狹窄，所以也不得不上圖書館讀書。中飯的時候，我們三人大都會集於附近一個極便宜的小飯館中，吃那永不變更的煮牛肉，討論種種色色的問題。飯後到附近的 Clapham Common 散步片時，自然又小不了爭論，又各回圖書館。除了星期日我們有時到郊外遊息或作長時間的爭論外，日常生活，大都如此。

一九二一年的年底，我到德國，在Dresden住了半年，六月到柏林，孟真和已先在。那時中國學生從他國到德國的很多，大多因為馬克價落，前去遊歷。叔和仍舊閉門讀書，所以不到三個月，他已經可以勉強看德國書和談話。我不久便去法國，又從法國回中國，風傳以後叔和在德也會經過些浪漫生活，可是這一段歷史我就不知道了。

叔和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天回中國。因為他隻身沒有家屬——他曾經結過婚，沒有子息，他在美國時候他的夫人德去世了——他就同我們幾個人同住。這也許是叔和的不幸。因為叔和為人雖極隨和，對於主張及操守却很固執。他同寓和往來的人，都不懂得酬世的方法，不知道怎樣的迎合潮流，怎樣的觀風轉舵，怎樣的敷衍所有交往的人。他們相信什麼是對的，便覺得應當做什麼，不知道在中國做事必須用手段，必須有交換的條件。因此他們在中國社會裏總覺得格格不入；

他們想做的事常常失敗。他們的朋友們總說他們的洋氣太深，書獃子氣太重，勸他們圓活些，反對他們的人只覺得他們可厭，是應當用種種的方法掃除掉的障礙物。他們自己也覺得什麼事都做不好，非常的無聊。叔和處身其中，自然更加不能與流俗相合了。

叔和在北大所教的課，最重要的是歐洲經濟史。經濟史是他專門研究的學問，然而他們並不對於自己所已經知道的認為滿足，還是非常刻苦的預備。往往因一小點，遍翻所有的英德法三國參攷書，必定要毫無疑竇才能。他對於所有的功課，都這樣的認真，所以常常到夜間二三點鐘才睡。有時他發見了自己以前演講的錯誤，無論怎樣的微小，他一定要在講堂上認錯更正。這種歐美學者酷愛真理的精神，在中國也許免不了受一般學生的輕視。我知道有幾個優秀學生實在非常敬愛叔和，然而大部分也許不見得能識叔和的真價值，要不然叔和也

不至於脫離北大了。

去年學期考試的時候，某班學生要自己選擇坐位，叔和固執非依他排的號數坐不可，因此許多學生說他污辱他們的人格，拒不受試。經了這次風潮，叔和已經非常的灰心。下一學期忽然他接到所教的選讀班學生用全體名義寫的一封信，攻擊他很厲害，說他的教課是「了草敷衍」。用別種罪名罵叔和，他也許還可以忍受，把「了草敷衍」四字來責備一個教課最認真，最不肯半點將就的人，使他覺得他的心血是白用的了。加之他對於學校種種的不滿意，就決意辭職。後來他的別班學生竭力的挽留他，學校方面也不肯准他辭職，朋友們苦苦的勸告他，就是寫信的那班學生也有人表示後悔，可是叔和無論怎樣不肯再回北大了。

他因為教了一年半書，只是預備功課，沒有時候去研究新的學

問，所以他脫離北大後不願就別的事，只想自己讀書，恢復以前在歐美時的求學的興趣。正在這個時候，現代評論出版了，同人中只有他沒有固定的職務，就推他為經理。爲了這個報，他奔走了好幾個月，費了不少的心血，報酬自然是沒有的，非但沒有報酬，他還貼了不少的車錢和郵費。他自己相信很有辦事的能力，其實他始終還是一個學者，所以這個担子壓在他的背上，使他很感覺負擔的沉重。

近二三月來，報紙的事務已經上了軌道，他也漸漸的回復到以前求學時代的生活。除了爲了滙案他非常熱心的做了許多切實的研究之外，幾乎只是關了門讀他想讀的書。不意他忽然病了。

他身體極弱，自己的起居又沒有一定的時刻，飲食又不當心，所以常常有病。八月中旬他又覺發燒很重。我們起初以爲他的病不過舊病復發，并不在意。可是請中醫醫治兩三天非但不好，并且加重。一

天：適之去看他，他說：“My days are numbered”。他雖然說的是笑話，我們很替他着急，勸他搬入醫院，因為醫院裏看護總得周到些。他自己爲節省計，決意搬入德國醫院。他去以後，我們才知道那個醫院簡直沒有什麼叫看護，要招呼還得自己帶人去。可是他的病是重傷寒，病勢極重，不便再搬。在醫院住了十天，我們看見他一天一天的瘦弱，目光一天一天的呆鈍，耳朵一天一天的不靈，可是他的熱度却漸漸的減少，醫生說他的病很有起色。

九月一日下午我同錢乙藜到醫院。覺得他雖然瘦得可怕，然而精神却好些。看護婦說，危險的時期已經過了，以後只要不吃東西，便慢慢的好了。我們聽了很高興。

第二天中午，醫院忽來電話，叫我們派人速去。我們到時約在下午一時半，該院醫生克利與友人周振禹醫生都說他的病沒有希望了？

克利醫士說病人直至前一日，日有起色，昨晚忽變卦，不知吃了什麼沒有。叔和此時尙清醒，看見多人忽至，目光灼灼從此人轉至那人，額角汗珠迸發，問道「*My Case* 沒有 *hope* 了麼？」我們只好忍止眼淚，安慰他，同他說病已加重，但不是無望，不過須有人在傍服侍才好，請他把家中住址告訴我們吧。他說「不用通知他們了，沒有用的」。我們催了幾次才說了。我們問他昨晚吃什麼沒有，他說沒有。他又說「昨天晚上鬧得天翻地覆，如果今晚也這樣，我就不能活了」。我們一面去打電報給他家族，一面到協和醫院另請醫生，希望再有回生之術。二時半他又囑我發一電給他長兄。我三時回醫院，他已經不言語了。三時二十分協和醫生到，略審視，即告束手，並且說恐怕只有幾點或幾分鐘的事了。醫生去後，朋友們恐環立室中，擾亂病者神思，都退出門外。房中只有我同看護婦一人及侍者一人。果然不到幾

分鐘，叔和已與世長辭了，

叔和死的日期是九月二日，便是陰曆的七月半。先四五天，錢乙去黎看他，他問將到八月半未，乙黎說離七月半還有多少天，叔和說「七月半要出院去逛逛了」不意竟在這一天棄了他的軀壳去了。

我們同醫院交涉叔和身後事完畢出院，在門口遇信差，有一信是志摩給叔和的。我拆開一看，是志摩南下時告辭的信，信裏說道「盼兄耐心靜養，早日安復爲慰。南中逗留約十日至十五日，歸時再見」。今志摩已歸，叔和却永遠不能再見了。

叔和的病不是不能救的，并且在醫院多少天，一天一天的熱度已減輕。死的前一天，他精神也略好，夜間忽然變卦，一定有特別原因。醫生說也許他前晚吃了東西或動了，他既說並沒有吃東西，那麼想來是動了。他所說「昨晚鬧得天翻地覆」的話，恐怕與他的死有關

吧。前一天我們在醫院時，壁間某室忽發哭聲，可是叔和那時並沒有聽見。也許晚間那死者的家族都來號啕大哭，叔和聽見了，因為非常不安而動了也未可知。其實舉哀痛哭這些事，在醫院是應當禁止的，就這一點也就可以知道德國醫院的隨便了。

叔和性情平易，待人和婉，可是常常喜歡說抱怨的話。請他辦事，強之常達目的，可是開始總自捶其胸道：「辦不了，辦不了」。大約因此及因他說話極多的緣故，朋友們稱他爲「劉老老」。許多散處歐美中國的朋友聽見劉老老忽然死了，一定大家會感覺極沉痛的哀悼。

南京

要是有一天我可以自由的到一個地方去讀我想讀而沒有功夫讀的書，做我想做而沒有功夫做的事，我也許選擇南京做長住的地方，雖然北京和杭州我也捨不得拋棄。物質文明的毒實在受得太深了，窮鄉僻壤裏的小鄉村是一定住不來的，無論那裏的風景怎樣的幽雅。只要想生了病找不到一個你能夠相信的醫生，要用什麼圖書沒有購買的地方！何況現在到處是土匪，到處是比土匪更可怕的軍人？像上海天津那樣的城市又是住不來的。在那裏一個愛閒散自由的人簡直喘不過氣來。

也許有人覺得鄉村與城市應當劃分得清楚：鄉村得像鄉村，城市得像城市。可是我愛南京就在它的城野不分明。你轉過一個熱鬧的市

集就看得見青青的田畝，走盡一條街就到了一座小小的山丘，坐在你
的小園裏就望得見龍蹠的鍾山，虎踞的石頭。你發奮的時候，儘管閉
門下帷，不見得會有什麼外來的騷擾，你如高興出門遊行，那麼夏天
有莫愁湖的荷花，秋天有玄武湖的蘆荻，雞鳴寺看山巔的日出，清涼
山觀江上的落日，還有……許許多多名勝的地方，我實在不好意思
說了，因為我已經十四五年沒有到過南京，這次又忽忽的只住了一
天！

自然城市和人一樣，不會完全無缺的。南京的缺點，我一天的勾
留發現出來，在少一個電影院和一個戲館。這個缺點，在梁漱溟先生
看來，也許正是南京的好處，因為這樣可以免去他代人害羞的機會。
可是我在那裏一定會時時感覺一種缺憾，雖然我在北京也往往半年不
看一次電影，三四月不踏進戲園的門檻。

集就看得見青青的田畝，走盡一條街就到了一座小小的山丘，坐在你
的小園裏就望得見龍蹻的鍾山，虎踞的石頭。你發奮的時候，儘管閉
門下帷，不見得會有什麼外來的騷擾，你如高興出門遊行，那麼夏天
有莫愁湖的荷花，秋天有玄武湖的蘆荻，雞鳴寺看山巔的日出，清涼
山觀江上的落日，還有……許許多多名勝的地方，我實在不好意思
說了，因為我已經十四五年沒有到過南京，這次又忽忽的只住了一
天！

自然城市和人一樣，不會完全無缺的。南京的缺點，我一天的勾
留發現出來，在少一個電影院和一個戲館。這個缺點，在梁漱溟先生
看來，也許正是南京的好處，因為這樣可以免去他代人害羞的機會。
可是我在那裏一定會時時感覺一種缺憾，雖然我在北京也往往半年不
看一次電影，三四月不踏進戲園的門檻。

中國式的外國醫院

自從叔和的病，我得見了些外國人在中國開辦的醫院的情狀。他住的醫院。簡直連毛巾肥皂都得自己帶。那裏一個看護婦招呼七八間病室，時常可以半天見不到人影。房中床上，桌上，杯上，碗上，藥瓶上都是傳佈病疫的蒼蠅。住在這的樣地方，不病的也許會病了。聽說這種辦法爲的是便利中國人。中國人是受不住拘束的；喜歡滿屋子站滿了自己帶去的聽差，老媽子，了頭的；至於蒼蠅是他們日常相見朋友，不見了許覺着不自在。又聽說進那個醫院是得由閩人介紹的，如果你已經是閩人或經閩人的介紹，就有兩個看護婦服侍你一個人，如果你不是閩人而且認不得閩人，你在入院之先得送一份重重的厚禮。可是我們早先怎樣會知道呢？

這樣的醫院實在太過中國化了，同時又有些醫院又未免太沒有同化力。北京一個資本最大，設備最完備的醫院簡直不知道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體格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那裏的醫生只知道守着教科書上的陳言，用醫治外國人的方法來醫治中國人。譬如生產之後，外國婦人可以飲冰吹風，他們也叫中國女子去飲冰吹風，往往因此得到終身不治的病症。

無論如何，北京的外國病院總得讓歐洲某國的首屈一指了。我有一個朋友的夫人因難產到那裏去開割。那位著名大夫正在施行手術的時候，總統府忽然來了一個電話，請他去茶會，他便不顧事畢就去了，臨行叫助手多上些麻藥！過了幾點鐘他回來了，病人幸還沒有死，他把創口縫上了。可是病人出院，腹中常覺劇烈的痛苦，再去見那著名的大夫，他用X光照看之後，發見了縫創口的時候，忘記在腹

內兩個小小的箱子！於是又割開了一次。回家之後，某處還覺着痛苦，再去見這大夫，他又發見了某處的骨接忘記了接上，須得再割一次，可是我們的朋友實在不敢再請教他了，還是請了一個別國的大夫接上了。這種事，要不是一個朋友親得的經驗，叫我們怎樣能相信？

可是我們也要過分的責備北京的外國醫院。東交民巷的外國醫院本不是爲醫病而設的。一個政府倒了，醫院裏便住滿了下台的政客，一個政客要搭架子，便托病移住在醫院。醫院有這樣的作用，這種發財的機會，還那有時間精神來對付普通的病人呢？

民氣

滙案差不多無形的解決了。在那裏洶兩行眼淚，抹幾把鼻涕的固然不是沒有人，可是大多數人的心目中似乎已經不會有過這麼一回事。那少數沒有忘懷的志士們痛罵政府的也有，叫外交總長辭職的也有，可是我不免代政府和外交總長叫冤枉。政府本來就是那麼樣的政府，他們做的事正是我們預料他們做的事。要是他們把事情了結得很體面，那才奇怪呢！至於外交總長更不用說了；你們明明知道他是個可憐虫，却不早請他走路，難道也算是他的不是嗎？

那樣的人民只配有那樣的政府，這句話是不錯的。三個月前那樣慷慨激昂的宣言，痛哭流涕長太息的通電，都爭着做政府的浚盾。現在這許後盾都那裏去了？也許我們的政府別的方面不濟事，人民的心理

方面却是極有經驗的，他們怕說硬話就因為怕回過身來的時候那班高聲呼打的都已經溜掉了。無論如何，這樣的人民只配有這樣的政府。

其實那高聲呼打的已經是好的了，其餘的老百姓還在那裏睡他們的覺。中國人實在沒有什麼夠得上叫民氣，現在有的不過是些學生的氣。學生固然也是民，可是他們只不過是一千分，一萬分裏的一分。他們儘管鬧他們的，老百姓依然不理會他們的。所以外國的民氣好像是雨後山澗，愈流愈激，愈流愈寬，因為它的來源多。中國的民氣好像在山頂上潑了一盆水，起初倒也「像煞有介事」流不到幾尺，便離了目標四散的分馳，一會兒都枯涸在荊棘亂石中間了。

捏住鼻子說話

中國的智識階級和老百姓非但隔了一道河，簡直隔了一重洋。你們儘管提倡你們的新文化運動，打你們料學和玄學，文言和白話，帝國主義有沒有赤色的仗，他們悟善社同善社的社員還是一天一天的加多。有一個新從安徽回京的朋友談起一件事，很可以表示中國的國民有沒有出中古時期。

二三年前安徽的霍邱來了一個河南美少年，自言有一個仙狐跟隨他。這仙狐不肯顯色相示人，可是聲音是可以聽見的。每到黑夜到牠的壇前去焚香禱告，仙狐就可以判人的休咎，醫人的疾病。霍邱本是閉塞的地方，何況捧這美少年的是做過知縣的翰林，所以全城若狂，捐了二三萬金建造了一座極宏大的天狐廟。今年春天這美少年奉

了仙狐到蚌埠，大受那裏軍政長官的歡迎。新近又從蚌埠到了安慶。安慶城裏的官紳也都拜倒在「仙姑」香案的底下。仙姑降壇的時候，全城的闊人，從廳長以下都上朝似的，聽講似的恭立在壇前。可是安慶比不得蚌埠，更比不得霍邱，那裏是有「學生」的。一天晚上十個教育界的人居然也雜在官紳中間混了進去，每人袋子裏懷着一把手電燈。仙姑降壇還沒有說滿三句話，一聲咳嗽，十把手電燈齊注射在壇後，大家看見的是……那個本坐在壇旁的美少年立在壇後，捏住了鼻子學女人說話。這出其不意的電火把他駭呆了，他所以還是捏住了鼻子學女人說話，結果受了一頓打。打的時候，什麼廳也溜了，什麼局長也溜了，什麼道尹也溜了，什麼監督也溜了，只賸了某縣的知事溜不掉，只好硬硬頭皮把這壇上的仙姑拿下來做了階下犯。

這種事也許在中國算得狠平常。中國的老百姓，中國的官紳本來

只有拜在妖狐壇前的程度。可是我們代受騙的人的身分設想，騙子應得稍爲靈巧些。在黑夜裏捏了鼻子說話就可以弄得舉省若狂的兩三年，那些官紳似乎非但沒有出中古時期，簡直還應當向斐洲的土人學些文化呢。

共產

現在有許多人提倡共產，也有許多人反對共產。反共產的人的最大的理由是中國與共產制度不相宜，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我也偏向反共產，可是我的理由是與他們相反的，我却正是爲了共產制度已經在中國實行了。

別的也許說不上，在實行共產制度方面中國是很有成績的。蘇俄以外，中國可以算第一共產的大國了。自然，中國有中國的民族性，中國的共產制度也與蘇俄或世界其餘各國的不一樣。世界各國所說的共產，現在無非是勞働者去共資本家的產，平民去共貴族的產，窮人去共富人的產。中國的共產就大不相同了。中國是富人去共窮人的產，官僚去共平民的產。

我們拿一件最容易看見的事來做例。中央公園進門是要門票的。澳門票的收入就是維持中央公園的經費。至少是一部分的經費，我們平民，除了窮到出不起十六個銅子而不敢去的人，都負這維持的義務。可是，要是你是一個什麼部的官，什麼會的委員，胸口掛上一塊牌，你就可以搖搖擺擺的進門，不用買門票。一個人要裝一個電話，寫了信去也許個把月不得復裝了之後，平日叫號數常常叫不來，兩三個月不出錢就得出亂子，可是要是你是總長，議員，尤其是什麼軍辦公處的人，一句話去即刻就來同你裝電話，以後非但一點都沒毛病，並且不用你出半個錢。

同樣，只要你是個闊人，你點的電燈不用你化錢，你打的電報不用你化錢，你坐的輪船火車不用你化錢。你愈闊，你化錢的地方也愈少。你做了頂闊的人，你就不用化一個錢。

還有那國家徵收的稅。你愈窮，你出稅的機會也愈多，除非你是不名一文的叫化子。要是你是個闊人，那麼什麼稅也不用你出了。

在這一點，共產制度的中國實在與資本制度的英美恰恰的相反。他們收稅的原則，非但收入多的人同收入少的人一樣的抽幾分之幾的稅，還收入愈多的人出稅也愈多。例如一月只有十元的人可以不出稅，一月百元的人抽百分之二，一月十萬元的人，得出百分之三十。好像歐戰的時候，美國的幾個富豪還抽了收入百分之五十。

所以中國是共產的國家，官僚共平民的產的國家。既然中國的官僚沒有一個不有錢！他怎樣能不富？——富人沒有一個不做官，所以也是富人共窮人的產的國家。

至於共產制度的積極方面，怎樣的刮地皮，怎樣的取回扣，怎樣的收賄賂，怎樣的侵吞公款，總而言之，怎樣的剝削平民去飽自己的

私囊，那雖然是大家看慣說慣的事實，也許不見得所有的官全那樣，所以不拿來做例。

在這種共產制度底下不得發生那當然的結果。做事的拿不到錢，拿錢的不做事。拿錢愈少的做事愈多拿錢愈多的也做事愈少。你看各衙門裏的幾十塊錢一月的錄事，一天都不得空，大一些的官就一月不用到幾次。可是把衙門的錄事先生來同舖子裏的掌櫃打一個比，還是誰做的事多，誰拿的錢少？

很少人覺得不做事過不得。就是歡喜做事的人也只喜歡做那自己情願幹的事，至於爲了吃飯養家才做的事，做久了也就生厭了。有了那樣不做事可以拿錢的榜樣在眼前，一個人孜孜矻矻的一天工作了十二點鐘還衣不蔽體，貧不飽腹，妻子蓬頭垢面，兒女呼號啜泣，自然不免「有動於中」了。這樣的制度不掃除，怎樣能叫中國人不

想做官？

流會

東南風雲日來非常的緊急。一兩月內時局怎樣的變化我們當然料不到，可是那籌備了許久的國民會議也許開不成會了。這實在叫我們代那班興高采烈的國民會議代表諸公很覺着傷惋。他們費了許多時間，精力，和金錢，如果終久還出不了一次台，可真是比做交易所折了本還不上算。因此我想着把聽見的一種極聰明的選舉方法記下來，做一個紀念。

安徽有六十縣，所以有六十個複選選舉人和被選人。他們應當選十八名國民會議代表。六十人裏面的幾個能幹人就着手組織一個十八人團。這十八人團的結合也是很有趣味的，他們不是爲了政見的相合，不是爲了興趣的相投，也不是爲了都有軍閥援助。他們什麼都不

問，只問你自己一票外，能不能有另一個人放棄自己的被選權而且投你的票。要是十八人團自己互相選舉，再有十八人投他們的票，他們一人總得有三十多票，自然的當選了。可是六十人誰都想當選，誰都想加入十八人團，誰都肯放棄被選的權利，於是少不了種種的運動，尤其用得着孔方兄的力量了。有些人自己知道決沒有當選的希望，也落得做一個人情，並且撈個錢用。結果十八人團居然成立了，並且人人都當了選。他們自然得到了目的物，幫助他們的十八個人也得到了些相當的賠償。最可憐的要算那其餘的二十四人了。他們也有在初選時用了不少錢的，也有在複選時化了不少運動費的，到頭還是名利兩空。不過，要是國民代表會議開不成會，這二十四人也許得到些安慰了。

紛飾

民氣已經是彊弩之末了，執政諸公還恐怕它射穿了魯縞。前門，南池子一帶的「泣告」我也承認並不怎樣的好看，可是爲什麼早不洗，晚不洗，偏偏要在各國開會委員到京的時候洗去呢？難道恐怕他們看見了中國人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字樣麼？二十六日開會的那一天，巡警禁止民衆示威運動尤其是可怪。要是一個外國政府在我們政府的地位，他們一定會鼓勵民衆去示威，至少也得暗暗的祝告，不要示威的人數太少了。我們的政府非但不鼓勵，還要來禁止，非但和平的禁止還要，持槍弄械的打一個頭破血流方罷手。究竟爲的是什麼？難道他們想證明給外國委員看，這個示威運動是民衆自動的發起的，不是政府教唆出來的？還是他們以爲他們這樣的取好於洋人，洋

委員的心腸也號軟一點，以後就肯答應他們提出的要求了。

文章與飯碗

中國人實在太看重文章了，同時我們也可以說，中國人太不看重的。在科舉時代，會做了「錦繡文章」就可以中舉，中了舉就可以做官，所以誰都望自己或他的子弟會文章。就是講「文以載道」的韓文公，因為會做了幾篇文章就屢次三番的上宰相書，要求給一個官與他做。這種風氣到現在還沒有變。可是，因為文章是工具，因為「一個人想出風頭，他得做文章；一個人想找飯吃，他得做文章；一個人想做官，他也得做文章」，他的風頭出足了，飯碗找到了，或者官吏做成了的時候，文章就再也不用做了。我們現在見到的正是這樣的現象。

做文章的人同做官或是做工的人一樣，飯總是要吃的，不能因為

他重視了文章，就可以不吃飯，妻子也是要養的，不能因為他重視了文章就讓他們去餓死。只要看自古以來的名山大業，不是出於做過了官退養林泉的人，便是祖宗留下來些產業的人，要不然就是他們做的是清閒的事，有許多空工夫來讀書寫文章，就是顧亭林那樣的高潔，他非但有書，還可以「車書南北」，就是陶淵明那樣的「短褐穿結，箠瓢屢空」，他還有幾間「環堵蕭然」的破屋子，幾畝南山下的田，幾枝東籬下的菊。

歐洲百餘年前也差不多這樣。一個文人不是有錢者有閒的貴族，就是靠貴族吃飯的門客。他們寫了幾首詩，一個劇本，一篇小說就希望政府賞他們一個拿錢不做事的官，大學裏不教書的教授，教堂裏不教道的教師，或者至少送他們「筆過活的錢」。「阿嬢搖手向兒道」，「爺有新詩上相公」，當時的文人，也是與中國一樣的可憐。

可是現在外國的文人大都可以靠自己的著述生活了，並且許多文人還可以過一般文人理想的生活，中國却除了梁任公，胡適之二人外，恐怕沒有一個人可以專門著述不至於餓死，除非去做大書買們的傭工。中國出版界的冷靜，這也是一種原因。一個著述家不能把著述當他終身的事業。却要去做種種與他很不相宜的職務，真是極大的不經濟。就是他所做的事與他的才能也很合宜，可是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耗在那裏，只有一日忙中偷出些閒工夫來寫幾句東西，怎樣會產生偉大永久的作品來？

我們要著作多，先得要有許多把著述看作終身事業的著作家。著述家不能拿著述當終身的職業，他們免不了看文具做工具，自然難叫他們把著作當作終身的事業。現在許多中國人還是覺得無論做什麼事都可以拿錢，做了文章可以做無論什麼事，可是如果直接的做文章賣

錢，靠著作來餬口，還是看作「文丐」的生涯這種思想不解放，著述界，尤其是文藝創作界前途是不會大放光明的。

創作的動機與態度

一件藝術品的產生，除了純粹的創造衝動，是不是常常還夾雜着別種動機？是不是應當夾雜着別種不純潔的動機？這問題也許不容易作答。年青的人，他個觀看文藝美術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的，一定不願意承認創造者的動機是不純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各種文藝美術品，我們不能不說它們的產生的動機大都是混雜的。雖然有些偉大的作品是純粹的創造衝動的結果，它們也未必就優勝於有些動機不同樣純粹，却同樣偉大的作品。司各慈 Sir Walter Scott 早年爲了要支持他高貴奢華的生活，晚年爲了要還債，且夜不倦的工作，平均每年發表的小說有兩種。約翰生 Samuel Johnson 因爲要葬母，用一星期的夜晚，寫成了一本 Rasselas 有人遊歷西班牙，他的引導者指了

一個乞丐似的老人說，那就是寫 *Don Quixote* 的 *Cervantes*。聽者驚詫道：「塞文狄斯麼？怎樣你們的政府讓他這樣的窮困？」引導者道：「要是政府養了他，他就不寫 *Don Quixote* 那樣的作品了。」

世界上究竟多的是懶人。一個人能不做事過舒服的生活，很少人肯自己奮勇去工作了。我不信文學家藝術家比別人更懶些，雖然大都人這樣說，可是我也不敢說他們比別人特別的勤快。他們有時創造的衝動來時，不工作便吃飯睡覺都不成，可是有時也懶懶的讓它過去了。西班牙政府待塞文狄斯固然是很殘酷，可是我們也可以相信，要是他受了政府的津貼，他也許竟連一個字也不寫。無論什麼政府是與西班牙政府差不多的，他們待藝術家總是非常殘酷的和寒儉。就是向來以文章取士的中國，也得做那扭扭捏捏的文字才有得做官，要不然你就寫了一部空前的偉大作品如紅樓夢，你也免不了「舉家食粥酒常

賄」，你死了之後還得「新婦飄零目豈瞑」。說政府想藉此提倡著作，自然是給各政府自己都沒想到的恭維。老實說他們就從沒有把文藝當作怎樣一會事。

真正藝術家創造時的最初動機也許是心有所感，不得不寫下來，也許是好名，也許是想換夜飯米，也許是博愛人的一樂。他與尋常二三流以至八九流的作家的不同的地方，不在他們創作的動機，而在他們創作的態度。他們也許同樣是爲了要養活妻子才創作，有是一到創作的時候，真正的藝術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創造他心靈中最美最真實的東西，斷不肯放低自己的標準，去迎合普通讀者的心理。二三流的作者也許一隻眼睛看了看他自己寫的東西，一隻眼瞧着將來的收入，他看到了怎樣的寫法可以引起讀者的興趣，增加作品的銷路，便顧不得犧牲自己的思想，割裂自己的意像。可是，這種人並不是藝術家，

他們祇是販賣藝術品的商人。

可是，在今日之中國，就是販賣藝術品的商人也恐怕也難找飯吃吧？一個人想靠著述生活，只有去當書舖子的傭工。除此以外，他只有把生活和著述截然的分開，生活自生活，著述自著述。這樣，往往因為生活煩忙，就沒有時候從事文藝的創造，同時因為興趣的不合，所作的事也沒有精彩。大家都知道，一個靠教書吃飯而時時想政治活動的人不大會是好教員，一個靠政治活動吃飯而教幾點鐘書的人也不大會是好教員，只有那情願終身從事教育事業的人裏才會找到好教員。大家也知道，這樣的好教員得有相當的報酬，至少可以讓他有飯吃，有衣穿，有屋子住，子女可以受教育！可是現在教人家子女的人往往自己的子女上不起學了，這是中國的教育！大家想不到文藝界也大同小異的。我每看見一般有些天才而自願著述終身的朋友在幹着種

種無聊的事情，只好爲著作界的損失一嘆了。

版權論

我在倫敦去訪蕭伯納的時候，偶然說及他的著作已經有幾種譯成中文了，他回答道「不要說了罷。那於我有什麼好處呢？反正我一個錢也拿不着。」無論我怎樣的解說，我說中國翻譯的人自己也得不到什麼好處，他就問爲什麼要翻譯，我說他們爲的是介紹他的思想，他就說他們還是爲了要借他的名字去介紹他們自己的思想罷了。與他絲毫不相干，他說這話，好像真有氣的似的。可是，你如以爲蕭伯納的著作的目的，是專門爲掙錢，你可就錯了。他初寫劇曲的時候，有經驗的朋友勸他去迎合觀衆的心理，還同他說，照他那樣的寫法，他也許免不了要餓死，他連理也不一理。

又一天我遇見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健將柯爾，我們談起日本來。他

他說不歡喜日本人，因為他們太卑鄙；他們譯了他的書不讓他知道，不給他正當的版稅。我心中不免想着中國人現在也正在譯他的書，也不見得給他版稅吧，只好暗暗的說一聲「慚愧」。

這兩件小事很可以表示歐洲著作家與中國的同業的觀念是很不相同的，他們對於應享的權利，一分也不願讓，中國人却非但不覺得文字的酬報是權利，並且還覺得可羞。所以中國的劇曲家編了一齣戲，非但表演的時候他抽不到稅，他自己要去還得買門票。所以沒有分文酬報的刊物如本報有人常常做文章，財力豐富的雜誌反而找不到好稿件。這也許是中國人的好處，可是，我已經說過，這種情形是不會協助著述的發達的。

那兩件小事，另一方面，又可以表示中國書買的兇惡。中國沒有加入國際版稅同盟，所以翻印或翻譯不問版權是不大要緊的。可是他

們待中國的著作家，也一樣的兇惡，自然是利用中國的著作家的普通的弱點，知道他們不肯反抗的。現在市上發售的書籍，有許多可以做我們的例。

第一種是書買完全享受了著作者的所有權。例如吳老先生的臚會客坐談話銷了至少數萬部，所有的利息都上了泰東書局主人的腰包。努力裏討論古史問題的文章，當然是顧頡剛，錢玄同，劉挾蓼諸位先生的版權，可是上海有一個書店自己印行成單行本。甲寅第十六號裏有施畸先生的通說，說出版合作社把他「錯雜零缺及未成之稿，集而公之於世，標其書曰中國文詞學之研究」。裏面所載的，不但作者認為粗鄙膚淺，還有與他意思相反的。施先生寫信給該社，請他們停止發行，回信「除頌諛道歉之外，並允所請」可是實在該社方在低價發售。

又有一種最取巧的竊盜他家的版權。例如「梅生」編輯，「新文化書社」出版的中國創作小說選，「魯莊雲奇」編輯「小說研究社」發行的小說年鑑，書上還印着「版權所有」是字樣，裏面的小說沒有一篇不是人家所有的版權。魯迅，郁達夫，蔣光慈，蔣經綸，蔣華生諸先生都各人有自己出版的創作集，現在有人用什麼小說選的名義，把那裏的小說部分或全部標竊了去，自然他們自己的籍的銷路大受影響了。也許有人說，外國人也有這樣的小說選啊。可是外國的小說選沒有不先得作者的允許，有許多還得償還部分的版稅，中國可就不管了。

這樣的例多着呢。可是最胆大的是王文濡編輯，文明書局出版的「胡適文錄」了。要不是亞東書局迅速的交涉，現在不知又賺了多少錢。這種搶錢的辦法實在是太可笑，而且太笨了，這種都是「著述界

的靈蟲」，靈蟲不除，著述界是不會有健全的望的。

吃飯與火併

讀了十一日京報所記載全國學生總會代表大會對於時局的討論，簡直不知道說什麼好。某地代表「以爲應促成反奉聯合戰線，並促成接近民衆；武力加入此戰線，而變爲真正之民衆武力。並分析此次戰爭之來源，係因民衆勢力發展而促成軍閥之互鬥。因此次戰爭原因不一，但民衆的力量在五卅後不發展，至如此之大軍閥戰爭之開始，必不能如此之決。」

不論你民衆的力量發展不發展，大軍閥戰爭的開始總是差不多這樣的。民國以來的戰爭不知有多少次，除了賊害他們的生命財產，那一次與民衆有還多大的關係？軍閥們發難的通電都不外「爲民請命」，猶之歐戰對於各國都爲的是「公理」，可是戰爭勝了歐洲人，就忘記了

「公理」中國軍閥也一樣的不看見了百姓。好像受了十五年的經驗還沒有得到絲毫的教訓！難道不知道這一方面勝了來的是這一班人，那一方面勝了來的是那一班人，雖然唱了不知多少齣戲，唱來唱去還是那幾個脚色？現在要促成反奉聯合戰線了。反奉聯合戲的名角是誰？還不是吳佩孚，吳景濂，高恩洪，豬子議員，種種色色你們去年所深惡痛疾的人。他們休養了一年，就會成「真正的民衆武力」了嗎？他們把曹錕放出來之後，這位休養了一年的曹三爺還得成中國的林肯，華盛頓呢！

我是不信唯物史觀的，可是中國的政治，我相信實在可以用唯物觀來解釋，也只好這樣的解釋。種種的戰爭，種種的政變，出不了「飯碗問題」四個字。吳稚暉先生說中國的政客不能一天不上台，因為他們是大飯碗，大飯碗後有中飯碗，中飯碗後有小飯碗，小飯碗後，

有細飯碗，細飯碗後還有……，這實在是至理名言。例如吳佩孚不再上台於他個人沒有什麼大關係，他也許肯在岳陽樓上一壺酒，一首詩，那樣的過他的殘生，可是他手下的一般驍將政客可不答應，他們不得不活動，他們不得不勾結，他們不得不擁戴他出來。要是他們成了功，這一隊飯碗有了米，另一隊飯碗落了空，那隊落空的飯碗又得活動，勾結，搗亂，擁戴另一人出來，直到有了米才能。這邊來了那邊去，那邊來了這邊又得走，所以民國的戰事永遠不得止。

黎善薩固然是一個沒用人，他却看到了中國政治的癥結，造了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他說：「有飯大家吃」。要是政客們誰都有了大大小小相當的飯碗，小百姓就餓死了，國內也許可以相安無事些。可惜黎氏只能說，不能行，以致被一羣叫化子一趕就趕到了日本。

民衆受了軍閥們的殘殺，宰割，從不敢，從不能起來表示些少的

反抗，實在沒出息。我們不能引導他團結起來，合力的抗拒全國的軍閥政客，也已經夠可恥的了，用不着再把鼓勵贊助軍閥政客的罪名，拉在自己身上。

撈油水

關稅會議有沒有比較滿意的結果，我們不知道。爲了它中國得開消一大注款項，我們是已經知道了。也許會議還沒有給中國什麼利益，中國已經要爲了會議經費而借款了。你有些不信嗎？居仁堂的請一次客，外賓不過二十人。就連中國的主人和陪客也不到一百人，能用掉多少錢？某部的報銷裏開了三萬多。三百五十元一客的飯，我們這一世——恐怕就是你也——不希望吃的了。北京牆上的「泣告」，粉刷乾淨得用多少錢？市政廳雖然開了一千多的賬，某部却報銷了五萬，要是那些寫「泣告」的先生們早知道「泣告」有這樣的價值，他們也許不肯到處浪費了。

紅樓夢裏的買家爲了要歡迎買妃，芹哥兒，芸哥兒一千人都撈到

些好油水，買家的破場面固然撈起來了，他們的空架子也就不得不倒了。中國現在歡迎關稅委員，一班芹哥兒，芸哥兒們正在撈油水，不知道這空架子還支持得多久。

放假

北京學校的例假非常的多。雖然我問問自己的心，放假大都是不會反對的，同時我不能不說我實在找不出有些假期的意義來。今天是「世界休戰紀念」，所以「照章放假一日」。爲什麼？爲了中國在世界大戰裏犧牲了許多生命財產吧？中國是「宜而不戰」的。爲了中國在和議時得到什麼利益吧？中國是拒絕簽約的。爲了世界真正得到和平了吧？俄羅斯，波蘭，意大利，巴爾幹，土爾其，摩洛哥等等，那裏不會有過戰事？我們每年這時候的自相殘殺更不用說了。爲了「公理戰勝」吧？列強在和會上的處分中國和日本的爭執，有沒有公理？法國對待德 的態度，是不是公理？

那麼，也許爲了列強今天要紀念「公理戰勝」，我們是弱國，不

得不跟在他們的屁股後面走吧？可是列強是不是這樣紀念呢？

我曾經在英國經過兩個休戰紀念日。一次我正坐在公共汽車上。只聽四方砲聲一响，所有的汽車馬車電車停了駛行，所有的行路人停了步，所有的說話人停了嘴。這樣的兩分鐘。兩分鐘後駛行的舊駛行，走路的依舊走路，說話的依舊說話，商店依舊做買賣，政府機關依舊辦公事，都同兩分鐘前一樣的過那平安的生活。又一次，我正在講堂聽講。那點鐘的講授是一五十歲左右的女教授。她講演是非常有精彩的，不但她的嘴，她的全身都在講那經濟發達史。忽然砲聲響了。她停講了。在十分的沉默中，我看見這教授的眼紅了，一顆顆的眼淚從裏面迸出來，大約她是在哀悼她戰死的兒子。兩分鐘過了，她拭一拭眼淚繼續她的演講，雖然最初幾句帶着酸楚的聲調，可是不會不但她的嘴，她的全身都在講她的經濟發達史了。

我們中國却爲了「世界休戰紀念」，「照章放假一日」。

剽竊與抄襲

現在著述界盛行「剽竊」或「抄襲」之風，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一般人自己不用腦筋去思索研究，却利用別人思索研究的結果來換名易利，到處都可以看到。然而我們也那能深怪？現在的社會不是鼓勵人們用腦筋的社會？社會的種種方面，總法用心用力的役於人，不用心不用力的役人；心力用得愈多的得到的報酬愈少，心力用得愈少的得到的報酬愈多。那麼著述界又那能特別的立異？要是用自己的腦筋去研究，一年半載也許得不到什麼結果，要是利用人家的腦筋，半天就可以寫一篇文章，一月就可以草成一種著述。好在中國的讀者從不問你的作品質的好壞，只問它量的多少；中國的學生不問你的學問深淺，只問你在副刊上發表文章的多寡。這種辦法也非是依

照經濟學的原則，用最少的力量得最大的效果罷了。這種風氣的結果，乙抄甲，丙又抄乙，永遠沒有完畢的時候。在健忘的普通讀者的眼中，一篇文章雖然讀過了三百篇，他還會認它是新著，本無關係。可是一般鴻博的批評家可免不了頭痛欲狂了。

所以鴻博的批評家迫不得已的生起氣來，我們能夠諒解，我們非但諒解，而且同情，非但同情，而且熱誠的希望，馨香的祝禱他們的努力。我們相信除了他們的筆鋒，沒有東西可以挽回上面所說的那條經濟原則。

可是，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麼？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總之這些批評家不見大處，只見小處；不見小

處，只見他們自己的宏博處。例如某宏博批評家說：「某先生大抄史特林堡的名劇『鑽石』而標以創作的美名，揭於前文學旬刊已爲識者所笑」。不錯，我也彷彿記得有這麼一回事，可是記得某先生抄的却不是「史特林堡的名劇」，而且「史特林堡的名劇」中我也記不起什麼「鑽石」來。這足見某先生宏博的程度了。實在許多批評家宏博的程度，深可驚奇。他們叫我們不得不聯想到那些宏博的小孩，他們讀三字經還沒有滿一句，到處見着「人」字，「之」字，便大嚷你瞧，「你瞧！人！人！人！之！之！之！之！」好像那些寫人字之字的都在抄他們的三字經！

在我們不宏博的人看來，「剽竊」「抄襲」有一定的意思，不能看見兩篇東西稍有相同之點便濫用這樣的名字。兩個科學家都寫愛斯坦的相對論，他們的論調，自然有許多相同處，雖則他們誰也不用

「剽竊」。可是，要是一個人說他自己發明了相對論，他是「剽竊」本不用說，他把第二人的書改頭換面的付印，也自然是「抄襲」。種種科學都不外如此。

至於文學，界限就不能這樣的分明了。許多情感是人類所共有的，他們情之所至，發爲詩歌，也免不了有許多共同之點。把好花來比美人，不僅僅中國人有這樣的觀念，西洋人，印度人也有同樣的觀念，難過一定要說誰抄襲了誰才稱心嗎？人類的悲歡離合，總不出幾個套數，因爲兩種作品的套數有些相同，就指爲「抄襲」，這種批評家宏博也不亞於上說的小孩。

「剽竊」「抄襲」的罪名，在文學裏，我以爲只可以壓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損傷天才作家的。文學是沒有平權的。文學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爲什麼蠢才一壓便倒呢？因爲他剽竊來的東

西，在他的作品中，好像馬口鐵上鑲的金剛鑽，好像牛糞裏插的鮮花，本來太不相稱，你把他的金剛鑽，鮮花去了，只贖了馬口鐵與牛糞。至於偉大的天才，有幾個不偶然的剽竊？不用說廣義的他們心靈受了過去大作家的陶養，頭腦裏充滿了過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狹義的說，舉起例來也舉不勝舉。Ben Jonson 的作品裏有許多字句是從希臘羅馬的作品裏整段的翻出來的，而且幾乎沒有一個希臘羅馬的詩人，歷史家不會在他的作品裏留下些痕跡。托爾斯泰的傑著戰爭與和平裏面講戰事的地方，就有整篇的抄襲。最顯著的例莫過於莎士比亞了。他的劇本的事實布局，幾乎沒有一種不是借自別人。可是，你就指出了他們的剽竊，他們的作品也不會因之減色。Ben Jonson 雖然借了許多名句，他自己作品也自有傳世的價值在。托爾斯泰把冷冰冰，毫無生氣的紀事，化在他如火如荼的傑作中，無異乎生死人而肉白骨了。莎士比亞

在他陶冶天地的大爐中把許多泥塑木彫的傀儡鎔化成了英雄美人。幼稚散漫的情節製造成了絕世傳奇，要不是經他的借用，還有誰會得聽見那些無聊的作品來？

「剽竊」和「抄襲」的罪名固然不足以輕減他們作品的價值，可是 Ben Jonson 究竟「剽竊」過，托爾斯泰究竟「抄襲」過。可是莎士比亞是不受這樣的罪名的，因為他的作品已經又是一回事。同樣，一個作家也儘可無意的，或竟有意的借用另一作家的布局，只要他運用的方法不同，他週圍的空氣不同，他人物的個性不同。契訶夫有一篇短篇小說 *La Oigale* 是把一個勞苦工作的丈夫同一個沒腦筋只管享福的太太做對照的。曼殊斐兒 *Katharine Mansfield* 在她的 *Marriage a la Mode* 用同樣的主旨。曼殊斐兒是私淑契訶夫的，她曾經看見他的那篇小說，毫無疑問。可是我們萬不能說曼殊斐兒是抄襲契訶夫，因為契訶夫的

小說裏是純粹的俄國人，曼殊斐兒的是純粹的英國人，契訶夫的人物有他們特別的個性，曼殊斐兒的人物也有他們的個性，所以，雖然那兩篇小說說的是同樣的事，讀者得的是差不多的感想，它們簡直是兩件極不相同的東西；同時却是兩件同樣美麗的東西。自然，要是讓宏博的中國批評家看見了，他們又找到了偉大的發見了。幸而宏博的中國批評家是不曾看見的——它們還沒有翻譯成中文呢。

胡適之先生從上海寄蔣夢麟先生的信，有這樣的話：

「前不多日，我從南京回來，車中我忽得一個感想。我想不教書了，專作著述的事。每日定一個日程要翻譯一千字，著作一千字，需時約四個鐘頭。每年以三百天計，可譯三十萬字，著三十萬字，每年可出五部書，十年可得五十部書，我的書至少有兩

萬人讀，這個影響多麼大？倘使我能於十年之中介紹二十部世界名著給中國青年，這點成績，不勝於每日在講堂上給一百五十學生製造文憑嗎？所以我決定脫離教書生活了。」

他在給我們的信裏還說「我們能批評人家的翻譯，而自己不翻譯，我們能評人家的著述，而自己不著述，這是根本不對的。」（原信不在手邊，字句也許有些出入。）我們自然是十分贊成他的計劃，希望他能夠實行。自然我不信一年六十萬字，十年六百萬字是能實現的。這樣下去，再活五十年，不就寫了三千萬字了麼？胡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那種書，一定不是可以一天寫一千字寫成的。他也許一天寫了五千字，一萬字，也許三個月還不能動一動筆，一天一定寫多少字，雖然有那樣的作家，如英國小說家 Anthony Trollope 可是大多數人耐不住那種煩，並且這樣所寫成的作品也許不能特別的出色。我們希

望胡先生的，不是平常我們都能寫的書，只是與中國哲學史大綱那樣，和再進一步的著作。這樣的著述，不要說一年五部，就是五年一部我們已經很滿足的了。

夢麟先生在他的覆信裏說：「這種事業，我以為凡有能力的留學生們都應該做的。」可是，非常的不幸，凡應該做的「留學生却都沒有「能力」，因為，我已經說過，中國恐怕只有胡適之，梁任公兩位先生有靠他們著作生活的能力。除非中國的著述事業大大的發達，或是做教書匠的有安安穩穩的一碗飯吃，這個希望只好終於希望了。

著書與教書

胡適之先生的著書和譯書的大計劃，我們已經說過我們是十二分的贊成。可是他同時要脫離教書生活，我們就不敢同樣的贊成了。這不是說教書比著書譯書更重要，也不是說胡先生的感慨沒有充分的理由。我們承認，倘使他能於十年之中介紹二十部世界名著給中國青年，這些成績，「實在遠勝於每日在講堂上給一百五十學生製造文憑」。我們並且承認，那講堂上的一百五十學生，雖然不見得個個都想文憑，少說些，其中至少有一百個並沒有想到過別的東西。我看見過有些畢業論文，那裏是什麼論文，簡直是一種習字試驗；他們簡直是長篇文章，一字不易的抄錄；要是抄寫些平常人不輕易看見的書選吧了，這些作者還不肯費這些搜尋的功夫，也許還沒有這樣搜尋的

能力，他們只知道都抄誰都有一本的課本。代這樣的學生製造文憑，不但不及著書譯書，還不如做官，打牌，逛窯子。

可是，只要那講堂上的一百五十學生，不是個個都只想文憑，只要有五十人，五人，或竟只有一人，他的目的在熱誠的求學，這一個人就值得注意和幫助。何況其餘的一百四十九人，或是一百人，亦並不是永遠不變的。只要內中的十人或一人的眼光，有從那一小塊長方的文憑轉移到大處遠處的可能，這十人或一人就更值得注意和幫助。

不錯，那二十部世界名著譯成了之後，他們也一樣得益的。可是這裏却少算了那相聚一堂，時常會面的潛勢力。威爾士 H. G. Wells 在他的 *the Salvaging of Civilization* 曾經有過一種主張。因為好的教員難得，他以爲幾個好教員應當專編講義，這講義適用於全國或全世界的各學校。他寫書的時候，那無線電傳聲機還沒有發達。後來有人把他

的話更推進一步；因爲好教員難得，每種功課只須請一位最好的教員，他在一處演講，全國學校就可以從無線電傳聲機聽講。我不知道威爾士贊成這話不，不過我想威爾士是極有經驗的教育家，他未必肯承認這許多。因爲從無線電傳聲機聽講，和自己看書一樣，學生不能與教員接觸，也就受不到那由接觸而生的影響。

一個教員往往竭他的心力，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他們的眼睛裏露出的只是黃昏似的滯鈍的光，因此非常的灰心，可是他還盡他的心力，過了多少時，那黃昏似的眼光裏忽然露出些朝氣，那滯鈍的眼色有了活潑的氣象，從他們的眉目之間就可以知道他們已經發生了求學的興趣，從他們質疑問難的態度中就可以看出他們以前看爲苦事的現在看做樂事了。一班之中只要有半數，或很少幾個人這樣，這教員的心力就不算白用了。這就是教員學生相聚一堂的效果。

普通的教員尙且有這樣的影響，何況負盛名的學者呢？少年人大都是崇拜英雄者，他們極容易受偉大人格的感化。我們讀名人的傳記，常常看到他們幼年因爲遇到一兩個大偉人，得到終身不忘的印象。偶然遇見的尙且如此，日日坐在講堂中質疑問難的更不必說了。歐洲的大學往往因爲有了幾個人格偉大的教授，全校的學風甚至於全國的學風，居然一變。中國從前也有許多書院，造成一種特殊的學風，這我們不能完全歸功於治學的方法，大部分還得力於人格的陶冶。

中國現在學風的不振，是無可諱言的，尤其令人傷心的，是學者失了求學的興趣，好學不倦的習慣。然而這並不是學生獨有的毛病，社會上誰都差不多這樣，就是教授先生們也往往除所教的課本外不讀書。在這種情形之下，申斥學生不讀書是廢話，勸他們求學救國也是

枉然。只有一般專心學問的教授們以身作則，由人格的感化，養成好學的學風。他們在短時期間也許不能有看得見的效果，也許竟不能得到一般人的諒解，可是他們的房子不是築在沙上的，他們的種子不是投在水中的，時日久了，他們的屋子終有完成的一天，他們的種子終有開花結果的一日。像胡先生這樣的學者，大學裏是萬不可少的。

所以如果胡先生覺得著書譯書和教書是不能並行兼顧的，教了書就不能實行著譯的計劃，那我就沒有話說，要不然，我希望胡先生還是每天少寫一千字，不要脫離教書的生活。如果胡先生像我們一樣，愈教書愈感生活的艱難，那我就沒有話說，如果胡先生著作所得的版稅還可以充補愈積愈多的欠薪，我希望胡先生還是不要脫離教書的生活。

「首都革命」與言論自由

無論什麼事情都不容易因人成事的；民衆運動絕對的不能。民衆如果想靠軍閥來革命，他們還不如讓給外國人來革命。自然，要是你的磅礴之氣充塞天地之間，洶湧直前，像長江大河，潮流所至，軍閥們也許會有捲進去的一天，可是那是軍閥來依俯你了，不是你去靠軍閥，沒有這樣的民氣，真正的革命是不會實現的。

上月二十八，二十九兩天的「首都革命」實在叫人非常的失望。他們的目標，積極方面不必說，就僅僅說那比較容易做到的消極方面，自然是「打倒賣國段政府」，「驅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釗」了。兩天的結果怎樣？除了搗毀章朱李會劉幾個人的住宅外，什麼也沒有做到。閹員雖然換了幾個，政府却仍舊是「段政府」。段祺瑞

雖然吃了小小的驚嚇，却依然高臥在吉兆胡同。難道「十餘萬」革命的民衆還趕不了一個日暮途窮，隻手空拳的段祺瑞？唉！馮大帥的命令還沒有下，國民軍不敢動呵！馮大帥也許自己還沒有決定怎樣的方針，至少在這時候讓傀儡似的段祺瑞出他的手中會有種種的不方便，所以他是無論如何——至少在目前——「仍擬維持段之地位」的。馮大帥沒有開口，十餘萬的革命民衆也這索得罷了！那麼要是馮大帥「仍擬維持」章朱李曾劉的地位，他們的住宅搗得毀麼？

二十九日晚京畿警衛總司令發出了布告了；「自此次佈告以後，學生工人應即停止開會運動，以期免爲奸人所乘。其希圖乘機擾亂者，一經拿獲，定意嚴懲不貸，勿謂言之不早也。」布告一出，「首都革命」不見了，十餘萬的民衆也不响了。

這就是「革命」嗎？五四一役，是反抗有權力的政府的。新近的

關稅自主示威運動，還和警察打些架。這次却算作「革命」嗎？

這次「首都革命」的最大的結果，還要算是燒掉了一個晨報館吧。二十八日羣衆高呼的口號，有「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那一條。二十九日就有許多人手豎旗幟，大書打倒晨報及輿論界之蝥賊等語，遂蜂擁至宣武門大街，將該館舉火焚燬。這樣的爭言論出版自由，也很值得紀念的。

照例所謂「自由」無非是指自己的自由，旁人是沒有份兒的，所以我們也用不着大驚小怪。可是我無論如何不懂得爲什麼北京有這許多報館，獨獨晨報館要遭這個殃？我一向覺得，在中國北方的日報裏，只有晨報還像一個報。第一，新聞紙究竟是傳達新聞的，晨報的消息雖然不一定比所有的報紙都靈通可靠，它的編輯却整齊得多其餘

的編輯先生就沒有什麼知道叫編輯，晨報的編輯先生却「顧名思義」，每天用一番心思，費一番功夫的。所以一般報紙往往不知道說些是什麼，晨報却頭頭是道，叫人一目了然了。第二，晨報的主張是始終一致的。這在中國的報紙裏，也是一件稀有的奇寶。中國的報紙都像風中的楊柳，東來便往東倒，西來便往西倒。它們又好像倚門賣笑的娼婦，誰有錢就賣給誰。所以在中國今日，不論它主張的是非，只要有固定一致的主張，就是好報紙。不錯，晨報是帶有研究系的色彩的，至少歷史上與研究系有過關係的，無論如何，它對於國民黨是常常砭斥的可。是這不過是信仰的不同，並不成什麼罪狀。除此以外，晨報始終反對軍閥，批評政府，雖然態度穩健，却是稀有的獨立奮鬥的報紙。

然而晨報却讓爭言論出版自由的民衆燒燬了！

「表功」

本刊第一期是去年十二月十三出版的，本期出版又是十二月十二日了。我們與讀者以文字相見已經一年。第一期出版的時候，正值直系初敗，奉系氣焰漸張，本刊週年，又正看着奉系敗亡逐北下。這一年中，時局多故，外患日迫，教育界尤其表現不安的現像，可是我們回顧本刊這一年來的成績，幾乎沒有一句話我們現在希望當時沒有說，就這一點似乎已經可以自豪了。

本刊的態度，可以說在中國的評論界裏開一新例。中國人是沒有是非的。他們是抱着“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那種見地的。在他們看來，凡是同黨，什麼都是好的，凡是異黨，什麼都是壞的，凡是朋友，什麼都是對的，凡是仇敵，什麼都是錯的。除了這樣的善惡是

非，就沒有善惡是非。歐洲人在十八世紀以前，本也是這樣的：世間只有兩種權力，一種屬於上帝，一種屬於魔鬼；好人不會有半點過錯，惡人不會有一善足取。中國的物質文明本來不過十八世紀的歐洲那樣，精神文明，雖然許多黃帝的子孫在那裏大吹大擂，實在還趕不上人家的十八世紀。在「黨同伐異」的社會裏，有人非但攻擊公認的仇敵，還要大胆的批評自己的朋友，在提倡民權的聲浪中，有人非但反抗強權，還要針砭民衆，在以好惡爲是非的潮流中，有人本科學的精神，以事實爲根據的討論是非，自然最初不容易得一般人的瞭解。十八世紀的人是不能一步便跨到二十世紀的。然而一年以來，一般人已經並不覺得這種態度的特別了。

本刊的第二種供獻，是所有的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覆罵。這也許是「紳士的臭架子」。可是我們覺得不研究事實的真

相，隨口罵人，三尺童子也很能自己爲之，用不着費偌大的精力時間辦一個報來，專做那種事。花是人人愛好的，魔鬼是人人厭惡的。然而因爲要取好於衆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顏色，在包頭上裝上義角，我們非但覺得無聊，還有些嫌它肉麻。

至於本刊的文藝部分，別的不敢說，至少在中國的新文壇裏添了幾篇極有價值的創作和批評。這一部分是絕對的公開的，投稿的人不論社內或社外，有名或無名，文壇的老將或新進的作家，甲派或乙派，都受同樣的看待。在我們發表的文字裏，固然有許多名字是家喻戶曉的，然而有幾篇是我們至今還不認識的朋友的處女作。我們看稿的標準也許比較嚴格些。這一層我們得到讀者的合作的。我們偶然有時把標準微少放低些，少不了便有讀者寫信來責問。這種信件真給我們不少的鼓勵，因爲平時懶得覆，現在一總的道謝吧。至於對於投稿

的人，我們自然同樣的感激。我們只恨本刊的篇幅太少了，所以來稿往往得壓了多時才發表，有時連極有興味的文字都不得不割愛。

※

※

※

※

※

不過一個月以前那位鎮威上將軍手下有三十萬大兵，現在呢，不得不光身托庇於外人了。軍閥們好像一種蟲豸，澎漲極大的時期便免不了分裂，這在民國已經成一種公例，可是總沒有這兩年的分裂得快的了。這種方法是最容易效法的了，將來同樣的事還多着呢，可是以後誰還相信誰呢？軍閥的爭鬥，本不過是「雞蟲得失」，我們張開了眼睛瞧着吧。

可是有一層我們倒值得注意的。民國以來，有實力的，只有袁世凱雄才大略，是個了不得的人才。中山先生是新世紀的政治家，現在的中國實在支配不上有他，所以限於實力，什麼也行不通。其餘的軍

闊，都是時勢造成的草包，是什麼東西呢？所以他們完全是政客們的傀儡，弄得身敗名裂還不知道什麼一回事。現在可大不相同了。西北的馮，東北的郭，東南的孫傳芳，廣東的蔣介石，都是兵力極充足的軍人，同時又是神出鬼沒的政客。他們能同軍人打仗。他們也能同政客弄手段。很少軍人是他的對手，也很少政客鬥得他們贏。他們這四位再加上一個地盤還沒有鞏固的吳佩孚，大約中國最近幾年的命運在他們手掌之中了。（我實替大政客先生們發愁，他們的鐵飯碗恐怕打破了！）

馮玉祥是一種清教徒，蔣介石也是不賭，不狎妓，不飲酒，不吸烟的，吳佩孚雖然做幾句歪詩，喝幾杯老酒，做人方面是竭力模仿古代的儒將的，聽說郭松齡的私德也非常的清介，（只有孫如何，好壞都沒聽說過），這總算是一種好現象。

「管閒事」

民國十四年在鎗炮聲中過去了，十五年也就在鎗炮代爆竹聲中落下了地。這十五年是不是還得像十四年，那樣的混亂不可收拾，我們在無從預料。不錯，十四年來，政局一天混沌一天，小百姓一天困苦一天，我們有了這長久的經驗，應當可以猜到這來到的年頭不過又是那麼一回事了，然而我們還希望着。我們不得不希望着，正因為不希望只有絕望的路了。

※

※

※

※

※

「以前種種事，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事，譬如今日生。」在新年的時候，一個人是容易有這種決心的。我們不免結一結舊賬，過了年好換一本新賬簿。前幾天，一位我極尊敬的老先生在朋友面前說着我。

他說某人真是不行了，他喜歡管閒事，到處惹禍，這樣下去，還要惹出大禍來呢。這位老先生生平就是愛管閒事，到處惹禍，他還這樣說，足見這話是很有理由的了。我們新年的決心，不如就說以後永遠不管人家的閒事吧？

然而仔細想來，我們何嘗愛管閒事呢？實在中國愛管閒事的人太少了。歐洲人好像不是這樣的。

有一次，我立在倫敦一條街上，候着看新市長，就職的行列。大約立了一點鐘，我身後的人已有數重，忽然一個中年婦人突來站在我的面前。我自然一聲不响的退讓了。我兩旁的不認識的女子却抱了不平。她們說我站了一點多鐘，那婦人不應當搶我的地位。中年婦人聽了她們的批評，面紅耳熱的，逡巡自去。她後我兩旁的人還憤憤的說她無禮。這種在中國會有嗎？誰肯這樣無故的開罪他人，何況爲了

不認識的外國人？然而這樣的傻子我自己在英國遇見的就不止一次。

法國人的公道，我自己雖然沒有經歷過，然而十九世紀末幾年的二樁案件是誰都知道的。法國軍隊裏一個少年猶太軍官受了私通敵國的嫌疑，革職定罪。法國人民自然都拍手稱快。然而軍官的友人竭力爲他剖白，引起了幾個管閒事人的注意。他們覺得證據不是，要求重審。最初這少數的人爲了好管閒事，激動公憤，身家性命都幾乎不保。他們却百折不同的繼續奮鬥，至兩年之久，究竟得申冤獄。在那兩年中，法國全國人民，分爲二派——德雷夫黨，和反德雷夫黨——就是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都爲了它分離反目。不用說，反德雷夫黨自然是大多數，智識階階的人也就不少。然而我們所最傾倒幾個近代法國文人如 Zola, Anatole France, Romain Rolland 却多在被人唾棄的廿數人中爲了一個毫不相干的猶太人却費了許多光陰，拋棄了自己的事業，犯

了被猶太人收買的嫌疑，冒了身家性命不保的危險，去奔走呼號，主持公道，當然只有傻子才肯幹，然而法國居然還有少這樣的傻子。

中國人的毛病就是他們太聰明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真是一條好格言。本來一個人爲什麼要管閒事？自己省了許多事，還在衆人面前討了好，何樂而不爲呢？如果偶然有些好事人，擾亂他們的安靜，只要說他是受人的指使，領人家的津貼，就可以閉了他們的嘴。這本也難怪。誰能相信人家不與自己同樣的卑鄙？誰能承認自己不如人家的地方？

中國人最初不管隣家瓦上霜，久而久之，連自己門前的雪也不管了，如果有人同住的話。所以軍閥政客雖然是少數，小百姓雖然受盡了苦，却不肯團結起來反抗他們。學校風潮，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學生叫囂搗亂，就可以拆散學校，引起學潮。其餘的十分之九心中雖十二

分的不願意，却不能積極的團結起來，阻止那少數分子的胡鬧。

生活在這種人中，自然有許多看不過眼的事情，不得不說兩句話。這樣就常常惹了禍了。可是我們究竟也是中國人，本性何嘗愛管閒事呢？並且我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維持，還有許多天地間的奇書沒有讀，那有閒功夫來代人抱不平？這就算我們的新年的決心吧，雖然下次遇到了看不過眼的事情，能不能忍住不說話，我實在不敢保。

法郎士先生的真相

「沒有人會是他隨身侍僕的英雄的」。我們所崇拜的英雄大都遠遠的立在雲端裏，滿身的金光炫耀着。我們遠遠的俯伏在他的脚下，連頭都不敢舉一舉，毫不疑惑他是賦有天神的種種美德的。要是有一天我們大胆的走近他的座前，我們心中雖然含藏着恐懼和戰慄，究竟免不了發見在那閃爍的金光中立着的也是一個人。我們走的愈近，看的愈久，他的金光也逐漸消失了，到頭也許連他的斜眼，歪嘴，和眉角上的黑痣都逃不了我們的審察。他的隨身侍僕自然看見的比我們還要多。他也許會見他在一個霜重冰厚的早晨，戀着被衾的溫暖，讓他的太太連催了幾次才起身；他也許會見他爲了婢女失手把殘羹潑了他的新衣，給她種種不大中聽的名字。他斷不會在他的眼中賦有天神的

種種的美德的。可是也許他愛他的主人，他却不愛他的天神似的英雄。

我們知道英國文學家裏面，最被愛的，不是他們的民族詩人莎士比亞，也不是德行優美的大詩人彌爾登，却是一位幾乎沒有人讀他作品的約翰·生。我們愛他因為鮑士偉的傳記把他的聲音笑貌都傳給了我們，他的肥大的身軀，浮腫帶麻的面貌，臃腫的衣服，奇怪的脾氣，神妙的吐屬，沒有一樣不留在我們的腦中，比我們自己頂親密的朋友的印象還深刻。所以許多歌功頌德，誇張長處，粉刷弱點的傳記都堆塵埃裏，饑耗子和蠹魚，鮑士偉的約翰·生傳却永遠同最新出版的小說爭着博讀者的興趣。

十九世紀已經去了四分之一了。這二十五年中，前十二年全世界比較最出名的文豪大約是托爾斯泰，後十二年大約是法郎士吧？托爾

斯泰的傳記公布了之後，崇拜他的人都受了極大的打擊，一個是雖然不容易使人怎麼的愛他，至少大家對他有了了解和同情。法郎士的性格是可以在他的書中找到的；他書中的主人，如Sylvestre Bonnard, Jerome Coigna d, M. Bergeret 都是他自己的化身。可是我們不免要問，這些人物究竟多少是法郎士的想像，多少是他自己？

一九二一年，那時法郎士還健在，一個 Paul Gsell 發表了一本 *Les Matinées de la Villa Said propos d' Anatole France*（此書有英譯本名，*Anatole France and His Circle, being his Table talk Collected and Recorded by Paul Gsell*）這本書所紀的都是法郎士在許多來客面前所發的議論，雖然抵不上他的 *Jardin d'Eden* 的芬芳燦爛，然而一望而知是那神妙老匠人灌溉的花卉。可是我們見到的還是法郎士著作家，不是法郎士的個人。去年他的秘書 Jean Jacques Bronsson 寫了一本 *Anatole France exp*

oufoufle 這本書立即譯成了英文，書名是 *Anatole France Himself A Boswellian Record* 我們所希望了好久的書居然讀到了。我們想看的金剛的泥塑的脚也居然看到了。法郎士著作家與法郎士個人是不大相同的。這不過是我們所料到的，然而我們却沒有料到這真正的法郎士和我們思想中的法郎士那樣的不同。

這本書的作者李崔生是法郎士的秘書，在法郎士身伴有八年。他所記錄的都是平常人不容易見到的法郎士；法郎士在工作，在飲食，在對付種種的來客，在淘氣，在發牢騷，在說體己話，在弄錯了約會的日期。然而我們疑心李崔生先生的活潑的文筆害了他。他不想學鮑士偉那樣的老老實實的把納翰生的種種方面都記下來，他太想把他的書寫得有趣了。他所記錄的都是極有精采，令人難忘的片段。可是這樣選擇的結果，我們看見的不是整個的法郎士的，只是法郎士的片

面。這好像我們要知道一個地方的地理人物，他却給我們看了幾張風景片。並且我們還疑心這種風景片還是經過人功的修飾的，那是說，我們疑心李崔生先生有時加的油鹽醬醋太多了。

大家心目中在法郎士一個雋永飄逸的談話家。他書中的 M. Berte prof 等等都特別擅長的是閒話。許多他的崇拜者，學者，文人，藝術家，政客，社會主義者，以及俄國的虛無黨，西班牙的無政府黨都常坐在他的座前，聽到許多難忘的妙論。格才兒說他在演場中，他像另一個大著作家，威爾思一樣，不知怎樣的說話，他只能寫了演說辭到會場上去讀，要是沒有了稿子，他便格格的說不上話來。「可是在他的家裏，他是談論的魔術家。有時溫柔，有時含了譏諷，他的話好像書上寫好的——而且還是頂美妙的畫」。格才兒的那本書，就是幾個早晨的談話的成績。我們讀了那本書的印象，覺的這位「大師」喜

歡的是獨白，不大喜歡有來有往的對話。現在李崔生告訴我們法郎士有兩種談話，一種是在人前用的，一種是私下用的。人前用的談話好像話匣子上的片子，只要機關一撥，便哩哩喇喇的說起來，裏面有的是故事，俏皮話，自己的回憶，斷片的詩歌。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觸動他的機關，機關一開他的話便幾點鐘都不歇歇。有時馬丹在星期日同他說「講那一個故事吧」法郎士很聽話的講了。馬丹就說「好的，很好，」也許說，「妙極了，你比平日說得好，」可是也許說「你的本領沒獻出來。前幾天你講這個講得好多了。今天你縮短了。你忘了那一點。」有時她還要他重說過。法郎士私下的談話可大不同了。那是很費勁的，不順溜的，格格不吐的，上氣不接下氣的，互相矛盾的，可是這種談話他現生人面前總沒法避免，所以很少人知道。

法郎士的散文像水晶似的透明，像荷葉上露珠的皎潔，是近代公

謔爲一時無兩的。他的功夫可大了。李封 (Button) 的名言「天才是無限的耐心」，法郎士 雖然對白郎 教授談話的時候竭力的否認，他自己的作品就是極好的證據。他同李崔生 說他同雷南 (Renan) 一樣，每篇文得改六七遍，才像他自己的作品。他說：「想像力我是沒有的，耐心我可不是沒有的。」「我很少得到靈感的助力。我的筆沒有抒情的力量。它不會跳，只會慢慢的沿着道兒走。我也從不曾感到過工作的沈醉。我寫東西是很困難的。」他寫了一些東西便付印，付印後得校對五六道，先修改它的字句，再去掉一切多餘的字句，然後他用剪子把所有的句子都剪破了，再「好像玩着練耐心的玩意兒似的，把一句句的句子來配對，配好了又拆散，又找另外的匹配，單一節文章他就造起了三十遍。末了他喊道：『勝利了！』收尾的句子現在變了開頭的了。」

可是我們不要以為法郎士的文章都是這樣細心推敲的結果。馬丹代他承應了維也納 *Neue Freie Presse* 的巴黎通信員的職務，因為每星期只須寄文一篇，每篇文可以得八百法郎的報酬（約合三百元左右。）法郎士却始終不承認。每星期三下午報館的人來收稿，法郎士才想起那篇文章來。他，馬丹，他的書記才着了忙。他們把一星期的報收集在一處，有人用剪子，有人用漿糊，把幾段比較有精彩的文章剪下了，法郎士自己費力的寫了第一段，他的書記也寫了些什麼，都貼在一塊兒。法郎士在底下署了命，他說，不用改動了，好歹總會譯精的！

法郎士待他的朋友們是很好的，可是他的好法也很特別，他喜歡找他們的弱點，在背後說他們的壞話。一天他的最好的朋友來看他，他在十多人的面前高聲吩咐女僕道：「一刻都不要讓他一個人在底

下！好好的看着我的各種寶物！」大家以爲來的是一個扒手了，可是老朋友上樓了，法郎士出人上意的上前抱住了他，連連的吻他兩頰，他的長鼻子在這朋友面上磨擦着，好像捨不得放手似的，滿面帶笑柔聲的說：「我最親愛的某人，我正同這些先生們談起你，你來得好極了，我不知怎樣才能說出我的高興來。」一次要到新年了，他自己去買送人的禮物。他揀了幾幅假的古畫和古雕版畫，他說假的就行了，因爲送朋友的。價錢自然都很便宜，最貴的也不過五十法郎。店中人道：「它們既然是禮物，我來把價目刮去了吧。」法郎士答道：「不要，不要。後面加一兩個圈就好了。」這種地方他僅僅是滑稽麼？還是可以說是「老滑頭」了呢？

法郎士無雙的「愛倫尼，」可以算是他的作品的特点。我們總以爲世間一切都不過是他談笑的資料了。可是他自已還是脫不了虛榮

心。他是法蘭西學會的會員幾乎是常在口上的，雖然總是帶着輕視的語氣。有人告訴他某某批評家說他是「一個完美的作家，不是偉大的作家，」他就生了氣，罵那人是驢，是蠢物，是傻子。畫師來代他畫像的很多，他總是訴說他們麻煩他，可是總讓他們畫。他只讓他們畫他的側面，因為他的側面比正面好看些。畫完之後他把畫師直抬到天上，他說他是一個 Apelles。一個 Rubens 一個 Michelangelo，法郎士從此可以不死了。他的書是會毀滅的，他的像可一定永永的傳下去。可是那位畫師還沒有走到樓下，他就說：「那樣亂塗的人！幸而我們不一定要長的同我們的畫像一樣的難看！」

收住了吧，這樣的寫就寫不完了。可是一句話得聲明。上面所說的實在算不得是法郎士，還算不得他的片面，只不過是我們所沒有料到的法郎士的一角吧了。

再談法郎士

這兩天總是忘不了法郎士，就再來談他幾句吧。

也真可以算是「愛倫尼」了，一個特別以神妙的「愛倫尼」著名的大作家，他的生活就滿充着「愛倫尼」。什麼都不信，什麼都懷疑，什麼都取笑，什麼都抨擊的法郎士，宗教，政治信仰，社會制度都束縛不住的法郎士，在日常生活，連穿衣作事都沒有充分的自由，却天天得受兩個女人的管束！這兩個這樣了不得的女人，一個是馬丹，一個是法郎士的老女僕約瑟芬。約瑟芬管的不過是小部分，然而在她的範圍以內，她是不可違抗的女皇。在她的職務中，一種就是每天代法郎士穿衣服。一個明媚的早晨，法郎士忽然想到外面去散步，他自己穿好了衣服，扣上了鞋，輕輕的下了樓梯，偷偷的開了門，趕

快的往外跑，後面來了一個尖利的聲音，「先生！你到那裏去，先生？」法郎士假裝不聽見，脚下走的更快。可是他剛到園門口，已經被約瑟芬追趕着。她一路的拉他回去，一路還指手舞足的告訴聚在門外看鬧熱的閒人：「他倒想溜，沒換襯衫就想要溜！一回兒馬丹責備起來又是我不好。她吩咐過，「約瑟芬，好好的招呼法郎士先生，一切都在你身上。你知道他是一個小孩子」……」她把法郎士拉回了臥房，一面囉嗦，一面代他換過了全身的服裝，法郎士却俯首貼耳的讓她去擺佈！

馬丹的權力自然更大了。馬丹是誰，很慚愧的，我實在不知道，雖然我也看過三四本關於法郎士的書。我知道她不是法郎士的太太，因為她有她的先生，可是每次出外旅行法郎士總是跟着馬丹去，並且二十多年，法郎士每天總在馬丹處吃飯。吃過了午飯，閑談了一會，

三點鐘敲了，馬丹就要說：「玩夠了，來做事吧！」。說着她就上二層樓去了。法郎士沒精打采的跟着她，好像一個小孩跟了他的保姆上學堂。二層一間大房子裏有三張寫字棹，一張馬丹的，一張先生的，一張法郎士的。大家都坐下來開始她們的工作。有時法郎士說他忘帶了他的軟帽，就想托辭起身。馬丹說：「你不是想走吧？你一個字沒寫呢！人家真要當你是十五歲的小孩子，不是不朽的名人了。」法郎士只好再坐下來了，雖然也許只睡在坐椅裏打鼾。有時法郎士不肯上樓去，他說：「今天我放半天假，這應當是我的份兒了。」馬丹就會扳臉的說：「你同小學生一樣的懶。來吧！鼓起勇氣來。我來給你一個榜樣看。」有時她扭不過法郎士，她即刻就變手段。學是放了，法郎士可得由她陪着出去，任他怎樣的推托，說謊，他可不要想擺脫她。她管的不止是法郎士的工作。星期日下午法郎士好像養馴了的猴

子似的，得到她的客人前面去顯本領！那是說，談他的獨白！法郎士雖然有時也同馬丹開一個玩笑，平常總是聽她的命令。她對他是處處不脫保姆的神氣，雖然她十二分的崇拜他。「今天見了誰？」她在午飯時發問。「沒有人嗎？只要瞧他那鼻子！沒有女人嗎？」法郎士說：「可惜沒有！」馬丹：「也許什麼女文人？」法郎士：「那我不會她們女人看。」馬丹回答道：「你什麼女人都愛，你就沒有鑒別力。」過了一回，她又說：「不要像兔子似的儘齧那瓜皮。有的是瓜，儘量吃好了。」

說法郎士「什麼女人都愛」，未免冤曲了我們的大師。他愛的是年輕的姑娘，結婚不結婚倒不在乎！還要長的俏。什麼女子去見他，他最先得問她年紀輕不輕，樣子好不好。要是鬍子長長！法國太太多的是長鬍子！臉皮黑黑的老小姐，他就給她一百個不見。美麗的少女

同他交涉總沾些便宜。也許因爲這一點吧，我想着法郎士會得常常聯想到太戈爾。要不然，沒有兩個大文豪再比他們不同得厲害了。太戈爾是謳歌愛情的，法郎士也是崇尚愛情的。雖然他們所說的愛情不一樣。一天他同他的秘書說他願意同他換一換地位。他說：「我是君王，可是煙，酒，愛情都不准碰一碰。少年人，趁這時候享受戀愛吧。日夜寒暑都不要間斷！你是爲了這個到世間來的，其餘的東西是虛榮，是煙也似的幻形。世上只有一種科學：戀愛！世上只有一種財富：戀愛！世上只有一種政治制度：戀愛！」又一次他說：「我套笛卡爾 Descartes 的名言，這樣說：『我愛，所以我生存。我不愛了，所以我不存在了。』可是法郎士的愛，我們讀過他書的人都知道，太偏重在肉的方面了。我們固然不說最正當的柏拉圖的愛，然而靈和肉似乎至少都得有一份。可是法郎士不這樣想。他說在愛情裏面，只

有一件事算得數。他不信其貞潔的人，要有，一定是偽君子，病人，瘋子，如是女人，一定是樣子生得不好看。「你說一個女子是貞潔的，什麼人都得嘲笑你：你簡直把她弄成了笑柄。」所以他罵人頂厲害的話，就說那人是天閻。

還有一件事也叫我聯想到太戈爾。法郎士不愛自然的風景。太戈爾在中國的時候也什麼風景都沒有興趣去賞鑒。這自然又是表面的一點相同，根本上完全相反的。太戈爾一生讚美的就是自然，他現在年老力衰，所以興趣不像以前那樣的濃厚了。法郎士却本就不愛風景，雖然他的作品裏偶然有很美的描寫。在他看起來，世界是極大的。博物館。山川風物只是些土，水，和雲，直到有人畫在紙上布上，他才覺得出美來。他遊歷了一個新地，你問他那裏的風景美不美，住的旅館舒不舒服，吃的東西好不好，他都不能回答你，可是那裏的一塊碑，

一座像，一幅畫他都記得很清楚。他不知道什麼是自然，他只知道什麼是藝術。

羅曼羅蘭在年輕不知名的時候寫了一封信給偉大的托爾斯泰，居然得到了一封親筆寫的三十八頁的法文的回信。這是文藝界的美談。要是有人寫信給法郎士，他是一定會失望的，因為法郎士非但不回信，簡直就不看人家寫給他的信。一次他旅行回來，看見一浴盆的信。他要李鶴生一齊去燒掉。李鶴生說也許裏面有幾封有意思的信。法郎士道：「啊，少年人，少年人！信就從來不會有意思。」他又說：「聽你老師的教訓吧：一個女人，不論她美不美，寫信給你，不是要錢，就是求你什麼，也許是送上你的門來。並且，不論男女，只有討人厭的人才寫信。……」送書給他的也得到同樣的命運。他略略的看一看名字就都扔在臥室的一角——那是原來預備作浴室的，所以

他叫扔書到那裏去做「入浴」。「那裏堆滿了，一個舊書舖的夥計來收去。我們定下一個價目。無論著作者是誰——散文或是詩——總是五十法郎一浴房。他第一次來的時候，到了講價我就有些擔心。我想，五十法郎撤清那一大堆蠢話實在不算貴。他儘可以問我要一百法郎。可是我很驚訝的看他在袋子裏取出一張錢票來；我只道應當出錢的是我呢。」

大約與法郎士的精神相去最遠的要算是美國人了。在法郎士講的他與一個美國人的交涉就能看出來。美國 New York Herald 的主人朋奈脫 Gordon Bennett 一天同法郎士在一處宴會。兩杯酒下了肚，「滿面通紅，眼睛裏哭出酒的淚珠來，他不住的說法郎士先生，聽我一句話。只聽我一句話。你是一個有才氣的人，可是我要同你說一句話。我的名字是戈登朋奈脫。我要告訴你有一個什麼——一個什麼在上面那地

方。在上面那地方，你知道！」說着他指着那燈台！「只有腦筋簡單的美國人才會用這樣的話去勸一個對於宗教什麼都研究過的懷疑者信仰上帝。朋奈脫約法郎士代他的報紙的聖誕特刊寫一篇短篇小說，出價一千五百法郎（約六百元）。法郎士答應了，就給了他正在付印的白石裏的第一個故事裏面說的是聖保羅。過了些時，朋奈脫的書記去見法郎士，送他一張支票，這樣的說：「戈登朋奈脫先生很喜歡你那篇小說，他覺得好極了。他叫我同你說你沒有寫過比這篇還俏皮的小說。他要好好的加上幾幅美麗的插畫，印刷起來，留着給自己看。他只要印一本，那可以算是他的圖書館裏頂寶貴的一本書了。自然，他還是給你報酬，同在他的報上發表了一樣。可是他要我懇求立刻再寫一篇，價錢還是一千五百法郎，那是給報紙的。他求你在這一篇裏不要說聖保羅的壞話。因為美國看報的人不喜歡聽人說聖保羅不好的

請。要是你高興，你可以把其餘的聖徒，或是聖約瑟夫，或是聖母瑪利亞，以前的教主，現在的教主，天上所有的聖人，來取笑；可是千萬不要有一句說聖保羅不好的話。我們會失去讀者的。」

法郎士口裏多的是故事。李崔生和格才兒兩本書中，已經美不勝數。我們揀一個，作一樣榜樣吧。聖夫窪一天看戲，坐在一個出名的兇漢的側邊。他非常和氣的鞠了個躬，同那人說：「先生，我懇求你看我的面子，離開你現在的坐位，坐那面去一點。」我請教爲什麼？」那兇漢問。聖夫窪道：「我是頂愛和氣的人，我不情願讓人難受。千萬不要叫我說出你一定不高興聽的話來。」那兇漢說：「我告訴你，要是你不說爲什麼要我換坐位，我是不換地方的。」他們又扭搭了一回，聖夫窪說了。他說：「你一定要我說，先生！我真不安極了。天知道我竭力的想避免給你難受。沒有法兒，只好說了。我求你

坐遠些的意思是——因為你發臭，先生。你發的是怪臭，你的腳，你的全身都發臭。你像一只羊腿那樣的臭，你像卡博卿派和尙那樣的臭。就是魔鬼自己來也忍不住這味兒」。那兇漢大怒，要同他去決鬥。聖夫窪裝作驚訝道：「什麼，先生，決鬥嗎？只因為我說你身上發出一種臭氣來？請你平心靜氣的想一想看。你這是不講理了。要是你打死我，你不會少臭些。要是我打死你，你只有更臭了！」

上星期——二十世紀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了」寫成了「十九世紀」。差了一百年，總主筆先生！他是代我負別字和筆誤之責的——還沒有覺察，也真是失職，因為有朋友來信詢問，就附筆聲明在此。至於一兩個錯字，那是每期都有的，也就不特別更正了。

吳稚暉先生

自從孤桐先生下台之後，甲寅雖然還沒有恢復十年前的精神，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可見做時事文章的人官實是在是做不得的，至少做了官還是不論時事的好。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時做官僚，官僚也同時可以做「青年叛徒的領袖」，可是這也得需要特別的天才，不是人人能幹的事業，總之，孤桐先生還沒有這樣的才具。所以他的復活的甲寅實在沒有多大的意思。近來可漸漸的不同了，時評和論文裏的飄趣，好像一陣新鮮空氣，把甲寅吹得有些蘇甦了。

第二十七號裏有一篇「再答稚暉先生」，裏面評論吳老先生的話，我覺得特別有意思。有一段道（爲省事起見，恕不翻譯爲白話了）。

前清壬寅，先生被辱於日本，憤而自沉。自署「其言也善」之小包封內，有詞一章，其警句曰：「信之以死，明不作賊，以尸爲諫，懷憂曲突。」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諸公努力，僕終不死！」

這一段故事是許多崇拜吳先生的人都不知道的。孤桐先生說這是儒者的真精神，在倉卒授命之際，自然而然的「集於胸中，奔於腕下，是乃真經生真文人之受用處。」他的話也許是對的，不過要用這話來做中國書不可不讀的理由，我們却不敢贊同了。你想，讀中國書的人那樣的多，這樣的「真經生，真文人」還不是在中國同外國一樣的人難找？

孤桐先生的斷語：「吳稚暉者，一言行不相顧之人」我們實在很難否認。他說道：

爾後習爲開放，口不擇言，與諸的少年角逐，有宏獎而無督責，意在姑爲破壞，徐圖建設，誠隨在以線裝書拋入毛坑之精神行之。而先生秉尙貞慤，爲世碩果，縉袍不恥，一介不取，兢兢業業，日不暇給，外和內方，粹然儒者，其不沾染毫毛時下惡習，假『無政府黨，共產黨，革命黨，新文化運動家』名以自欺欺世，仍三十年如一日也。此三十年中，半瓶醋之西學家，領約卡拉，口銜雪茄，新民叢報第一期所長吟而曲諷者，不知葬送幾許青年，而吳稚暉光燄如故也。以余所知，先生又不獨律己爲然也，其持家教子，率以傳說的嚴氣正性之道施之，起居小節，都不少假借。是何也？寧得曰，此亦『豈有此理』者也。』總而言之，吳先生乃一極舊式之新學家也。

這一段，有許多話都搔到了癢處。言行不相顧本沒有多大稀罕，

世界上多的是這樣的人。講革命的做官僚，講言論自由的燒報館，講平民生活的住別墅，坐汽車，講男女平權的娶姨太太，買了頭。吳先生也同樣的言行不相顧，可是他與別人是相反的。他提倡的是物質文明，他贊成的是房屋愈寬敞，陳設愈奢華，電燈愈亮，汽車愈多，愈好。可是他自己呢，冬天穿一件老棉袍，夏天早晨睡在向陽的一間小房裏，頭上蓋兩張報紙，避免蒼蠅的煩擾，每餐自己煮些白菜白飯，出門往往在朔風或烈日底下從東城走到西城再回去。他的家庭也同樣的苦刻簡單。他自己也說過：「我的腦筋極新，我的手段極舊」。我們覺得極舊的不單是手段。實在極新的只是他的外表，他的內心還極舊。要是這句話還不能表示實在的情形，那麼我們只好採用心理學的名詞，說他的意識極新，下意識極舊，意識是西洋的物質主義者，下意識却是純粹中國的儒者。

最初，我們雖然十二分的佩服吳先生的道德，我們覺得他未免太過了。我們說他提倡的是物質文明，自己的起居飲食都反物質文明，同那些提倡精神生活，自己的行事却反精神生活的，一樣的不足法。可是現在知道這話只可以在各種事業已經上軌道的國裏說，在今日的中國，幾乎每天可以看見有用的青年，葬送在物質文明的裏面，才知道吳先生的光燄長新自有他的理由了。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像吳先生那樣「言行相顧」的也實在少得很，說勞工神聖的人多了，高談平等的人也多了，可是誰不是坐在洋車上，用手杖連連的打那車夫，說：「還不趕快跑，我要來不及到勞働紀念去演說了」那一類的人呢？我只見吳老先生真有那樣的精神。他輕易不肯坐洋車。一個聽差提了開壺進屋道：「臉水來了，吳先生。」吳先生答道：「已經用過了，王先生。」

孤桐先生說吳先生「製爲鐵律，以示進化歷程：民與官鬥者民勝；子與父鬪者子勝；學生與教習鬥者學生勝。」實在不足以盡吳先生的信條。他還得加幾句道：「民與官鬪者民應當勝；子與父鬥者子應當勝；學生與教習鬪者學生應當勝。」孤桐先生又接着說：「其或已與已派爲官爲父爲教習，其中國所留和調升降之地，雖亦有之，不甚惜也」。這幾句顯得他還沒有認得清楚吳先生。三年以前，吳先生在里昂，中法大學的學生一部分爲了膳宿費事鬧風潮。吳先生和副校長褚民誼先生都受很大的污辱。那時學生們所列吳先生的罪狀，與我們現在平常所見的一般校長的罪狀相比，還兇得多。大約三年前的京滬各報還留下紀念吧。吳先生那時很生氣，很失望。同吳先生離開了里昂。這是他自己的經驗。我那時也在里昂，目睹一切。我以前在英德遇見五四的許多領袖，因此對於中國的青年懷了極大的希望，可是見

了這次風潮，便發見了鬧風潮不一定完全是學生對。吳先生可不然了。他儘在私人談話時候也可以痛罵學生，可以一到作文演說，他總是，用他自己的話「硬硬頭皮的說學生對。」所以的「章行嚴何人，足言整頓教育乎？」，足解散女師大乎？若蔡子民斯可矣。」也不過說說吧了。要是真的蔡先生做了官，再說什麼整頓教育，他老先生恐怕還是不免要反對的！

這一層，我們也能夠了解和欽佩。可是我們總覺得吳先生是現在青年們數一數二的領袖，只他的話青年們還肯聽，他應當立在羣衆的前面，不宜跟了羣衆走，他應當處在指導的地位，不宜除了提倡工藝和科學的精神外，什麼事都讓它自己去。

孤桐先生又論吳先生的文章，也很有趣。

先生近用講話體爲文，縱筆所之，輒數萬言。其貌與黃口小兒所

作若同，而其神則非讀破幾百卷書者，不能道得隻字。此先生將曰：「狗屁狗屁，真正豈有此理矣乎？則鄉人有藏銀三十兩，而扁焉者，畏爲盜賊，因大書於外曰：「此處無銀三十兩」！先生之爲，亦此三十兩焉耳矣！……式可萬殊，文理一致。愈自晦曰：「沒字碑」，其字愈顯；愈自異曰：「不帶鳥氣」，其「鳥」尤數飛無已。故凡讀吳稚暉之文，輕輕放過，不審其所號投於毛廁之舊書，曾一一刻畫在腦筋裏可隱可見，雖百洗而不可磨者，直無目者也。

鈕惕生先生在倫敦到某圖書館的閱覽室，他問同行的人道：「三年的功夫，能不能把那些書統統讀一過？」他接着說他同稚暉先生在南菁書院的時候，一年之內把所有的書都看了一遍。這自然是吳先生三十歲以前的事。三十以後，雖然同南洋公學的陳頌平先生相約不讀

線裝書，可是他近十年隨便涉覽和參攷的漢文書籍至少總可以抵得三四個區區的畢生所讀的線裝書吧？

提起筆來，本打算好好的討論線裝書和白話文這個問題，可是剛要入題，地位已經沒有了，收稿的也上門了的，就此打住吧。

羅曼羅蘭

羅曼羅蘭是一八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生的，本月二十九日是他六十歲的整壽，我們不能不在這一天熱誠的希望這老英雄還有許多年不斷的奮鬥。

老英雄這個名字是有意採取的，用在羅蘭身上，我覺得，比大文豪或是大藝術家適當得多了。在歐洲，他是傳受了托爾斯泰的衣鉢的人。他少年時最崇拜的音樂家是貝德芬，最景仰的詩人是莎士比亞，最傾倒的生存的大文豪是托爾斯泰。托爾斯泰在他的小冊「怎樣辦呢？」裏排斥了世人所重視的文學和藝術，在他看來，貝德芬不過是肉慾的引誘者，莎士比亞是第四流的著作家。這二十二歲的青年學生，羅曼羅蘭，聽了他的話，好像航行的忽然夫掉了羅盤。「怎樣辦

呢？」真成了他內心衝突的焦點。他怎樣的寫信給托爾斯泰，和托爾斯泰的三十八頁的回信，久已成了文壇的美談。托爾斯泰在他的回信裏說明了他對於文藝的主張。無論那一樣事業的動機，應當是爲了愛人類，不應當爲了愛事業的本身。藝術家沒有這樣的愛，他創造東西不會有價值的。只有溝通人類的同感，去除人類的隔膜的作品才是真有價值作品，只有爲了堅定的信仰而犧牲一切的才是真有價值的藝術家。這些話在羅蘭的心中刻下了極深的痕跡。他此後的著作幾乎全有這樣的動機。他還是崇拜貝德芬，他還是景仰莎士比亞，可是這是因爲他在貝德芬和莎士比亞的作品裏面，找到托爾斯泰所沒有覺到的人類愛和堅定的信仰。

他愛的音樂，是音樂的美裏涵有道義的意義。他愛的文藝，是文藝的美裏涵有理智的光芒。他說 Debussy 的音樂，猶之 Racine 的詩劇，

雖然是非常優美的作品不過是法國天才的半面。此外另有一個極不相同的側面，「那是英雄的事業，理智的沈醉，一陣陣的大笑，求光明的熱誠，在文學裏面，臘培雷 (Rabouais)，莫理哀 Moliere 狄特祿 Diderok 的法蘭西，在音樂裏面，因為沒有更好的，我們就說蒲理渥 Berlioz 皮瑞 Bizet 的法蘭西。說句老實話，我喜歡的是這一個半面；但是我並不排斥那一面。」

他們一個奮鬥者，常常是孤獨的奮鬥者，而且他最初的四五十年還是一個無名於世的奮鬥者。他的生活很簡單。自一八九五年起他擔任了巴黎高等師範，他自己的母校的美術史的講師，一九〇三年他被任命為巴黎大學的音樂史的教授他在一九一〇年辭去了教授的職務，專心於著述。除了假期他常到意大利，德意志，瑞士旅行外，他的住家在巴黎。他結過一次婚，結果非常的不幸。

巴黎某街的五層樓屋頂有兩間小房子。屋子裏滿的是書籍，從地板沿牆堆直到屋頂。混雜在裏面的是朋友的相片，未完已完的稿件，貝德芬的半身像，靠窗的一張桌子，兩張椅子，一個小火爐。住在裏面只有一個人，也沒有同伴，也沒有下人。他是一個修長文弱的人，面色淡黃，因為少晒到日光。他的舉止行動都非常的溫和，藍色的眼珠十分的晶瑩，好像他的全付性靈都表現在眼裏。他是一個淡泊寧靜的人，不是寫文章，便是做筆記，不是做筆記，便是讀書籍。他每天大都只睡五點鐘，很少到附近的公園去散步，過了許多天，才有一個朋友爬上五層樓梯來同他閒談半點鐘。他所有的休息就是換一換自己所做的事，從寫文章到寫信，從讀哲學書到讀詩。他惟一的娛樂就是在黃昏的時候，坐在鋼琴前面，奏彈幾曲古今的傑作。這就是羅曼羅蘭的生活。

「成功不是他的目的，信仰才是他的目的」是羅蘭說他小說 *Jean* Christophe 的主人的話。這句話正可以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的信仰，是人類的同情，世界的和平，愛真理和公道，厭惡種種的卑劣和虛偽。他是個崇拜英雄者。他說「我門第一個責任是要偉大，要保守世間的偉大。」爲了他的信仰，他不絕的奮鬥。最初爲了猶太人德雷夫的事件，他同他的朋友立在被國人唾棄的少數人的中間。他的寓言劇 *Les Loups* 就是他的供獻。那時他已經寫好的劇本很多。有八種至今都沒有付印。Madame Duclaux 說她用盡了心計，才哄動巴黎評論的主筆發表他的 *Saint Louis, Aelf, Danton*。一方面因爲沒有刊物願意登載他們的作品，一方面因爲他們深不滿意當代文學的輕薄無聊，羅蘭同他的同學 Charles Peguy, 和 Andre Saures 出了一個定期刊物 "*Cahiers de la queinzaine*" Peguy 自然是這個刊物主動力，可是羅蘭的助力也不小。他們

知道他們正面的攻擊不會發生何種的効力，因為所有的報紙都是他們的敵人，所以他們只有憑着他們的犧牲的力量和耐心，開一條小小的生路，點一枝燭光。他們自己寫自己編的有十五年。羅蘭的劇本，他的名人傳，他的傑作 *Jean-Christophe* 大都最先登載在這個刊物的裏面，因為他們要維持他們的理想。要給人家一個榜樣，他們也不化錢登廣告，也不推廣他們的銷路，也不受稿費，所以羅曼雖然生活非常的困難，却沒有得過這刊物的一文錢。"Cahiers de la quinzaine" 在法國文學史裏的佔據的地位，現在早已有定評，然而在它努力發刊的時候只有少數的文人和學生知道和嘗鑒這個報。羅蘭的工作還不止這幾種。他同幾個少年人又提倡一種平民戲劇的運動。他相信劇院是一種道德的機關。不僅僅是幾萬上流階級的娛樂所，戲劇的藝術要是與人民的生活不發生了關係，不但不會有價值，而且會有極惡的結果。他

寫一本平民劇院的宣言，*Le theatre du peuple*，他又寫了好幾種表示英雄事業的劇本 *Theatre de la revolution*，可是失敗是他的命運，依然是失敗。

失敗雖然跟在他的後面，可是他依然不息的奮鬥。他的十大本的小說，*Jean-Christophe* 從一九〇四年起慢慢的在“*Cahiers*”裏發表。這是他最大的供獻。他說：「民族太小了，世界才是我們的題目」。他教人信哥德一百年前的話：「國家文學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世界文學的世期就要到了。」羅蘭的這部小說就是世界文學中的一個開山礮。

在一九一二年羅蘭還沒有多少人知道，到了一九一四年他已經成了歐洲，不僅僅是法國，文壇的首領。他久應得而不可得的地位是他的了。可是就是那一年，歐洲大戰爆發了，羅蘭因為力主和平及民族的親愛，又成了衆人所深惡痛絕的人。要是他在法國他也許免不了得

到社會首領 Jaures 和他自己小說裏的主人 Cerambaute 的結果，被狂妄的愛國者所暗殺。幸而他住的是中立的瑞士。可是他的生活也慘淡得很了。他成了法國報紙攻擊的中心，賣國賊是他的頭銜，協助敵人是他的罪狀。他的一句話，一個字都受許多報紙的指摘。有一位愛國家還收集了許多照相，證據，印了一鉅冊，搆成羅蘭通敵的鐵證。他的朋友都不管他為朋友。他的同志也不管他同志。可是他還是不灰心，還是提倡他的博愛，同情，和公道，在冤潮怒浪的恨毒的海中，羅蘭巍然成一個指示迷途的燈塔。現在大多數的歐戰時的書報都沒有一讀的價值了，羅蘭的 Au dessus de la mêlée 却依舊是人類精神的一個偉大的紀念。

線裝書與白話文

莫理哀的名劇 *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裏的主人翁約丹是一個暴富的商人。他想學些修辭學，好同受過教育的上等人來往。他的教員問他道：「你寫的是韻文嗎？」

「不是，不是，不要韻文。」他回答。

「那麼你只要散文了？」

「不，我也不要散文，亦不要韻文。」

「可是，要是不是這個就得是那個阿。」

「爲什麼？」他問。

「爲了，先生，表示意思的方法只有散文和韻文。」

「散文韻文之外就沒有別的了嗎？」

「沒有了，先生：凡不是散文就是韻文：凡不是韻文就是散文。」

「那麼我們說話，算是什麼呢？」

「散文。」

「怎麼！我說一聲：『尼古爾，拿我的拖鞋來，把我的睡帽也帶來』，那也是散文嗎？」

「正是，先生。」

「唉！我說了四十多年的散文，簡直自己一點都不知道！」他覺得非常驚奇和高興了。

約丹先生雖然已經說了四十多年的散文，以後也許還有四十多年的散文可說，可的要是真有一個祕書早晚侍候在他的身旁，把他所說的話都一字不改的記錄下來了，那幾百幾千冊散文的語錄中也許沒有一句話夠得上保存的價值。然而他的話一到了天才作家如莫理哀的口

中華筆下，便成了千古的傑作。所以林琴南的「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凡京津之種販，均可用爲教授矣」實在不實識者的一笑。

約丹先生的話固然可以做莫理哀劇本的材料，可是我們也得記住，單單他的言語是斷不夠用的。一般人日常習用的言語是非常簡單的。好像有一個英國言語學者曾經說過：莎士比亞在他劇本中用過的字有一萬，而英國平常人終身所用的字也不過幾百。

中國因爲語文分離的結果，語言特別的簡單。「引車賣漿之徒」究竟能用多少字，我們雖然不知道，可是我們敢斷言老百姓的土話決不成什麼寶藏，不是一個天才作家提了一把斧，背上一個袋，那裏面去搜求採集了一番便能自足的。自然我們希望有人肯到這鑛山裏開闢去，因爲老百姓的話雖然不見得怎樣豐富，實在有許多很優美的達意

表情的字句。可是白話文不得不採用文言的字句，而且得大大的採用，是不能避免的事實。這好像英文中就有好多的拉丁文法文字，只要你的同化力強，本可以無所不包的。

也許因為白話文不得借用文言的字句，相信這一句話的人可就多了：「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並不能爲白話。」所以蔡先生也說：「誠然，誠然」並且代北大善作白話文的教員，保證他們「博極羣書」，和能爲「古雅之古文」。所以孤桐先生論吳老先生的文章，說它：「其貌與黃口小兒所作若同，而其神則非讀破萬卷書者，不能道得隻字。」又說：「凡讀吳稚暉之文，輕輕放過，不審其所號投於毛廁之書；曾一一刻畫在腦筋裏，可隱可現，雖百洗而不可磨者，直無目者也。」所以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之先生也開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我是不主張完全不讀線裝書的，可是對於上面所說的話，也不敢盡量的贊同。讀破萬卷書的人，不一定能做古文，也不一定能做白話，那是很普通的事實。一個潛心故紙堆裏的讀者，不一定有充分的表現力。康德和叔本華都是德國的大哲學家，叔本華的文章非常的流麗，康德的就很不容易讀。斯密亞丹和理嘉圖都是英國經濟學家的巨擘，斯密的文字一清如水，理嘉圖的意思都至今還有人爭訟不已。天演論之首倡也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都負當世的盛名，達赫二氏的著述現在還有許多人愛讀，斯賓塞却因不善爲文的原故，只有專門學者問津了。他們都是學術中的泰山北斗，然而有的善屬文，有的不擅文章。原因何在？當然不是爲了有的多讀破了幾千卷書吧？所以有許多國學大家，平素不輕易寫一個字，偶然動筆，不到三行便會開笑話，有人覺得奇怪，其實就是同樣的道理。

反過來，會做文章的，也不一定讀破萬卷書。莎士比亞時代的學術大都在希臘拉丁文裏面，他却只懂得一點兒拉丁文，幾乎不懂得希臘文。近代的大詩家如 Robert Burns 大小說家如 Jane Auston 和 林琴南 先生所稱道不置的的迭更司都沒有讀幾本書。太戈爾在中國的時候，他勸人少讀書，多逛山水，到自然裏去找真，找善，找美，找人生的意義，找宇宙的祕密。實在不單單印有黑字的白紙才是書，生活就是書，人情就是書，自然就是書。古人所說的「山川靈氣所鍾」，如說在未生之前，雖然大可討論，如說在已生之後，是毫無疑問的。中國不讀幾本書而能成大作家的實在很少。這就是古文的毛病。古文，尤其是駢文詩詞，得用典，所以不得不博聞強記，古文得用古人，尤其是秦漢以前，的模調，所以不得不揣摩模仿。這樣的結果，一個人讀破了萬卷書，他的一點獨得的才氣也就壓在萬卷書的底下了。白話

文的好處就是能避免這一種弊病。

胡適之先生在新做的「老殘遊記序」裏面有一段說得極澈透，極有精采的文章。

「舊小說何以這樣缺乏描寫風景的技術呢？依我的愚見看來，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由於舊日的文人多是不出遠門的書生，缺乏實物實景的觀察，所以寫不出來，只好借現成的詞藻充數。第一層容易明白，不用詳細說明了。第二，我以爲這還是因爲語言文字上的障礙。寫一個人物，如魯智深，如王鳳姐，如成老爹，古文裏的種種爛調套語都不適用，所以不能不用話的語言，新的詞句，實地作描寫的工夫。但一到了寫景的地方，駢文詩詞裏的許多成語便自然湧上來，擠上來，擺脫也擺脫不開，趕也趕不去。人類的性情本來多是趨易避難，朝着那最沒有抵抗的

方向走的；既有這許多現成的語句，現成的字面，何必不用呢？

何苦另去造鑄新字面和新詞句呢？

不要說人情都是趨易避難，要是你一進了古文是圈套，你要趨難避易，另闢一條新路也就不容易有好些善做古文的朋友，他們竭力的想寫白話文，可是一動筆就有許多「擺脫不開，趕不去」的成語湧擠到筆尖來。你讀了他們的白話文，總不免想起已經裹過再放開的天足。就是適之先生自己，近來研究唐宋以來的詞，他偶然做的新詩，已經常帶着極濃厚的詞的氣息，與嘗試集的風格不同了。

因此，人們總說白話文好做，古文難做，我總覺得白話文比古文難了好幾倍。古文已經是垂死的老馬了。你騎它實在用不着鞭策，騎了它也可以慢慢的走一兩里，可是它的精神早就沒有了。你如要行數百里，或是要跋涉數千里，那麼你就不能不另覓坐騎。白話文是沙漠

裏的野馬。它的力量是極大的，只要你知道怎樣的駕御它。可是現在有誰能真的駕御它呢？

再論線裝書

(下篇)

世界上還沒有包治百病的萬應丹。平常所謂良藥，用了得法固然可以起沉痾，用了不得法也許可以殺死人。世上也沒有繩之萬古都相宜的真理。太戈爾勸人少讀書。他對於東方的文藝，雖然洞見癥結，對準了毛病發藥，可是說給現在的中國人聽，實在如像煎了一劑催命湯。新中國誠然有許多地方用得着外國朋友的指導，可是不讀書那一層是已經毋須勸駕的了，雖然不讀了書也不見得就與自然相接近。

自然是要親近的，人生是要觀察的，生活是要經驗的，同時書也是要讀的，雖然不一定要至少讀破多少卷。許多的天才是不用讀什麼書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博覽羣書的。許多的天才是沒有經過學習時期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化了多少年的心血才逐漸成熟的。況且天才

向來是鳳毛麟角般少見的，大多數以天才自負，或是被朋友以天才見許的人也許不過是野雞毛鹿角之類吧？自從有書已經有二千多年，這二千幾百年中不知有多少天才在藝術之園裏培養了多少花草，在理智之塔上加了多磚。誰能在藝術之園裏去種一枝還不會有過的花樹，或是在理智之塔上砌上一塊小石，已經盡了天才的能事。你不進園細細的賞鑒，或是不費力爬到塔頂，這希望是容易落空的。

書是要讀的，可是不一定要讀中國書。不但這樣，努力於新文學的人，我以爲，雖然不能如吳老先生所說，完全不讀線裝書，也得少讀線裝書，多讀蟹行文。我不是說中國沒有優美的文學。我們的祖宗實在曾經給我們無數的寶山。只恨子孫不爭氣，非但不能發揚光大他們的先業，却在寶山上壓着層層的砂磧，弄得我們的文學成了一種矯揉造作的虛僞的文學，與自然沒有一點關連，與人生更沒有一點關連。

近代的中國文學可以說是「計聞式」的文學，因為計聞很可以代表中國人表示情感或意見的方式。「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顯妣」了，「孤哀子□□等泣血稽血稽顙」了，「苦塊昏迷，語無倫次」了，甚而至於「所以不卽死者，徒以有：：」了，那一句是真話？大家明明知道這是假話，可是大家還得用它，正因為大家覺得自古以來大家就這樣用。在文藝裏也是如此：你自己的情感，或是沒有情感，是不要緊的，最重要的是古人對於這事怎樣的情感。所以，最美妙的文章得「無一字無來歷」！結果爭事模擬，陳陳相因的牢不可破，再沒有半點新鮮活潑的氣象。

我們覺得一個人能說一句自己心腔中的話，勝於運用一百個巧妙的典故——不用說大多數的典故是粗笨無聊的了——一個人能寫一段自己親見的風物，勝於堆砌一千句別人的典麗斌媚的文章。文學家的天才正

在他的感覺特別的靈敏，表現力特別的強，他能看到人所不能見，聽到人所不能聞，感受到人所不能覺察，再活潑潑地寫出來。同一風景，我們不能十分領略它的美，可是讀了天才的作品，他好像給了我一雙新眼睛，我們對於那風景增加了欣賞。同一人事，我們也許漠然的看過了，經天才作家的赤裸裸的一描寫，我們就油然而生了同情心。所以世間偉大天才的作品，我們非但不能不讀，還得浸潤在裏面。可是我們不是爲了要模擬他們的作品，不是爲了要抄襲他們的文章，只是爲了要增高我們的了解力，擴充我們的同情心，使我們能夠讚美自然的神祕，認識人生的正義。

也許有人要說了，這樣說來，線裝書不是不可讀，只是讀的人不得法。要是換了方法，線裝書還不一樣可讀麼？線裝書本來不是不可讀。就是吳老先生也不過「約三十年不讀線裝書」罷了。可是，第

一，披沙尋金，應當是專門學者的工作，文藝作者沒有那許多功夫，也不應當費許多功夫去鑽求。第二，適之先生說過：「人類的性情本來是趨易避難，朝着那最沒有抵抗的方向走的，」古文的積弊既久，同化力非常的大，一受了它的毒，小言之，種種的爛調套語，大言之，種種的陳舊思想，就不免爭向那最沒有抵抗的地方擠過來。你一方面想創造新東西，一方面又時時刻刻的盡力排棄舊東西，當然非常的不經濟。所以要是你想在文藝的園裏開一條新路，闢一片新地，最簡單的方法，是暫時避開那舊有的園地，省得做許多無聊的消極的工作。將來你的新路築成之後，儘可以回頭賞鑒那舊園裏的風物。

書是要讀的，並且得浸潤在裏面，只是那得是外國書。中國人的大錯誤，在「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八個字。他們以爲外國人勝過我們的就是在物質方面，不知道我們什麼都不及別人。就是以文學來

說，我們何嘗勝過歐洲呢？就算中國與歐洲的文學各有它們不能比較的特點，歐洲文學也不能不作我們新文學的「因斯披里純」。他們的文學，從希臘以來，雖然古典主義也常擅勢力，特殊的精神還是在尊自由，重個性，描寫自然，實現人生的裏面。這當然是新的文學，活的文學當取的唯一的路徑。中國的文學裏雖然不是沒有這樣的精神，例如陶淵明，李太白，也窺探過自然的神祕，杜少陵，曹雪芹，吳敬梓，也搜索過人生的意義，可是他們在幾乎不變的中國古典文學中，只是沙漠中的幾個小小的綠洲罷了。

我們只要一讀各國的文學史，就知道文學不是循序漸進不生不滅的東西。一個民族的文藝好像是火山，最初只見煙霧，漸漸的有了火焰，繼而噴火飛石，燐質四溢，極宇宙之奇觀，久而久之，火勢漸殺，只見烟霧，再多少時煙消霧散，只留下已過的陳迹。有些火山過

了少年便一發，所以在兩個發動期之間，靜止不過是休息，有些却一發之後，不再發了。文學運動也是如此。由小而大，漸達澎湃揚厲的全盛時期，又由盛而衰，也許由衰而歇，如希臘文學一樣，也許改弦更張，又達美境，這樣盛衰往復，循環不已，如近代歐洲的文學。每一種運動，在颯起的時候，都有奮鬥的精神，新鮮的朝氣，一到了全盛之後，暮氣漸漸加增，創造的精神既然消失，大家棄了根本去彫琢枝葉，舍了精神去模仿皮毛，甚至至於鋪張的正是它的弊病，崇尚的正是它的流毒。在這時候，精神強健的民族，自然就有反動，它們或是回溯往古，如韓退之的「非秦漢以前之文不敢觀」，或是飲別國的甘泉，去作革新運動，它們的方法雖然不同，對於已過的運動，大都不問良莠，排斥不遺餘力，是一樣的。復古的辦法，雖然也可以一爽耳目，可是仍舊徘徊在古典文學範圍之內，好像散種子在不毛之

地，難望它開花結果。在別國的文學裏去求「因斯披里純」，結果却往往異常的豐美，猶之移植異方的花木，只要培養得法，往往可得色香與原來大異的美本。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體製方面，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裏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這自然不過是開端，將來的收穫如何，要看他們和其他作家努力的結果了。

可是很不幸的，提倡新文學的恰巧是胡適之先生，一個對於研究國故最有興趣的人。國故是應當研究的，而且不比其餘的科學不重要。顧頡剛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第十三期裏有一篇極好的文章，把這一層意思發揮得淋漓盡致，我覺得幾乎沒有一句話不同

意。可是讓顧先生胡先生去研究他們的國故好了，正如讓其餘的科學家研究他們的天文，地理，化學，物理等，好了。不幸的是胡先生是在民衆心目中代表新文學運動的唯一的人物。他研究國故固然很好，其餘的人也都抱了線裝書咿啞起來，那就糟了。新文學運動的結果弄得北京的舊書長了幾倍價——幾年前百元可買的同文館版二十四史現在得賣三百元——這是許多人常常引了來代新文學運動誇張的，可是這是我覺得最傷心的事。

苦力問題

「北京城裏百分之十九的居民就是靠着洋車夫的行業過活的。」這是李景漢先生費了半年功夫，調查北京洋車夫的情形得到的結論。（見本刊第六十二期一八五頁）百分中的十九！那不是說，每五個人中間，就有一個洋車夫，或與洋車夫有「經濟的關係」的人嗎？換一個說法，每四個人就得供養一個靠洋車夫過活的人！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巨數。在統計學者看起來，方法是十二分的重要，結論是不一定有的絕對價值的，他們也許還要懷疑的詢問。在我這樣不懂得統計學的人，就未免有些震驚了。

說起了洋車夫，我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想。也許是爲了這兩句話吧？我來北京之先，有一個親戚勸我「不要到北京，就是到了北京也

不要做教書匠。他說：「我在報上看見北京的教員有的窮到晚上拉街車。在遠地方拿不到錢不是玩的。拉車我們又沒有那力氣。」我誠懇的謝了他的好意，也就來了。在北京不久，有一個老朋友叫我到一旁悄悄的勸我道：「你怎樣還不備一個包車？你這樣的跑上街去雇車，是要招人輕視的。在北京，包車是不可沒有的需要品。」我也很誠懇的謝了他的好意。從那時到現在，我也在北京混了幾年了，雖然邀天之幸還沒有晚上去拉街車——恐怕那種情形也就不遠了！——那一輛不可沒有的包車還不會享用過。不過他們的話實在都沒有說錯。教書匠真是窮。包車也真是小波淇窪 *Petit bourgeois* 的護照。要是一個人從包車而馬車從馬車而汽車大家都說某人「紅」了，或是「發財」了。要是連包車都沒有，他還算什麼呢？

也許是爲了上面所說的原故吧？不過也許是爲了我們同洋軍夫接

觸的機會，在各種勞工人們中，比較的多些。在北京幾乎不能不坐車。第一北京的地方實在大。第二，在北京街上跑路是一種極大的冒險。你不能望着天，你也不能望四週的風景，你得時時的留神你的腳下。要不然，你是拌一交，就蹈了一腳的矢楪。并且，穿大褂的人不能走路，好像是北京的不成文憲法。至少洋車夫們都有這樣的觀念。「車呀！」「拉去罷！」的聲音，不止的在你耳旁叫聒，那麼爲了清靜省事計，只有那採取無抵抗的辦法，坐車了。

我是不懂得統計學的，上面已經說過，所以也從來不想在車夫身上去搜集社會調查的資料。不過我也曾經想同他們談談話，問問他們對於許多事物的觀念。可是我的京話實在太糟了。我們中間總隔開了一堵牆。我偶然問一句話，也許得反復的申說了幾遍才懂得一點，那自然使我灰心而默然了，也許他們以爲我是在責難的申斥，登時現出難

着的顏色——在他們的生活中，責難固然是家常便飯呵——那使我更加灰
心而默然了。

因此，雖然同我曾經有過關係的洋車夫至少有幾百，我實在不會
看見他們的心。他們是有心的，我並不疑惑。而且他們中間還有許多
不成文的規則。譬如說吧，一輛車要搶到另一輛的前面去，也許有一
定的辦法的。要是不守那規則，那輛的洋車夫也許就得認爲侮辱了
他，並且激起他的憤怒和比賽的精神。這樣比賽的結果，勝者固然得
意萬分，敗者也不免垂頭喪氣了。我最不能忘的是一次同一個朋友回
家，拉他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童，拉我的是二十歲左右的少年。一
輛車來了，突過了在前的孩童的車。壯年數勵向前追，見他實在力量
不支了，就自己拚命飛跑，追過了那犯窺的車，又比賽了一陣，還是
勝了他，緩下來冷笑道：「你只會籍負小孩子！」

上面所說的規則，也許完全是臆度的幻想。不過這一定是有幾分根據的：北方的車夫與南方的不一樣。在上海，越是天氣不好，好像拉車的偽賣買的越多。在北京就大不相同了。大雨大雪天，北京街上往往絕了洋車的跡。炎夏赤日的底下，也常常可以看到洋車夫睡在樹蔭下，傲然的不理雇客的叫喚。這很可以做北方人不及南方人勤快的一種證明。也許就有人因此比較南北工人的優劣了。可是，這難道就是北方人的劣點麼？不定是北方人比較的懂得人生的意義吧？他們拉車，爲的是生活，不是爲了愛拉車。那麼這要夠了生活，何必拚命的做牛馬？要是大雨泥濘中去受罪，何不餓一餐半餐呢？有人或者要說了，這是熱帶中斐洲土人的人生哲學。他們終年不用穿衣裳，街上有的是充饑的果品，所以除了吃喝睡覺，什麼也不肯做。可是，朋友，你以爲他們現在進步了嗎，現在歐洲人把酒漿和裝飾品做引誘他們工作

的報酬品？

北方工人沒有南方的勤快，南方的工人沒有北方的能笑樂，那是最容易覺察的分別。羅素在他的「中國問題」裏，說起：

「我記得一個大熱天，我們幾個人坐轎過山——道路崎嶇難行，轎夫非常的辛苦我們到了山頂，停十分鐘，讓他們休息一會。立刻他們就並排的坐下來了，抽出他們的煙袋來，談着笑着，好像一點憂慮都沒有似的。在一個懂得眼光稍遠的利益的國內，他們就會用這機會訴說酷熱的苦楚，好多得幾個酒錢了。」(Problem

of China, p. 200—201)

我想，羅素所說的大約是北方的苦力吧？南方，尤其是上海附近的工人，似乎就不是這樣的了。固然不錯，羅素在上面一節之前，有這樣的幾句話：

「無論那一階級的中國人，都比我所有過接觸的別種人種愛笑樂；無論什麼東西，他們能在裏面找出樂趣來，無論什麼紛爭，只要一句笑話就和緩了。」

中國人真是這樣嗎？在我看來，恐怕這話的反面還比較的真切些吧。中國的所謂中上流階級，有的是嚴厲的面孔，在什麼事物裏都找不到樂趣——只好打牌，逛窯子了——而且頂沒有的是「幽默。」

話又說遠了。我是要說北方的工人愛笑樂。就是在工作的時間，幾個洋車夫會一面跑，一面笑着樂着。我們以前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個車廠。每到黃昏時候，裏面就有簡單的音樂聲，吹着唱着，哄堂的大笑着。他們好像真知道怎樣享樂人生的。有一天，一個崇拜東方文明的友朋同我爭論東西文明的優劣。他說西方物質文明越是發達，他們的苦悶也越是增加。所以有許多人反而迴頭望着東方了。我說，「你

聽見那音樂嗎？那是附近的車廠裏發出來的。他們每晚都這樣的快樂。我羨慕他們極了。可是我真是去過他們的生活，我能同樣的快樂嗎？不要說我沒有那氣力，就是有，我恐怕在原有的苦悶之上又加幾倍苦悶了。西方人也是這樣。他們以爲我們比較的快樂，可是他來過我們的生活——當然不是說西方人在中國安享的特殊的的生活——恐怕一天也過不慣。何況我們也有我們的苦悶，西方人苦在不知道。洋車夫也有洋車夫的苦悶，也只恨我們不知道吧了。」

洋車夫當然有他的許多苦悶。雖然有一次，我聽見一個五六十歲的老車夫同他的同伴們這樣說：「拉車的有拉車的命。坐車的先生有坐車的命。我坐了車，我的頭就得暈。」可是，我想，這恐怕不能代表車夫的感想吧。他們拉車的時候，也許羨慕坐車的人，也許怨恨自己不會投身在一個較好的人家，也許——在坐車的聽了，這是何等

可怕的思想！！——他們正在說他什麼都不比那坐車的人差，爲什麼拉車的是他，坐車向是他。

有了這麼的思想，他臉上的笑，心中的笑也就消滅了。南方工人與北方不同的地方，也許就在這裏吧？可是，近一年來，北方的拉車的也不像以前的快樂了。他們生活的壓迫增加了嗎？他們對於人生的觀念有些更變了嗎？這也生活的一個 *Dilemma*。他們的思想不變更，他們的地位沒有遷善的希望。他們的思想變更了，他們的樂趣也就消滅了。在過渡時期的人們，總是只有苦悶的。

我在第五十九期的閒話裏提起了吳稚暉先生在里昂時的一段故事，後來引起了不少的誤會。今天細細的看了一遍，覺得還是沒有應當修改的地方。不過有兩點是用得着聲明的。

第一層，吳先生始終沒有承認去做中法大學的校長，更說不到領校長薪水了。那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同時，法國人和學生都認定他是校長，那也是毫無疑問的事實。要不然，一部分學生——好像不止七八個人吧——也不至於爲了膳宿費事同吳先生去爲難了。並且，如果我設有記錯，這校長問題就是風潮中兩方爭論極劇烈的一點。因爲如此，我的原文中，只用了「吳先生在里昂」六個字，沒有說他是中法大學的校長。

第二層，這一個故事，我是用了來證明吳先生「言行一致」的地方的。因爲吳先生相信學生，就是他自己受了窘，還是迴護學生。就是他背後雖然有時也非議學生，在作文演說時總不肯這樣說，那都可以證實他信仰的堅確。英國內閣的關員在閣議時對某種議案儘可以盡力的攻擊，但是既經通過之後，他們爲了公共負責的原故，出外就得

反過來竭力的辯護，斷不肯說他們原來是反對的。某黨的黨員對本黨的政策儘可以有許多不滿，但是在大家面前，還是說他的黨最有希望，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如果把這件事也去證明吳先生的「言行不一致」的地方，那就不是我「始願所及」了。

空谷蘭電影

新近我同兩個朋友去看了一個中國電影片，空谷蘭。中國電影我實在有些怕看了，可是每一次我聽說一個頂好的中國影片到了北京，我還是去湊一次熱鬧。連空谷蘭已經三次了。第一次看的是孤兒救祖，現在還能夠記得一個女人，小孩在田岸上一路的跑，一路的跌筋斗。第二次看的什麼，名字已經忘記了，可是沒有忘記兩個人在海岸上演中國舊式的武戲。將來第四個頂好的中國電影片到北京時，我不知道空谷蘭還留下什麼影像。大約兩個女人在地上打滾的情狀，一時總不會忘記的吧。

見聞既然這樣的狹窄，空谷蘭是不是頂好的中國影片，我自然沒有資格來評判。不過，在我所看過的三個頂好的中國影片中，至少可

以說，這一個片的毛病比較的少些。攝影的技術顯然了進步了。以前的影片有時幾乎像報紙上印的照相，模模糊糊的看不出東西來。這一個影片却黑白分明，光線很好。排演的人也費了些心思了。據說以前的影片，有時一個人從馬上跌下來的時候，跌折了右手，到醫院中醫治的時候，却變成了左手了，有時一個嵌肩兒在一剎那間，雖然並不是演滑稽劇，會從一個人上飛到第二個人的身上。這樣的笑話一片裏可以說有，雖然也不是沒有可以非議的地方。柔雲在馬車上摔下來的時候，面上血肉狼藉得不堪了，地上怎樣會些樣的乾淨呢？

提起了一問題，許多問題就擁上心來了。小一些的。兩個聽差打架，許多立在一旁的聽差爲什麼不去勸一勸？床上的病人已經垂危了，怎樣三四個醫生還在病室中快步的繞圈，一個還抽呂宋烟？夜深天寒，大家都會覺着冷，太太爲什麼反把自己的外氅給丫環去穿？丫

環回家去取相片，沒有車錢，太太爲什麼不給她些錢，一定得把手袋交給她？紐珠雖然生長鄉間，也是讀書人的女兒，並且好好受過些教育，後來可以充當教務長，怎樣會不知道客人和長者應當先坐及上坐的道理？比較大一些的問題。紀蘭蓀同柔雲在一塊兒生長，却不願娶她，一見紐珠，便非常傾心，可是結婚不久，雖然紐珠有了兒子，他又與柔雲相愛，足見他是一種輕浮薄倖，得隴望蜀的人，紐珠初死，他也許會悲慟萬分，柔雲既然嫁了他，他不久也許便覺得厭倦，可是他這種人那能懷念死者，十幾年如一日呢？柔雲既然換了毒藥，被紐珠發覺，她拿了沒有毒的藥瓶下樓上樓，到處亂跑，爲了什麼呢？如說爲了要滅跡，那麼一瓶有毒的藥明明在病室桌上，如說爲了不讓病人吃到那瓶藥，那麼可以丟棄毀壞的方法正多，何必東跑西闖，滿地打滾呢？一個從不曾見過生母的孤兒，忽然聽見親母尚在人間，而且就

在眼前，一個以爲愛妻已死十幾年的丈夫，忽然見亡妻正在家中，應當怎樣的高興喜歡？這當然是影片頂有精采的地方，演員最可以來表情的機會了，爲什麼反而把這一幕略去呢？

我不過隨便舉幾個例罷了。誰耐煩來細細的開什麼清單？可是在這個問題之外，我還有幾句話要說。

空谷蘭這樣的劇本，根本就沒有多大的意思。難道中國的想像力真是那樣的窮乏，連這樣幼稚的劇情都編不出，還得取材於譯本？原文寫的既然不是中國的人情風俗，所以有許多地方，也不是中國思想所有的，例如外國貴族是特殊階級，他們的言語行動，與平常人有大不相同的地方。中國人只有受過教育和不曾受過教育的分別，並沒有什麼貴族的特殊儀節。因爲如此，排演者爲了要表示紐珠不懂那本來就沒有的貴族的儀節，便不得不奪去了紐珠的常識。（要是說誰比較

像貴族的話，恐怕還是緞珠近似些吧？柔雲的舉止行動，反而處處顯得她是一個小家碧玉了。）

說明劇情的字幕非但太多了，而且沒有一點兒意味。據說這是爲了要合上海觀衆的心理，我想，這也許太小看了上海觀衆了。實在字幕的多少，在本身沒有爲不好可說。有些影片，字幕已經像火車軌道旁邊的電線桿，可是並實嫌多，因爲不那樣，觀衆便不能了解故事的線索。有些影片，字幕寥寥若晨星，觀衆也不嫌少，因爲他們已經很明白了。這兩種片子的編製和演員的表情一定就大不相同了。所以我們要求減少字幕，注意並不在字多字少，實在就是在要求線索分明的編製，眉目能言的表情。要是一個片子的編製和表情都好，就是上海人，我想也不至於一定要有極多的字幕才甘心，至少影片上每一個字的用意，不是必要的說明，就爲了要增加觀衆的興趣。就是上海人也

不至於喜觀那毫無意思，甚而至於可以打消興趣的字幕的吧？

空谷蘭的編製在中國影片裏，實在可以算經濟的了。要是仍用以前那種只見過場，不見劇情的方法，這一點情節至少得三四十本才演得完，像我們這樣被外國影片教壞了的人，少不了覺得它還是太平淡，再可以節省十幾本。這當然又反背了上海觀衆的心理。據說上海觀衆看影戲，好像北京觀衆聽舊戲，看一回，就得談一回天，所以電影片的動作得特別的放慢，讓他們談了幾句話之後，回頭過去，還可以懂得片中的線索。我們不知道上海人看不看外國片。要是他們也偶然看，反怎樣的尋找線索呢？

我看了空谷蘭，我實在覺得驚詫，中國電影辦了好幾年，辨這種事業的人，還不會得到一個極淺顯的教訓。電影與舞台劇的分別在那裏？電影在什麼地方可以取勝？中國電影不及外國的在那裏？怎樣可

以彌補中國電影的缺點。電影的最擅長的地方，在可以利用美麗的奇特的，險阻的種種不同的天然風景。中國影片的最大弱點，在演員沒有表情的能力。空谷蘭的前十本好像還注意到這一點，可是後十本，幾乎一半是在病室裏。結果還有什麼可說呢？

中國的精神文明

今天各報都登載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先生「主張整頓學風」的通電。據說「國軍首領對學界之嚴正諷誨，此尙爲等一次」（京報）。我細細的拜讀幾了遍，欽佩之餘，雖然不敢說革民民衆所屬望的將領有「開倒車」的嫌疑，却也不免覺得張先生的議論，有些地方，與章詒桐先生好象「一鼻孔出氣」，要是登在甲寅週刊的通信欄中，少不了要濃圈密點，大受獎借的。因此我對中國軍人的敬仰，自然而然的更深了一層。他們不但能遣兵調將，奪壘攻城，還得統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而且夙興夜寐，軍事政務已經夠忙的了，還得「清夜以懋」想種種「扶風翼教」的方法。真「古之人歟？古之人也。」足見中國儒將的種是不絕的。這也是我中華與衆不同的地方。

像我這樣既不知兵，又不解政治的人，自然更夠不上去懂「國立於天地，必有與立」，和「數千年來，所恃以繫人心於不弊者」的大道理了。我也不敢妄想去懂它。不過張先生的文章裏，有兩句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說：「我中華……物質雖不及他國，而文化之優異有足多者。」我不知道這「文化」兩個字，指的是什麼。在我一向愚妄的見解我總以爲「物質」也是「文化」裏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分開的。初民從單用齒牙爪到利用石器，從石器到銅器，從銅器到鐵器，不知經過了幾千幾萬年，看來雖然不過「物質」的不同，可是大家都認爲人類文化史裏面的大關鍵。

也許張先生的意思——恕我無狀，胆敢妄測民衆袖領的意思——是把「文化」二字，來代表一般人所謂「精神文明」的。「我們中國，物質文明雖然不及他國，精神文明實在別國的上頭。」這不是中國人個

個平常自負的話麼？二十年前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到現在變成了這樣一句話。大多數的中國人因此都把這句話做「保存國粹」的護符，少數排斥中學，提倡西學的人，也並不反對，只是說物質文明比精神重要得多。

我是愛好物質文明的，可是我尤其愛好的是精神文明。我覺得發明了火藥來做殺人的利器，不如做新年裏小孩子玩放的花炮。我想，要是我們學西洋的學問單爲了物質，也儘可以不學。可是我很希望中國人多研究些歐洲的東西。這當然不是爲了要抄襲那皮毛的物質，但是爲了希望大家能夠得到一點歐洲的精神。在我看來，我們的物質文明固然不如人，我們的精神文明也同樣不如人。

究竟中國精神文明的特色是什麼，我實在不敢說知道。也許有人要教我們開化極早的文化，古聖先賢的學說。對於這些，我自然也有

相當的敬仰。可是不止我們有開化極早的文化，不止我們有古代的聖賢。大前日的埃及 巴比倫，前日的希臘，昨日的印度，也許就是今日的中國。不靠自己，專靠你的祖宗，是究竟不中用的。

也許有人引孤桐先生話了。他說吳先生「被辱於日本，憤而自沉」，「是乃真經生真文人之受用處」。這話我很能夠同意。可是他說：「此其精神，信惟吾儒有之，」我就不敢附和了。這種精神，只有富於修養的能有，可是富於修養的不一定是「吾儒」。希臘大哲學家蘇格里底斯受人誣告，坐了死罪。有人勸他逃避，他不聽，從容的飲毒藥。有些弟子痛哭失聲了，他神色自若，叫他們不要作聲，讓他安靜靜的出世。這又是何等精神呢？並且我說過：「讀中國書的人那樣的，這樣的真經生，真文人，還不是在中國同外國一樣的難找？」說到一個海的深淺，當然要指平均的數目，不能指出最深的或是

最淺的處所，來代表全部。說到一個民族的行爲，自然也得看大部分的民衆，不能舉幾個賢者，或是幾個善羣之馬來概括其餘的人。從道德方面說，中國人同英美的人可以比較麼？我們的官吏比得上人家的官吏嗎？我們的軍人比得上人家的軍人嗎？我們的種種色色人比得上人家的種種色色人嗎？主張農治者自然把世風的不古，道德的淪亡，歸咎到都會的工業。好像農民個個是天上安琪兒似的！這實在是住在城裏的讀書人白天的迷夢。不要說中國官吏的貪婪，軍人的橫暴，種種色色，都是由來已久的事實，與都會工業，沒有半點關係。就是農人，我想也沒比他們更自私，更慳吝，更醜惡，更缺乏同情的人。要是比較工人和農人，工人雖然有許多不道德，農人還夠不上說道德。這倒不是單單中國如此。愛爾蘭也是這樣，蕭伯納可以作證，俄羅斯也是這樣，所以要是蘇俄工人單壓制農人，我倒也還有幾分同情。不

過中國農人的智識，更加低吧了。

我很相信希臘哲學者的觀念，善是與智慧相聯的。一隻猛虎關在鐵檻中，不作惡事，那並不是善。一個人受了禮教的來縛，不敢爲非，可以算善嗎？甲爲了父母吩咐，不准狎妓，所以不逛窯子。乙爲了怕染花柳病，也不逛窯子。他們有分別嗎？他們比逛窯子的善了嗎？丙爲了人類的同情，不忍幹那樣的事情。他比他們如何？究竟世界的進步，要依賴那一種人呢？我承認社會中多的是甲和乙，丙是每時期極少數的引導着。他在前面走，無量數的甲乙在後面追隨着。所以禮教是不可少的東西。

不過禮教有時是吃人的東西。要是數百數千年前早已不適用的信條，把持了一切，不讓那少數引導者有探索革新的機會，那麼禮教就可以吃人。真理不是絕對的，善和美不是千古不變的。在某種時期，

某種環境之下的善，在另一時期，另一種環境之下，不一定是善。「數千年來，所恃以繫人心於不弊者」的「先聖之禮教」，到現在不能「淪也」，正因為它是「數千年」前「先聖之禮教」。禮教像長城，不是一朝一夕能倒塌的。它的淪亡，「由來也漸矣」。所以我們很遠的祖宗，就已經歎「世風之不古，道德之淪亡」。可是他們不想法去尋找那適宜於新環境的禮教，仍舊墨守數千年前古聖的大道理，所以一天糟一天，直到今日，政體改了民治，經濟又漸漸的有了都會工業的制度，自然完全傾倒，無可挽救了。在這時候，不去研究物質和精神文明先進國的新道德觀念，做我們的借鑑，却長吁短嘆，以為「國將不國」。難道大家同聲一嘆，長城就重新鞏固了嗎？孤桐先生算究竟比較聰明些。他們知道中國的舊禮教與新環境不相合。可是他們不去找適應新環境的新禮教，却想退到適應舊禮教的舊環境。這真好像

要叫江河倒行，叫中年人變成初生的小孩，一定同樣的勞而無工的。一開倒車」三個字，描寫孤桐先生農村之國的主張，一是點不錯的。自然有人要說了，歐美的新道德觀念，他們自己還不滿意，我們能依樣葫蘆嗎？老實說，我承認歐美人也還沒有找到十分滿意的新禮教，可是他們是在找，我們正應當做同樣的工作，並且他們已經得到的成績，已經很夠我們的參攷。

道理是與智慧相連的。知識也是精神文明的一方面。在這一方面，我們更加瞠乎在後了。不要說我們的工藝科學不及人，就是講玄學，我們就追上人家了嗎？不要說玄學，就是講國故，那應當不成問題的了，可是少數西學者的供獻比我們的國學大家多的多，恐怕我們還有一個比較有用的國學研究院，還得請西洋學者來指導。

關於文字，將來有機會，也許還有幾句話要說。

文化的交流

「我中華物質雖不及他國，而文化之優異有足多者。」這句話引起我們的注意後，不到幾天，就有了很好的證明。真的，像三月十八那樣的慘殺愛國民衆，只有在文化優異的中國才看得到。他們那些物質文明先進國，在物質文明已經發達之後，從不會有過這樣優異的文化，除了對待他們所認為物質文明不及他們的民族。可是，就是對待他們輕視的民族，他們也只殘殺反抗他們的人，從來不流挺身做他們的後盾的民衆的血的。

要是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的「優異」，我還覺得是越不「足多」越好些了。要是我們的「精神文明」就是這麼一回事，我情願還是不要我們原有的「精神文明」吧。

我聽人一談中國的精神文明，就免不了想到莊子秋水裏的河伯。他老先生因為「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幸而他「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得到「東面而視，不見水端」的經驗，才「生了『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的感想。要是他像中國目下的老先生——也不限於老先生——們一樣，抱了幾篇古聖先王的教訓，沾沾自喜，他們怎樣會覺悟到「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呢？

我們不如人家的東西多着呢，就是講精神文明的話。在道德方面，我們已經說過了。現在又加了三月十八的一個新證據。在智識方面，我們的工藝，科學不如人，政，法，哲學不如人，也已經說過了。現在再進一步，我們可以說就是我們的藝術，文學——音樂簡直談不到——也不見得有什麼「足多」的「優異」。

文藝是保守國粹者的末一道戰壕。他們就種種方面都失敗了，認了輸，可是打殺他們也得說我們的文藝比人家高。十幾年前我認識一位國學大家。他雖然不懂得蟹行文字，也曾經跟了什麼大臣出過洋。他說他走遍了地球，像二十四史那樣的傑作却不會見到。新近我也居然賣掉了幾十本洋書，買了一部價廉物不美的二十四史。我翻看了幾天，實在想不起有什麼超絕一世的特點來。講精確可靠罷，歐洲許多史書都遠在它的上面；講容量的繁多罷，就是英國的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一部書已經不會比它少；講時代的高古，文章的雄奇罷——像史記那樣的文筆，自然誰都得低頭拜倒——歐洲也有它的 *Pindar's Lives*。可是我們舉一種歐洲文學的特產，那偉大的史詩 *Epic*，如 *Homer's I Iiad* 和 *Olyseey*；*Virgil's Aeneid*；德國的 Nibelungen Lied；*Milton's Paradise Lost*；我們拿什麼來比擬？我們恐怕也只得某留學生，

舉些「木蘭歌」等來塞責了！

比較兩種極不相同的文藝系統是徒勞無功的事。我們不承認中國的文藝超過一切的文藝，可是也不願意說歐洲的文藝勝過中國的文藝。秋水篇的比喻，這裏可以稍稍變動些。這裏河伯順流而東行，不是到了北海，却遇着了另一股大水。這兩股水匯合在一處，就成了浩浩的江流。文藝的流行是永久不息的，可是以前各河流都從發源地流出，各自經過了種種不同的清幽美妙，繁華綺麗的境地，一路遇到了許多其餘的河流，越集越多，越合越大，成了洋洋乎大觀了。在百餘年前，哥德，希勒，看見各國的文學都互相發生和受着影響，各國大文豪的作品都不止受本國讀者的馨香摩拜，就提倡過世界文學。從此以後，世界文學的趨勢，一天明顯一天。可是歐美人所說的世界文學，不過是歐美一系的河流。東方一系，印度一系的文學，他們沒有

算在裏面。不用說，一定得等這幾條大河匯合在一處，才有真正的世界文學。

這樣的趨勢已經在發端了。中國詩在英美德法，深受一般讀者！尤其是文士們——的歡迎。有些批評家說它是天幕上新發見的一顆明恍惚的星辰，將來一定會成西方詩人的新的「烟土披里純」實在，中國詩在西方新詩人的作品中，好像中國日本畫在西方新畫家的畫布上一樣，已經留下些不可捉摸的痕跡了。歐洲文學的影響中國的新文學，更是顯而易見的事，雖然大都還是皮毛的，膚淺的。我們希望有志文學的人，多多飲些歐洲文學源泉裏的清醇的甘露，再期進一步，以至百步，千步的深造。

小畑的小戲

局中人做的事，有些是局外人不能了解的。現在北京三面被圍，我們住在城中的人，早晨不知晚上怎樣，晚上又不知早晨怎樣，住在遠方的親友，想到了我們，不知怎樣的提心吊膽了。可是我們過的還不是平常的生活？我非但照常的讀書做事，昨天還去看了在舞台上表現的一齣日本的狂言（小戲園社在平安電影）。在被圍的中國北京城中，看美國人演的，英文改編的，日本的狂言，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這一齣狂言「偷瓜賊」『The Melon Thief』是由小畑薰良先生改編爲英文的。小畑先生曾經選譯許多李太白的詩成英文，成績非常的好！關於這本英譯的李白詩集，改天再說。「偷瓜賊」的譯文，玲瓏流暢，疾徐得宜。據小畑先生自己說，他的譯文不能保存那原文的古色

古香，和本地風光的幽默。這我們當然不知道，可是他的韻文之妙，在能使觀者在情節，意思之外，覺到一種寓在文字及押韻裏的滑稽，實在是極大的成功。聽說這一個短戲曾經在美國公演過許多次。新近小畑先生到了北京，北京西人組織的小戲園社也請他自己導演。飾田主及偷瓜賊的是 Lucius O. Porter 和 Willy's R. Peck 兩位，表情和道白都很好。從開幕直到閉幕觀衆的笑聲簡直沒有停止過。

昨晚表演的總共有三齣戲。第三齣是北京外僑 Ruth Robertson 女士編的獨幕劇 *Novellette*，也由她自己導演。這是一個 *Sentimental* 的小品，劇辭有時倒也娓娓可聽。第一齣是 St. John Hankin 的獨幕劇 *The Constant Lover* 可惜兩個演員還不會學會怎樣的說話。

飛機炸彈聲中的感想

上星期我們正在說嘴，我們雖然住在三面被困的北京城中，過的還是平常的生活。話還沒有說完，北京城裏的居民就得到了些極不平常的經驗。

星期五的早晨我有事到西城去。正在要回家的時候，猛聽得一聲爆裂，抬頭看時，只見遠處一個飛機慢慢地在航行。我想，莫非奉聯的飛機來擲炸彈了麼？可是，一回兒飛機不見了，我也忘懷了。直到看了晚報才知道西直門外擲下了幾個炸彈，炸死了一個窮苦的老婦人。

第二天早晨，我坐在晒滿了太陽光的小院中看報，隱約地聽見遠處突突之聲。窺望了一回，果然看見一隻飛機，從東飛來，漸飛漸

近，我看到我頭上了，我怎樣的希望它那時不要放彈呵！好了，它過去了！可是沒有多少路，它又在迴身了！又在向我這裏來了！接着就是三個炸裂聲，中間一聲特別的宏大。幸而它又漸漸的遠去了。事後知道，那三個炸彈，一個落在圍城牆邊，第二個落在北海漪瀾堂前的湖中，離我的地方只不過幾十丈。

從此以後，直到寫這段文字的時候，奉聯飛機又來了兩次，丟了十幾個炸彈，雖然，邀天之幸，還只炸死了一個人。可是，北京人民很恐慌並不因之減少。因為，每天清晨起來時，誰能說定他能吃到這天的早飯？每天午時，誰能不嘆一口氣，慶幸自己又活着了一天？

被炸與中彩是差不多的心理。明明知道買彩票有幾萬，幾十萬人，自己不過是幾萬，幾十萬之一，所以自己的機會也不過幾萬幾十萬份之一，可是，同時你又會問，安知那幾萬，幾十萬中的一個數率

者不就是你？現在大多數民衆的恐懼，也就害怕自己就是幾百萬份之一的犧牲者，所以每一次飛艇正在我頭上翱翔的時候，我就免不了羨慕那些安居在東交民巷的政客，富人，和革命猛進者及民衆的首領。我悔恨沒有去領那有些住在東交民巷的人說我有資格支領的津貼。只要我領到了他們所說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我也可以在東交民巷租一間半間房子，立在窗戶口熱鬧了。究竟失節事小，打死事大啊！

這連日的飛艇擲彈，自然又引起了我的歐戰時經驗的回憶。我自從一九一七年初到了倫敦，直到了歐戰終止，所有的德國飛艇襲擊，不會失落過一次。第一次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因為那時有一年半載德國沒有用飛艇攻倫敦了。一天上午，我正立在倫敦市政廳旁的一個舊書店前翻看舊書，忽然聽見附近一個天翻地覆的巨聲。我腳下的

地，兩旁堅韌牆垣的房屋都在搖動着。許多老鴉都從市政廳的簷下飛出，十分驚慌地在空中徘徊飛舞。所有的人都到窗口來窺看了。向天空看時，好幾個飛艇正在頭上的附近。當然這都是幾秒鐘內的觀察，因為這時第二個巨聲又跟着來了。我前面正是地道車的站口。街上的人都往站口裏跑，我也跟着下去了。倫敦的地道車有好多丈深，炸彈是萬不能達到的。事後調查——英國報紙是不准登載炸彈下落的地點的，因為恐怕敵人從此有了標準，以後容易找到他們要攻擊的目標——知道一彈落處，只離我立的地點幾條街。

過了不多幾天，一個清晨我立在克拉本草地上散步，忽然聽見許多砲聲及炸彈聲。遠處只看一隊飛機，約有二三十隻，像一羣鴻雁似的在城中心頂上翔着。我此時正在草地的中心，離四面人家都很遠，只得立在一枝樹下，做強迫的觀熱鬧者了。

大約因爲白天的冒險太大，也不容易衝過防線到倫敦，以後的襲擊都在晚上舉行了。有一次我正在電車中，忽然得了敵機來襲的消息，電車停止了，電燈都滅了。大家在黑暗的街車中默坐一點多鐘，真是難受的滋味。

兩年之間，德國飛艇不知來了多少次。自然晚間比白天尤其可怕，因爲在白天，你可以看到飛艇的方向，不在你頭上時你究竟可以寬些心。晚上就不然了；大家都滅了燈，座在黑暗中，四面只聽見嗡嗡的聲音，也不知是炸彈還是高射砲。在敵艇已去的號令未發之前，你不能有一刻的安心。因爲敵機也許那時正在你的頂上，一秒鐘後就能取去你的生命。

德國飛艇有時一星期連來四五次，有時數月來一次。來的時候老是在陰歷的月終月初，因爲那時沒有月光。所以月半漸漸的到了，倫

「敵人一天一天的寬心了，過了月半，又一天一天的擔憂了。」今夜天黑人盡望，不知炸彈落誰家」，這兩句打油詩，可以表示當時的心理。

我那時已經想到，要是中國有一天同外國人打仗，這樣的驚恐是有加無減的。不想外國人還沒有顯他們的手段，中國人自己已經在首都裏耀武揚威把人命當兒戲了。德國人同英國人是仇敵，德人擲彈，據他自己說，總選擇軍事重要的目標，可是因為常常誤殺傷平常居民之故，還引起全世界人的公憤。現在奉聯飛機擲彈的目標是什麼呢？大部分燬壞的是平民居室，偶然有一兩個炸彈，投在重要建築物附近，那重要的建築物却是中國文獻的精華如故宮博物院內的文淵閣。足見他們的目標是與軍事無關的。因此我們對於奉機的用意，實在覺有高深莫測之嘆。今天讀了張作霖的電報，我們才恍然大悟了。「惟諸君倘有慈惕之懷，應商同彼軍，速即退出京畿，俾免生靈塗炭也。」

原來這完全是一種恐怖政策。你們北京城中的居民不能力脅或哀求國軍退出京畿，那麼你們不能怨他天天來擲彈！我們精神文明的中國，往時打仗，圍攻的軍隊往往宣言，如不即投降，城破之後，玉石俱焚。現在「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結果，不必等城破，玉石已經可以俱焚了。誰說中國沒有進步？唉，這就是中國的軍閥！這也就是東方的精神文明。

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上）

全世界每年出版的書籍總共有多少？它們平均的壽命有多少年，多少月，還有多少天？它們裏面有百分之幾，千分之幾，還是萬分之幾，幾夠得上永垂不朽的希望？這些問題都是很有趣味的，雖然不容易答覆。

國際聯盟預備供給我們一部分的答案。他們想每年發表一個書單，列舉一年來全世界出版的四百種鉅著和傑作。這當然不過是一種淺陋的嘗試罷了。全世界每年斷不會有四百種傑作。一年四百，一世紀不是四萬了麼？然而在當時，全世界出版的書，每年總得在十萬部以上，四百又非常之少了。並且出版的時期太近了，作品沒有受時間的淘汰，選擇恐怕不大會得當。然而，就因為如此，我覺得這種試驗是很

有意思的。你想，一個人在五十年，或百年後，那時黃澄澄的金粉已經從粗砂石中淘出來了，再看一看五十年或百年前的所謂傑作，不是頂有意思的嗎？

好像中國，在這一箇計畫裏，也被認為三等國了！那就是說，每年出版的新書在二千至二千五百部之間。以文化優異自命的中國人也許要勃然而怒了。我們因為物質文明不發達，所以財富兵力不及人，以至不能列入頭等國，猶可說也是我們的文化，怎樣能受這樣的屈辱呢？我却覺得這三等國的頭銜，我們已經受之有愧了。我們每年出版的新書，何嘗有過二千呢？至於每年出版的書籍，可以列入世界作家之林的，可以數完一隻手的 fingers 麼？

我因此想起，我們自從有了所謂新文化運動以來，在思想文藝上有了多大的供獻？一個外國的文人學者來調查我們的成績時，我們能夠

指出幾架書，抱出幾堆書，還是輕輕的舉起幾本書來，很自負的讓他去研究？我不知道別人怎樣的回答，我自己大約只能輕輕的舉起幾本書來，用不着面紅。要是他像國際聯盟那樣，限定了數目，要我舉起名字來，那麼我的十部書大約是左列的幾種了。

第一部我要舉的是胡適文存。胡先生是新文藝，新思想的先鋒，他的書是萬不可少的。他的那一部書可得要斟酌一下了。我不舉嘗試集是因為我不信胡先生是天生的詩人，雖然他有些小詩極可愛。我們只要看他說的：「文中有三個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和「美就是「懂得性」（明白）與「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來自然發生的結果」，就可以知道他的詩不能成家的緣故，同時也可以了解他的說理考據文字的特長了。我不舉中國文學史大綱是因為這種開經覓路的著作，雖然力量驚人，早晚免不了做

後起之秀的階級。胡適文存却不但有許多提倡新文學的文字，將來在中國文學史裏永遠有一個地位，他的水滸傳攷證，紅樓夢攷證也實在是絕無僅有的著述。胡先生在新近給我的一封信裏說起：他善於活用古史的話「什麼史料，到我眼裏，到我手裏，都是活的」，這話實在非常這確切。

在思想方面，吳稚暉老先生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是當然有一位置的。無論你贊成或反對，他的那「漆黑一團」的宇宙觀和「人欲橫流」的人生觀斷不肯輕輕的放你過去。他那大膽的精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氣概，滑稽而又莊嚴的態度，都是他個人獨有的。他的思想進展的線索，我們可以在他的其餘的論文和通訊裏看察到。可惜現在流行的吳稚暉學術論著和吳稚暉先生文存都不能給我們多大的幫助。他曾經答應亞東書局，自己編選一部有系統的論學

文存，可是恐怕它出版時，我們的望眼也穿了。（吳先生是我二十年來最欽佩的一個人，可是他並不是我的娘舅，我也從不曾有過娘舅。有些人——如用他們的話，應當說，有些東西——以為無論什麼荒唐的流言，只要他們重複說的次數多，就會成事實的。你偶然指出一件來，他們還得問，你爲什麼早先不聲明！好像他們一天到晚造了謠還不夠，還得你代他們負責似的！）

在學術方面，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的價值是不容易推崇過分的。他用了無畏的精神，懷疑的態度，科學的方法去整理一篇幾千年來的糊塗賬，不多幾年已經開闢了一條新路，尋到了許多大漏洞。這本書現在還正在印刷中，因爲一部分早就在努力上發表過，所以舉列在此了。顧先生因爲事務太忙，不能把所有的材料整理一番，重新寫過一遍，是我們引爲遺憾的事，可是就說他那一篇十萬字的序文——也許自

有序文以來，從不曾有過這樣長的吧！敘述他求學的經過，治學的方法，和懷疑古史的由來，已經是極有價值的供獻了。

十年以來——從民國六年一月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起，直到現在，不是已經十年了嗎？新文學的作品，要算短篇小說的出產頂多，也要算它的成績頂好了。我要舉的代表作品是郁達夫先生的沉淪，和魯迅先生的吶喊。郁先生的作品，嚴格的說起來，簡直是生活的片斷，並沒有多少短篇小說的格式。裏面的主人，大都是一個放浪的，牢騷的，富於感情的，常常是墜落的青年。一篇文字開始時，我們往往不知道爲什麼那時才開始，收來時，也不知道爲什麼到那時就結束，因爲在開始以先，在結束以後，我們知道還是有許多同樣的情調，只要作者繼續的寫下去，幾乎可以永遠不絕的。所以有一次他把一篇沒有寫完的文章發表了，讀書也不感缺少。有時他有意的想寫一

個有力的結束，好像沉淪那一篇，我們反感覺非常的不自然。他的小說雖然未免因此有些單調，可是他的力量也就在這裏。他的小說裏的主人翁可以說是現代的青年的一個代表，同時又是一個自有他生命的個性極強的青年。我們誰都認識他。魯迅先生描寫他回憶中的故鄉的人民風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可是孔乙己，風波，故鄉裏面的鄉下人，雖然口吻舉止，惟妙惟肖，還是一種外表的觀察，皮毛的描寫。我們記憶中的鄉下人，許多就是那樣的，雖然我們沒有那本領寫下來。到了阿Q正傳就大不相同了。阿Q不僅是一個type，而且是一個活潑的人。他是與李逵，魯智深，劉老老同樣生動，同樣有趣的人物，將來大約會同樣的不朽的。（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贊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

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下）

青年人不做詩的麼？要是有的，我想也不會比鳳毛麟角容易找。難怪我們常聽見人說，新詩多的像雨後的春筍。雖然這個比喻有些不切當。與其說新詩像雨後的春筍，不如說新詩人像雨後的秋蛙吧。

要是你的耳朵像我一樣，不懂得音樂，聽了秋蛙歌唱是不容易辨別它們各自特殊的音調的。可是它們歌唱得多麼高興，又多麼自然！它們在有一時期是不得不唱的！那就是說，有一個時期它們是詩人。青年人也誰都有一個詩人的時期。這大約古今中外都沒多大的分別。不過古今中外，大約很少有我們現在這樣發表的方便。

這也許可以部分的解釋新詩雖多，滿意的供獻却不多的道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新詩的模型，聲調，修辭，造句，都得重新草創，

它的困難比別種作品大得多。

我想起的兩種新詩代表作品是郭沫若先生的女神，和徐志摩先生的志摩的詩。女神很早就出版，志摩的詩去年秋才印成單行本，放在一塊幾乎就可以包括了新詩的變遷。並且它們的作者都是詩人，而且都很有才氣。郭沫若先生有的是雄大的氣魄。他能在新詩初創時，排開了舊式辭章的束縛！雖然他對於舊詩詞，好像很有研究的——自己創造一種新的語句，而且聲調很和諧。可是他那時的力量還不足，因此常常像一座空曠的花園，只有面積，沒有亭台池沼的點綴。他許多詩的單調的結構，句的重複，行的重複，章的重複，在後面又沒有石破天驚的收束，都可以表示郭先生的氣魄與力量不相稱。我們希望，並且相信，郭先生會有力支撐得起他氣魄的一天。他在他的文藝論集的序文裏說他的思想，生活，作風，「在最近一兩年之內可以說是完全變

了」。我們措措眼睛，看他將來的作品吧。

女神裏的詩幾乎全是自由詩，很少體製的嘗試。志摩的詩幾乎全是體製的輸入和試驗。經他試驗過有散文詩，自由詩，無韻體詩，駢句韻體詩，奇偶韻體詩，章韻體詩。雖然一時還不能說到它們的成功與失敗，它們至少開闢了幾條新路。可是徐先生的供獻不僅僅在此，他的最大的供獻在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是受了很深的歐化的，然而它不是我們平常所謂歐化的文字。他的文字是把中國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個洪爐裏，鍊成的一種特殊的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它有時也許生硬，有時也許不自然，可是沒有時候不流暢，沒有時候不達意，沒有時候不表示它是徐志摩獨有的文字。再加上很豐富的意像，與他的華麗的字句極相稱，免了這種文字最易發生的華而不實的大毛病。可是徐先生雖然用功體製的試驗，他的藝術的毛病却在太沒有約

東。在文字方面，有時不免堆砌得太過，甚至叫讀者感覺到煩膩，在音調方面，也沒有下研究的工夫。因為他喜歡多用實字，雙雙的疊字，仄聲的字，少用虛字，平聲的字，他的詩的音調多近鞞鼓鐃鈸，很少提琴洞簫等抑揚纏纏的風趣。他的平民風格的詩，尤其是土白詩，音節就很悅耳，正因為在那些詩裏地不能不避去上面所說的毛病。

戲劇方面的成績就不大高明了。一般的劇本，恐怕還比不上文明戲，因為文明戲裏的人物雖然同樣的荒唐，言語同樣的無味，可是它們的情節至少比較的興奮些。西林先生的一隻馬蜂等幾種獨幕劇，是一個極大的例外。這些獨幕劇的結構非常的經濟，裏面幾乎沒有一句是廢話，一個字是廢字，它們的對白也非常的流利和俏皮。這許多是誰都承認的。可是許多人就只承認這許多。他們不知道劇中人專說俏皮話，是因為他們不能說別樣的話。他們不是些木偶，作者借他們

的嘴來說些漂亮話。他們都有生命，都有思想，只是他們的思想與平常中國人不一樣。他們是一種理想世界中的人，可是他們在理想世界，比我們在這實現的世界中還生動，還靈活些。也許他們是幾百幾千年後進化的中國人。他們的理智比我們強，他們的情感也多了幾百幾千理智的薰陶，成了一種——要是這樣的一個名字——理智的情感。西林先生的長處在這裏，短處也就在這裏。

要是沒有揚辰聲先生的玉君，我們簡直可以說沒有長篇小說。可是玉君並不在這裏備一格充數的。你儘可以說它的結構有毛病，情節有時像電影。你儘可以說，他的文字雖然流麗，總脫不了舊詞章舊小說的氣味。甚至於你儘可以說，它的名字的主人，玉君，始終沒有清清楚楚的露出她的面目來。可是只要有了那可愛的小女孩菱君，玉君已經不愧為一本有價值的創作了，何況它的真正的主人，林一存，是

中國小說中從來不曾有過的人物。他是一個哲學家，可是並不是言語如木屑似的哲學家，他是一個書獃子，可是多麼可愛的一個書獃子！他對朋友的義氣，對女子的溫柔，對強暴的反抗，對弱小者的同情，以及種種——例如喜歡同無論什麼人發議論的——癖性，都使他成一個叫人忘不了的人物。要是他生在法國，再多活三十年，也許成了像法郎士的 *Sylvestre Bonnard* 一流人。可是林一存是少年的中國人，而且就是林一存。

現在要說到兩位女作家了。一位是幾乎誰都知道的冰心女士，一位是幾乎誰都不知道白薇女士。冰心女士是一個詩人，可是她已出版的兩本小詩裏，却沒有多少晶瑩的寶石。在她的小說裏，到常常有優美的散文詩。所以我還是選她的小說集超人，超人裏大部分的小說，一望而知是一個沒有出過學校門的聰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節都離

實際太遠了。可是裏面有兩篇描寫兒童的作品却非常好。

白薇女士的名字在兩月前我們也從沒聽見過。一天有一個朋友送來她的一本詩劇「麗琳」（商務），我們忽然發見新文壇的一個明星。她是與冰心女士很不相同的。除了母親和海，冰心女士好像表示世界就沒有愛了。麗琳二百幾十頁，却從頭至尾就是說的男女的愛。它的結構也許太離奇，情節也許太複雜，文字也許有些毛病，可是這二百幾十頁藏着多大的力量！一個心的呼聲，在戀愛的痛苦中的心的聲呼，從第一直喊到喊末一頁，並不重複，並不疲乏，那是多大的力量！

本來說十本書的，現在一寫就成了十一本。好在我並不是受什麼試驗，就讓它去吧。

中國新出有價值的書雖少，當然不止十一本。可是我不願意也不

能做一個詳細的測量。我不願意，因為這樣的工作太苦了。我不能因為我本來不是批評家，何況幾乎不看新出的書。這到得申明的，我不看新書，並不是因為我不高興看；也不是全因為沒有時候去看；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沒有錢去買來看。這一年來，我把以前定的幾份外國雜誌都停止了，所以已經八九個月沒有看外國報，那裏還有錢買中國的新書。（好像有人說我有一篇什麼文章，是抄襲外國雜誌的某作家的。我聽了覺得非常的慚愧，因為我非但沒有看見那篇文章，並且沒有所見過那位作家的名字。可是我覺得我應當看見這些文章的！錢實爲之，謂之何哉！）

我對於中國新文藝的前途，還是懷着很大的希望。我相信，這希望不至於落空的。據Jastrow的統計，四十七歲至四十八歲是著作家出產最偉大的傑作的年齡。這話我們固然不用相信，可是我們的新作家，無論

我已經說到的或沒有說着的，除了極少數的幾個人外，大都是三十左右的。他們每年總得有二三十年的創作成著述在前面。何況他們後面，已經來了一羣更年輕的人。這是留心有幾個刊物的人，少不得能夠覺察的。

貧民與節育問題

上一期本刊通信欄裏有一篇討論中國人口問題的文字。作者羅先生說：「我們中國的人口，今日還不見多，地有荒墟之感，似還有增添人口之必要。」這話能夠代表一般人的觀念麼？陳惺農先生在中國人口內總數一文裏（社會科學季刊第三卷第四號）說，「請問到過日德二國並且到日各地鄉間去過的人，若把日德二國鄉間人口狀況，和安徽廣東湖南的鄉村狀況比較比較，到底如何。我自己感覺並且我問了許多朋友，他們也感覺得這幾省人口外德日二國，表現得格外繁密。」陳先生又說：「中國廿一省（我走了十五省）人口無論如何，平均總可以和德日人口密度相等。」日本和德國人民的經濟狀況，比我們好了多少倍，他們還有人滿之患，我們到反能「有增添人口之必

要麼？在我看來，無論中國人口比德日繁密，或不如德日繁密，無論中國人民的總數有五四七百萬（陳惺農先生統計），或四三六百萬（一九二三年郵局調查），還是美國人羅克希爾（Rockhill）把一九〇年民政部調查的材料，加以整理後所決定的三二五百萬，我們非但沒有增添人口的必要，并且就減少了一半也不要緊。其實像中國現在的一般人民，就佈滿了全世界，也於世界文明或人類前途有什麼好處呢？

我在北京住了有三年。我那條小胡同裏沒有幾個大門，却有無數的小孩。住戶大約大都是破落戶的旗人吧。胡同裏的女人，都有一種大可怪的毛病；他們的腹部一天一天的高了，過了幾個月，忽然平復了，不久，這舊病又發了。一年之中，總有一二次婚嫁的事。娶來的新人自然又在這循環的圈套裏討生活。死喪的事可就多了。在晚上讀書或作文的時候，常常有一種單調的鼓樂，打斷孤燈前的思索。爲了

這種聲音，夜裏也常常睡不着。一個人在枕上轉側的時候，心中想，不知誰家又死了什麼人了。回想在英國一條街上住了也有三四年，可是喪事只記得有過一次，喜事也不過一次或兩次。

中國人生得快，也死得快。在生死之間，那半生半死，不生不死的日子却過的不很快。胡同裏的小孩，誰都面黃身小，骨瘦如柴，一點沒有活潑的氣象。大多數面上身上都有些瘡疤疔癩；許多還露出大頭，眇視，歪嘴，缺鼻等殘廢的形狀。一到了九歲十歲，便不常看見了。大約已經都在外謀生活了吧！可是，怎樣的生活呢？他們還不算北京的貧民。

朋友某君家裏的老媽子有兩個兒子，大的十六七歲了，小的只有十二三歲，而且身材很矮小。一天大兒子去告訴娘，說要當兵去了。小的兒子也要去。他們的娘問計於某君。某君說十二三歲的小孩千萬

不可去當兵。可是兒子說：「要是不當兵，就得去拉車；拉車太苦，還不如去當兵。」結果他還是去了。十二三歲的小孩去當兵，也許就得赴前敵，這在文明國人聽了，是何等的野蠻，何等的不人道！可是你試留意過往的軍隊，十二三歲，連槍都舉不起的小兵，多的是。在他們看來還覺得很微幸，因為「拉車太苦，還不如當兵」呵！可是拉車的也就不少了。據李景漢先生的調查，這種「營養未足，筋骨未強的幼童：自十二至十七歲的小洋車夫佔總數百分之五」（本刊第六十二期），那就是說，北京一地，小洋車夫已經有二千七百人了。

「去冬報載北京內外貧民的數目竟有二十三萬九千二百六十八人！」（本刊六十八期九頁）李景漢先生說，他在極冷天的早晨經過粥廠，常看見有幾千人等着討碗粥吃。就是我剛才在外面回家，看見一個拉土車的把煤渣垃圾倒在空地上時，十三四個白髮老人，中年的

婦女，七八歲以上的女孩搶着在裏面找不知什麼可用的東西。

我不知道乞丐是不是算貧民，還是又比貧民低一級。北京的乞丐比西湖已經少得多，可也就可觀了。女乞丐們，好像想分潤庚款的人掛一個大學招牌似的，常常手中抱一個僅有生氣的小孩。她們哀求着，救救小孩吧。我雖然遇到白髮蓬鬆的老乞丐有時也肯出一兩個銅子，可是從不會給那抱着小孩的女乞丐們一個錢。不是不肯給，實在是不忍給！那些小孩這時還沒有懂人事，現在死了，倒是他們最大的幸福。要是他們不幸而活了，因為營養太壞，環境太惡的結果，也不過成了些半殘廢的低能兒。強悍的男子流為盜賊，安分的依舊叫化乞食，或升做了不大中用的洋車夫。而且他們將來也許又得添無數同樣的低能兒。

羅先生說「兒子子本是人類的天職。」這就中國人盡了天職的

結果。要是盡了天職是如此的，還不如不盡吧。無論如何，一個身心強健的人，我覺得，至少抵得過十個，甚而至於一百個不死不活，毫無用處的低能者。要是低能者生長繁殖，佈滿了世界，我想也不過臭蟲似的，給別人同樣的厭惡罷了。

羅先生有一句話，我是同意的，他說馬爾塞斯的學說，與桑格夫人的手術，不應當「不三不四地流行於中國。」不過羅先生反對的是「流行」，我反對的是「不三不四。」我以爲在這樣的中國，「不三不四地」提倡節制生育是不會發生反響的。誠如羅先生所說：「大多數無產的貧民，既不會有錢讀了書去看節制生育問題，又那里有功夫去研究那些避孕方法。所以貧民愈應節育以減輕負荷愈是不能夠。」所以政府或社會上的組織應當給他們智識上上的灌輸，和方法上的幫助。實在說來，簡直得有法律的限止。一個人窮了，便不能戀愛，結

婚（歐洲中古就幾乎如此）那自然未免太殘忍了。可是一個人窮了便不能生育幾個以上的子女他個人和社會都得了極大的益處。

應當節育的，當然不止是貧民。這話得下回再說了。

節育問題

我們上一次說過貧民有節育的必要。可是應當節育的，不單單是貧民。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尤其有節育的必要。他們不僅得與貧民同時節育，並且在貧民沒有覺到必要，或得到方法的先前，他們就得想法去實行。這話，我知道，一定有人反對的。不但一般盲目的人口增加論者會反對，就是一般優生論者也會不贊成。

在優生論者看來，單單智識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實行節育，一般無智識的貧民依舊的生殖繁衍，結果少不了優良者一天一天的減少，劣種一天一天的加多，民族也就不滅而自滅。

資產階級不用說了。我們實在不信他們就是優良的人種。擁兵十萬的軍閥，與他後營裏的一個小兵，我們疑心，也許有的是同樣的頭

腦。騎在汽車裏肥頭胖耳的大漢，他的聰明也許還趕不上坐在前面，手敏目捷的車夫。至於一般面團團的富家翁，除了面團團之外，常常叫人找不出他們別的特殊之點來。

智識階級也不一定就生優良的種子。爲什麼天才的兒子不一定是天才，美人的母親不一定是美人？這種問題，還沒有遺傳學者能夠給我們圓滿的解答。蕭伯納是超絕一世的奇才，他的尊容可實在有些怪。有一次，一個法國有名的美人給他一封信。她說，他是世上頂聰明的男子，她是法國頂麗的女人，要是他們結了婚，一定可以造出蕭氏所希望的超人來。蕭伯納的回信也就妙得很。他說：要是這種結合的子嗣遺傳了他的面容，她的頭腦，不是糟了嗎，還不如謝謝吧。

天才當然是例外。至於一般人，我們相信，他們得自先天的遺傳，一定敵不過後天的滋養和教育。要是同樣的兩個平常的兒童，一

個自小就飽食暖衣，少染疾病，環境良善，教育得法，一個衣不蔽體，食不得飽，常有病痛，調養無方，環境既然不佳，教育又時時因貧病中輟，他們成人之後，自然一個身心康健，進可以爲學術，事業界作些供獻，退也少不了是社會上有用的公民，另一個的前途就可怕得很了。

要是一個人只有教養一兩個子女的能力，却生了五六個以至七八個，他自然不得不效法儒林外史裏的老和尚。老和尚受了郭孝子兩個梨，叫水夫挑滿了兩缸水，把梨搗碎了，擊雲板傳齊了二百多僧衆，一人喝一碗水。誰看了這樣事，都得會像郭孝子點頭歎息。可是也許有人同意吧，我寧願有幾個人嘗一嘗梨味兒，不情願自己喝那碗淡而無味的水。兒子女兒的教養更不比兩個梨。兩個子女可以吃飽穿暖的，五六個也許就免不了飽一餐餓一餐，兩個子女一個母親照顧得過

來，五六個也許就免不了照應不周到，兩個子女可以受高等教育的，五六個也許就免不了連普通教育都受不全。這樣，如果只有子女二人，他們就成全了二個健全有用的國民，要是有了五六個，他們對於國家的供獻反而低落了。

我們還要記得，我們不應當只想著國家，忘記了個人，只想著子女，忘記了自己。生兒子也許是人類的天職，國民的義務。可是，生兒子斷不能是人類唯一的天職，國民唯一的義務。在我看來，我們還不能說這是人類最大的天職，國民最大的義務。要是一個文藝或科學，藝術或音樂的天才，他愛好的是他的學問或藝術。他完全不懂得家人生產。你如讓他獻身給他所信仰的事業，他也許能給世界一點永不磨滅的禮物，你如強他成家立業，生男育女，他的靈威，也許就會埋葬在油鹽柴米的煩惱賬裏了。

不錯，我們還得說，天才應當是例外。可是一般人生活在世上，至少也得問一問生命的意義。要是人生還有意義，他們當然不單單是生殖的機器。要是人生沒有意義，他們又何必多造些毫無意義的機器？一個待人刻薄自己也一錢不化的守財奴，大家都會笑他「何苦爲兒孫作牛馬。」一個生育了許多子女的人，爲了子女要衣穿，自己不得不穿破衣，爲了子女要飯吃，自己不得不捱餓或吃粗糲，爲了子女要教育費，自己不得不一早到晚，一年到底，不息的工作，大家非但不笑他，還說他福氣大！可是福氣愈大，精神的痛苦也常常愈深，甚至於發瘋的也有，墮落的也有，而甚至於自殺的也有。究竟一個人何苦有這樣的好福氣？

與其有這樣的福氣，我以爲還不如「瀟於性交跳舞的淫樂」吧。其實，說法國人「男男女女，都圖自己夫妻的快樂，生怕生了一個兒子，

會妨害他倆跳舞和性交的自由」未免言之過甚了；同樣，「跳來跳去舞了若干時候，世界的舞台上，就要絕了你的足跡」也未免是過慮。一個社會學家說，女子可以分爲兩類，一是母性，一是娼婦性。母性的女子，我想他也肯承認，一定佔大多數吧。要是她們的經濟容許她們生育子女，無論怎樣的愛好跳舞，她們也至少想有一兩個小孩。至於母性不強的女，強她們爲許多小孩的母親，她們的痛苦還是小事，她們的子女可真太可憐了。在她們自己，她們就有了子女，還不是鎮天的應酬遊玩，鎮夜的打牌跳舞？可是她們的子女却永不享着母親的照拂和慈愛，甚至於蓬首垢面，破衣百結也沒有人管。

自然有人要說了，一個人的收入不是固定的；他的收入常常看他的需要而轉移的。需要多了，一個人便不得不想法擴大他的生產力；他的收入也就增加了。這話固然不錯，可是只能應用在各種事業已經

上軌道的文明國吧。我們的小百姓永遠生活在戰禍的黑影裏，他們要安身立命還不能夠，那裏還講得到收入。在這樣情形之下。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沒法可想，何況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軍閥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許多人唯一的路徑。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們往往主張反抗帝國主義，但是一面却用帝國主義者的名義，做他們的護符；他們往往主張打倒軍閥，但是一面就靠軍閥吃飯；他們往往主張反宗教，但是一面求在教會學校擔任功課。難道他們真心願意，實在也出於不得已吧了。他們自己可以捱餓，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飯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金錢的人，也何嘗不是如此。要是說他們「宣傳赤化」，加以「死刑」豈不冤哉枉也？

「盡信醫不如無醫」

「盡信醫不如無醫，」也可以算是一句不易的定論。可是一般人對於醫生都有絕對的信仰——在他們發現了他們的謬誤的先前。等到他們發現了謬誤，也許已經太晚了。有了一次經驗，我們總以為他們應當有些覺悟了？誰知道不然。他們單單把對於甲醫生的信仰，移在乙醫生的身上。近年來，不信中醫的人漸漸的多了，可是他們又把對於中醫的信仰，移在西醫的身上。他們好像覺得外國醫生都是活神仙；他們的話斷不會錯的。去年孫中山先生病危。西醫說不能有救了，中醫說也許有萬一的希望，左右的人就決計改請了中醫。當時就有些人很不贊成；他們說這種態度太不科學了，這種迷信實在應當打破的。我們聽了都不免覺得他們自己倒有些不科學，因為他們不願意得到那

萬一的希望的試驗；他們自己脫不了迷信，因為他們以為西洋醫學已經是發達沒有錯誤的可能。我疑心就是西洋醫學也還在幼稚的時期，同中醫相比，也許只有百步和五十步的差異。

我新近又聽到一個例。病人是誰，本沒有關係，可是因為梁任公先生是盡人皆知的名人，提了姓名，說話也許添了更有分量的根據。並且我們可以相信，醫院遇到這樣的病人，一定只有加倍慎重，斷不至於犯敷衍塞責的毛病，那麼我們說的當然不會是偶然的一個例外。

梁先生患尿血症已經多年了。許多醫生都說不出病原來。上月他入協和醫院治療，經過了好幾個醫生的診視和推斷，他們都認定病在左腎。他們說他的左腎上有些腫物，要是不將左腎取去，腫物勢必日益膨漲，將來總得有割治的一日。所以開割是早晚難免的事實，雖然四五年內還不要緊，可是晚治總不如早治，至少早治可以免去有變成別

種病症的危險。他們的話說得很明白，所以雖然梁先生有些朋友勸他再到法國請名醫診視，他也沒有聽，決計就在協和施行手術了。腹部剖開之後，醫生們在左腎上並沒有發見腫物或何種毛病。你以為他們自己承認錯誤了麼？不然，他們也相信自己的推斷萬不會錯的，雖然事實給了他們一個相反的證明。他們還是把左腎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並沒有好。他們忽然又發見毛病在牙內了，因此一連拔去了七個牙。可是尿血症仍沒有好。他們又說毛病在飲食，又把病人一連餓了好幾天。是他的尿血症還是沒有好！醫生們於是說了，他們找不出原因來！他們又說了，這病是沒有什麼要緊的！爲了這沒有什麼要緊的病，割去了一個腰子，拔去了七個牙，餓得精疲力盡，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並且還得化好幾百塊錢！

在梁先生初進病院的時候，上海一位懂得中醫的朋友，寫信給

他，說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術的，只要飲什麼湯就會好。這話不但西醫們聽了好笑，就是我們也一點都不信。可是這中西不同的推斷究竟有多大的分別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誰能說什麼湯一定不能治愈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損失，也不至於會比丟掉一個腰子和七個牙再大吧？

我們聽了這一段新聞，少不了聯想起了莫理哀名劇 *Le Medecin*

Malgre Lui 裏面的主角 *Sganarelle*，他是一個劈柴的小工，經他老婆的作弄，被人誤認為醫生。他最初很是不願意，可是不久就決計終老於是了。他說：

「我覺得這是頂好的行業；因為：不論我們弄得好弄得糟，我們一樣的到得報酬。……一個鞋匠，在做一雙鞋，弄壞了一小片皮就得受損失，可是在我們的事業裏，我們弄壞了一個人也不

用出一個大。錯誤永遠不會放在我們身上的。總是那死去的人的過失。」

他說的多痛快！莫理哀這劇本寫了已經有二百五十年，歐美的醫學已經大有進步了，可是我們能說他這句話是說錯了，或是失掉了力量了麼？

也許有人說了，西醫同中醫雖然都是暗中摸索，胡亂瞎猜，可是中醫只知道墨守舊方，西醫却有了試驗的精神。可是我最懷疑的就是醫生的試驗的精神。醫學是介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自然科學的對象是物質。化學家儘可以做他們分析化驗的工作。就是植物學者也不妨做移花接木的試驗。可是社會科學的對象是人類。誰沒有父母，誰沒有夫妻子女，誰不感覺痛苦悲哀，我們怎能把我們同類做試驗品？「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也許是頂透徹

的政治學說。可是除了秦始皇那樣的暴君，誰也不肯，即使想到了，做那焚書坑儒的試驗。爲了同樣的原因，我雖然對於任何政治學說，學理上都能有相當的了解，在事實上，總是覺得任何極端主義的實行家，不論新舊，都是害多利少的。

以前的大醫學家也是非常仁愛的。巴斯德發明了他的——好像是治瘋狗咬傷，可是不敢說定了——的種痘劑，對於它的效用已經很能自信了，還是不敢試驗在人身上。一個婦人求他救她的兒子，因爲其餘的醫生已經束手了。他還是不敢輕易的一試。結果她那可憐的哀哭打動了他的心，他勉強的應允了。那一晚他在小孩的床邊，額上流汗，眼睛都不敢霎一霎。他那種「殺一無辜而得真理不爲也」的精神，現在是不大聽見了。近代的一般醫生，眼中只見病症，不見病人，醫院也成了一種冷酷無情的試驗室。

也許科學是冷酷無情的東西，也許來真理者不用有仁愛的動機在後面。那麼我們至少希望醫者在施行手術之先，聲明他做的是試驗。這樣，不願做試驗品的，也有了一個拒絕的機會。並且病人既然是試驗品，當然沒有再化錢的道理。平常醫生們割一個兔，一個田雞，都是化錢買，割人的時候，病人不但不化錢，還得收領些代價，也不見得說不過去吧？蕭伯納劇本 *The Doctor's Dilemma* 裏的無道德的藝術家 Louis Dubedat 患很重的肺病，一個醫生說只要割去了某處一塊骨就好了，他情願施行那手術。Dubedat 問道：「我讓你這樣做，你給我多少錢？」醫生覺得驚奇而發怒了，可是他的要求究竟是無理嗎？

又有人說了，近代的醫學雖然沒有成完美的科學，協和醫院實在還不足以做它的代表。協和的醫生，在美國，也許最多是二三流吧了。要是這話不假，那麼我們希望協和多請幾位第一流的醫生。在建

築和設備上，他們化了不知多少錢，却讓二三流的先生來糟蹋了，也未免有些可惜吧。我們對於協和，至少還有些希望。它究竟不像東交民巷內的幾個醫院，止是托病政客，不走運偉人，和避難富紳名流的棲息所啊。

西醫問題討論

剛纔接到協和醫學校陳志潛先生的一封信，對於我們上一期的話，加以質問。現在就把原信登錄在此吧。

西澄先生

先生近來在現代評論發表文章，總用「閒話」來標題。人最愛聽閒話，所以現代評論的讀者，總不能把「閒話」這一欄輕易放過。昨天拜讀指責協和醫院的大文，心裏似乎有點感觸。先生學識淵博，素來非常欽佩。先生因梁先生腰痛醫治不良而痛言中西醫學得失，對於協和加以誠懇的批評，我個人覺得先生是一個特別不滿意協和者，是一個懷疑西醫者，同時確是一個留心醫學進步者。先生有懷疑的地方，有不滿意的地方，能夠既不客氣又不辭

勞苦的痛痛快快說出來，這是先生給醫學者表白的機會，即或不能自解，也可引咎自勵。這是先生對於世界醫學在中國立足地位上，有莫大的幫助，可貴的供獻！但是事實上有兩三點，要請先生注意：

(一) 余巖君（上海西醫生深通中醫）說過：「大黃除實，當歸止痛，乃人類本能所發明之事實，猶之五穀療飢，湯水止渴，經驗也，非實驗也，所謂實驗者，就人類本能所發明之事實，益之以經驗之所得，用科學精密之法，以分析其錯綜繚亂之現象，繁者簡之，雜者純之，隱者顯之，以便觀察而免誤解，反覆審慎以稽覈事物之真相也，今舊醫之所襲用者，太古以來人類本能所發明之事實也，經驗也，其現象混淆不明，安可遂以爲自然界之真相，而據之以斷是非乎。」中醫本於經驗，西醫本於實驗，西

醫與中醫雖然不像科學與文學那樣差異，却是根本上兩者實無確切比較的可能，先生百步和五十步的說法，不知何所謂而云然？

（二）先生說：「醫學是介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這是不差。不過先生說「人誰無父母」一節，頗有「未能平心靜氣」的樣子。難道醫生就不是人身父母養的嗎？難道醫生就喪心病狂到先生所說那個純粹對象主義的地步了嗎？讓我說一句粗話，病人是醫生的飯碗，醫生為對象主義，連飯碗問題都置而不顧，我相信今日的醫生還莫有那樣的勇氣！近來許多醫生一味買合病人心理，委曲求全，無所不至，他們在社會科學方面，實在是過無不及，先生還感想到醫生忽略社會科學，先生意想中的社會學醫生，我實在不知道是甚麼一個樣兒？

醫與中醫雖然不像科學與文學那樣差異，却是根本上兩者實無確切比較的可能，先生百步和五十步的說法，不知何所謂而云然？

（二）先生說：「醫學是介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這是不差。不過先生說「人誰無父母」一節，頗有「未能平心靜氣」的樣子。難道醫生就不是人身父母養的嗎？難道醫生就喪心病狂到先生所說那個純粹對象主義的地步了嗎？讓我說一句粗話，病人是醫生的飯碗，醫生為對象主義，連飯碗問題都置而不顧，我相信今日的醫生還莫有那樣的勇氣！近來許多醫生一味買合病人心理，委曲求全，無所不至，他們在社會科學方面，實在是過無不及，先生還感想到醫生忽略社會科學，先生理想中的社會學醫生，我實在不知道是甚麼一個樣兒？

我覺得一方面先生有點「牛頭不對馬嘴」的架式，一方面先生忘却自己尊嚴的身分。先生在今日中國青年裏（我也是其中之一）負有鄉導的責任，先生們的一舉動，確實非可小比。先生以現代評論的作者來批評時事，固然絲毫不差，不過二十世紀裏，人人都有一「學問之道無窮，一人之精力有限」的感想，以局外人來批評局內事，往往有過甚其辭的地方。假設先生是診斷梁先生疾病的醫生，當時的措置，不知是怎樣？假設先生是一個近世醫生，對於這件事，不知又是如何的批評？設身處地，是讀歷史應具的態度，也是我們今日指責他人必具的地位。老實說，我就是一個迷信中醫者，但是自從這五年來，學了一點近世醫學，對於中醫的信仰，不知不覺的日漸消化了！我對於中醫很想約一般朋友下一個總攻擊，但是因為自己對於中醫，無充分的研究，所以只好「緘默無

言」(附註)梁任公醫治腰痛一節事實，我自己不十分明白，所以我說的話都是就先生說話動機，態度，功用上設想，并非要與先生，爭個「水落石出」。先生要想分個青紅皂白，最好向協和醫院辦事人直接交涉，因為我恐怕他們不常看現代評論，把先生的美意辜負了！我所說的話有不恰當的地方，望長者教正。先生的學問道德，我仍然欽佩如故。

陳志潛 五月十九午後三時

陳先生的態度，實在和氣到一萬分，可是像一切的專家，他免不了開普便攷一攷你有沒有說話的資格。這是各種專家普遍的毛病。徐志摩最近在晨報副刊寫了兩篇關於幼稚教育的文字，就有許多教育學者覺到「徐志摩對於教育是外行，」「怎麼他又談起幼稚教育來了」，免不了「就非常的奇怪。」我想要是一百幾十年前，盧廬出版「愛

「彌兒」(Mie)的時候，雖然美國的許多大學還沒有成立，教育學者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汗牛充棟」，也一定有些人笑歪了嘴。因為「彌非」不是「教育學博士」，也並沒有多少教育的經驗。而且一個老先生少不了笑着向第二個老先生說：「那個人自己生的兒子，就送往瘋兒院去了！」

可是，教育不單單是教育學者的事。誰都與教育有切膚的關係的。因為一個人自己曾經受過多少教育，也許正因為他從沒有受過教育；因為他自己有子女要受教育，也許正因為他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他也有他對於教育的意見。這種在正統學者看來，不定是淺薄無聊或是離經叛道的意見，有時也許有發表的必要。像教育一樣，醫學是與我們有切膚的關係的，尤其是在中國。我說尤其是在中國，因為中國是一個極大的微菌生殖園，疫病傳染所。酒樓飯店以及一般人家的廚房

裏都聚滿了蒼蠅；胡同裏到處可以做居民的廁所；塵埃在半天飛舞，洒水夫又洒上些糞水。我們生活在這種環境內，隨時隨地，都可以有傳染疾病的機會。我們寫這幾句的時候，就有一個朋友生死莫卜的睡在傳染病醫院裏，他的病是坐街上洋車時一個虱子傳給他的。

我沒有進過醫學校，也從沒有研究過醫道。我所有的就是什麼人都有的候補病的資人格。在醫學者的眼中，我們上次所舉例也許微乎其微，可是在我們候補病人的眼中，就非常可怕了。我是一向對於協和比較有信仰的，朋友們有了病，我曾經勸人進協和。可是我現在怎樣再敢勸人家？

這不是說，西醫靠不住，便應當相信中醫了。不過，中醫固然靠不住，西醫也離開一般人所迷信的西醫萬能還差得遠。在功效方面，西醫不能全活人，中醫也沒有全殺人，他們的相去，不過五十步與百

步，自然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在方法方面，他們，何嘗很不同？經驗與實驗，並不是絕對相反的。硬把它們分開，未免過於武斷了。爲什麼「大黃除實，當歸止痛」？最先也不是一個人的直覺所能發明的，一定也經過了多少的「trial and error」才有這樣的斷定。他們的方法，比起近代的西醫來，自然非常的粗陋，可是他們的方法也是實驗，不僅是經驗，也是理性的判斷，不僅是本能的觸發。他們所缺乏的，就是沒有比較「精密的方法，以分析其錯綜繚亂之現象」。至於一般平常的中醫，自然只知道墨守舊法。可是一般平常的西醫，又何嘗不是只知道謹守教科書上的話呢？

說到這裏，我們不免要反對陳先生的「對中醫很想約一般朋友下「一個總攻擊」的態度了。我們朋友的裏面，曾經有過被西醫所認爲毫無希望，而一經中醫醫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要是這樣的事情繼續發生，無論如何的攻擊中醫，我想中醫也不至於打倒的。那麼與其攻擊，還不如「充分的研究」一番；也許經過一番科學的探察之後，中國在世界醫學上也會有些微的供獻。

至於「對人對象」一類話，是陳先生誤會了我的話的結果。我的意思是說，自然科學所研究的現象是物質。物質的現象是往往可以造的，例如相當成分的輕養二氣可以造成水。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現象是人類社會。這種現象是大都不容易人力製造的。醫學一方面是自然科學，一方面是社会科學，所以我說它是介於二者之間的。

富有科學精神的醫生，遇到了一個疑難之症，便生了好奇心，想把他做些試驗，希望得些新發明。這自然是極好事。可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心目中往往念念不忘的是他的發明，而不是病人的病症，病人就成了試驗品，不再是病人了。在有些醫學校裏，窮苦的病人，常常就

做了教員演講的模特兒。

上面所說的，無非是求全的責備。有試驗的精神的，實在還是比較少數的好醫生。平常的醫生，施行手術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在施行的前五分鐘，他也許正想打牌或同太太去看電影，施行後五分鐘，他已經打牌或同太太看電影去了。他們的對於病人，無非是一般商店夥友對於顧客的情形。至於像東交民巷某醫院的某醫生，一接到總統府邀請遊園的電話，便即刻丟了正在施行手術的病人去了；回來之後又把小箱子藏在肚子裏；那真是「喪心病狂」不用說了。

至於「飯碗問題」是毫不緊要的，因為病人對於醫生懷了牢不可破的迷信。信神的求了一個仙方，吃好了是神靈的應驗，吃死了又是命中注定。同樣醫生醫好病是他的手術高明，醫死了又因為病人犯了不治之病症。

說起了「飯碗問題」，我不免又想起了一件事。現在的社會制度是不能造成極健全的人類的。「因為病人是醫生的飯碗」，那麼世界上的疾病絕了迹，醫生們也就沒有飯吃了。醫生們的利害，在現在的制度下，是與我們的利害恰恰相反的，絕對的衝突的。在理想的社會中。我想，醫生的進款應當與人們的康健做正比例。他們應當像保險公司一樣，保證他們的顧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應當賠金或賠償的。

談世界文學史

常有人問起有沒有什麼良好的世界文學史。我們只得回答不知道。我們非但不曾看見過名符其實的世界文學史，而且在近今也不希望會看得見。倒不僅文學這樣，就是平常的所謂世界史也何嘗不如此？威爾思的世界大綱，實在只是歐美史大綱；房龍的人類的故事，也不過是歐美人種的故事。這也難怪。人類的互相了解和合作，本來網纜開始；就是地球是圓形的發見和全世界交通的連貫，也好像不過是昨天的事。好比許多河流，才匯合成大江的時候，這大江的歷史，自然還不過是各河流單獨的歷史。

所以現在所有的世界文學史，只是歐美那一支。歐美雖然語言文字有許多分界，它們的文學都很深的受了希伯來，希臘，拉丁文學

的灌溉，而且互相時時有同情或異趨的影響。它們雖然各有單獨的生命，同時也有共同的歷史，

可是，就是歐美一部分，很好的文學史也實在太少了。粗粗看來，我們也許以為歐美文學的寶藏實在太富了。沒有人能夠精通若干國的文字，而且能夠鑒賞它們的作品。然而文學史家的毛病，往往不在他們的寡陋，却在他們的宏博。他們也許胸中包羅的學問太多了，自然而然的關不住；也許深恐人家疑心他們的淺薄，故意的要耀炫他們的博聞廣記；因此他們的書中，藏着無量數的人名和書名；那在淺學的我們，恐怕永不會有第二次見面招呼的機會，更不用說看到那些作家的作品了。

他們忘記了這種文學史的目的有兩種。一種是為初學或普通讀者打算的；他們要知道的不過是極少數真正偉大作家的偉大的作品。要

是一部文學史能夠達到這樣的目的而且引起他們研究原作的興趣，那就成功了。一種是爲學者打算的；他們要研究的是各文學的源流派別和相互的影響。要是一部文學史在這方面有一點供獻，也就成功了。無論如何，一本淡而無味的人名單和書目是一定失敗的，而且是多事，因爲學者如要作詳細的研究，他們自會去翻讀各國的文學史。

所以世界文學史作者應當作應瞰的觀察。他們好像坐了氣球，去看亞爾伯的山景，所見的都是數千尺以上的高峯。他們又好像坐了飛機，遊歷揚子江的上流，所見的是各河流匯合分離的大勢，和山峽急瀾的險阻。

因爲文學史作者不能實際超出空中，他的觀察自然不能極端的平允。要是他是英國人，自然他在英國文學裏找到的第一流作者特別的多，德法意俄少一些，波蘭，匈牙利更加少。要是他是法國人，法國

的第一流天才作家自然一定最多了。要是他是波蘭人，我們也敢斷言波蘭的第一流作家不會是頂少。作者好像坐在一個山巔看四圍的羣山，近處的邱壑畢現，遠處的非直立千仞的高峯不會進入他的眼簾去。這倒未必就不好，要是沒有太過分。因為讀者的興趣也正是同樣的不均，他們對於本國的作家自然希望知道得多些。可是，不太過分實在是難事。一個人最容易看見了目前的幾枝小樹，不見了遠處的森林，看見了園中的土堆，忽視了土堆後面的泰山。

我近來校看了三部名爲世界文學史的歐美文學史。一部是Enrie

Fagnel 的 *Initiation Litteraire* (巴黎 Hachette & Cie 出版，有英譯本 *Initiation into Literature* 倫敦 William and Norgate 書店出版)；一部是 John Drinkwater 編輯的 *Outline of Literature* (倫敦 Newnes) 出版；第三部是 John Macy 著的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紐約 Bonnard Liveright 出

版)。

Fagnel 是非常宏博的批評家，他的書就犯了宏博的毛病。一本小書一百六十三頁的書，却裝進了六百多人名，讀者當然不會感到深切的興趣和印象。*Drindwaere* 編輯的文學史，故事很多，插畫也非常的豐富，正可以作普通讀者消遣的讀物。可是，因為不是一人的手筆，文字非常的不一。而且一個有志研究西洋文學的人恐怕不能得到多少幫助的。因為這本書太偏重於英國方面了。例如第二本十九章中，十三章說的是的英國，敘述歐洲大陸和美國的還不滿六章，而且比較短少的六章。又如許多英國作家都有詳細的敘，意大利的 *Petrarch* 和 *Boecaccio* 只提到一兩句，法國的 *Libruges* *Fanelon* *Bosquet*，*Andre Chenier* 等還沒有名字。近年文學，德文只有 *Heimne* 和 *Nietzche* 兩個名字，*Hebbel* *Grillparzer* *Kellen* *Lilienoron* *Hauptmann*，*Schnizler* *Hofm* *insthal*

都沒有份；愛爾蘭文學運動也只有 Yeats 做代表，*Syrge A. B.* 都還有夠不上說着一半句。就是英國自己，那面說到 *Chalohé Voyage* 說到 *Alfred Noyes* 說到 *Hall Caine* 等等，却沒有提着影響近今小說最深的 *Samuel Butler*

在三本裏，*John Maey* 的實在令人最滿意。他雖然免不了對於英文學，比較的注重，究竟還不失大體的平均。他說到的人名并不多，書名也極少，可是我們並不覺得他遺漏了什麼重要的名字，因此他所說的幾乎都是智識階級應有的常識。他的敘述很流暢，他的評判很中肯，既能使普通讀者讀之忘倦，又能引起學者追究原作的興趣。書後的研究及參考書目，也極有用。插在書中的一百多本刻圖像雖然不見得都可觀，並且有把老子誤認為釋迦摩尼的笑話，可是有幾幅，尤其是着色的全頁像，很有些精彩。（此書去年出版，價美金五元。）

正誤表

頁數	行數	原	誤	應	改正
一一	二	opretan,	opretan,		
二七	五	沒脫英國	沒脫英國		
二七	五	主人海理爵士	主人海理爵士		
三二	三	大詩的詳盡	大詩人的詳盡		
三八	二	弱的利器	弱國的利器		
四二	六	說的。的	說的。		
五二	九	最近	最近		
六七	二	鳩須	鳩須		
六八	七	我不過	我不過把		
九三	六	同胞他們	問他們		
一〇七	一二	募。	的募		
一四一	六	帝國帝主義	帝國主義		
一五三	二	「利益」	「利益」		
一五九	六	他們並不	他並不		
一七八	二	不得復	不得復		
一八八	二	胡適之	胡適之		
二八九	一	的生涯	的生涯		
二九一	二	紅樓夢	紅樓夢		
二九三	二	也恐怕	恐怕		
二〇一	一	「公理」	「公理」		

頁數	行數	原	誤	應	改	正
二〇一	七	林肯	林肯			
二二三	一一	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			
二二五	八	蔣夢麟	蔣夢麟			
二二七	五	「留學生」	「留學生」			
二二六	三	晨報	晨報			
二二三	一二	這種	這種事			
二三五	二	還有少	還有少數			
二三八	五	鮑士偉	鮑士偉			
一三八	九	約翰生傳	約翰生傳			
二五六	三	聖保羅	聖保羅			
二八一	二	老殘遊記序	老殘遊記序			
二八二	四	就不容易	就不容易。			
二八八	二	適之	適之			

頁數	行數	原	誤	應	改	正
二九〇	九	韓退之	韓退之			
三〇五	六	人上	人身上			
三〇五	六	一片裏	這一片裏			
三一八	二	「開倒車」	「開倒車」			
三二一	一二	某留學生	如某留學生			
三二八	六	熱鬧了	看熱鬧了			
三三四	七	猶可說也	猶可說也，			
三四七	一	我不能	我不能，			
三六七	三	莫理哀	莫理哀			
三七四	七	對人象	對人對象			
三八二	五	中。	中，			
三八六	九	Initiation	Initiation to			

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五月再版
一九三一年二月三版

西滢閒話
每册實價一元二角

版權
所有

著者 西滢
發行者 新月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十五號 新月書店

82

106039